

生活在廢墟

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
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

莉蓮·強森 Marilyn Johnson / 著 李世明 / 譯

LIVES IN RUINS

Archaeologists & the Seductive Lure
of Human Rubble



提到考古學家，你的腦海會浮現什麼畫面？

是電影《法櫃奇兵》頭戴牛仔帽、手持皮鞭又掛把槍，卻很怕蛇的印第安那瓊斯？或是深入荒野尋找失落王國的冒險家？還是偷偷摸摸挖掘寶物的盜墓者？

其實這些都是對考古學家的刻板印象。考古學家沒有三頭六臂，裝扮也普普通通，但是他們好奇心強、有科學精神、善於觀察與記錄、邏輯推理能力強，尤其喜歡研究人類歷史。如果末世降臨，你最好有個考古學家朋友，因為他們懂得取火、獵捕食物，還會挖地洞蓋沙堡。

曾經在沙坑玩耍的人，都希望長大後成為考古學家。本書作者是愛好考古學的業餘者，她前往祕魯、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以色列和辛巴威，去見形形色色的考古學家。書中記述她與十四位考古學家上山下海，忍受炙熱的沙漠氣候、毒蛇肆虐的林地，與危機四伏的沼澤地，從加勒比海到印加帝國遺跡進行考古發掘，聽他們講述在中國發現五千年前的女神廟，美國獨立戰爭沉入海底的戰艦，印第安人的木乃伊，曼哈頓黑人墳場，以及一萬八千年前的印尼矮人族。考古學家在一堆廢墟中觀察到什麼？一件陶罐碎片或一顆古老牙齒如何拼湊過去？他們可以如何幫助我們保存歷史？

透過本書通俗又不失專業的記述，我們可以了解考古學的樂趣與使命，考古學家如何在廢墟中解開人類早年的生活與智慧。下一次看到考古隊在田野發掘時，不要以為他們是在挖寶，其實是在解讀深埋地洞的史書！



時報悅讀網

ISBN 978-957-13-6583-1 [790]
KAB 1050 NT\$300



作者簡介

瑪莉蓮·強森 Marilyn Johnson

曾任《君子》(Esquire)、《紅書》(Redbook)、《境外》(Outside)雜誌編輯，出版三本考古學、訃文相關書籍，曾為黛安娜王妃、賈桂林、歐納西斯、凱瑟琳·赫本、鮑勃·霍伯、馬龍·白蘭度撰寫訃聞。

前著作《死也要上報！》(The Dead Beat)入選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年度新人獎，《生活在廢墟》是2014年《出版家週刊》年度好書，並入選亞馬遜網路書店每月選書、百大好書。

譯者簡介

李世明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野百合世代。論文研究期間，以抗爭文化的權力意涵為知識興趣。曾經短暫擔任電影劇照，曾從事專題記者及政治組記者，參與翻譯《瞭解庶民文化》及《後現代理論》等書。

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
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
——
生活在廢墟

LIVES IN
RUINS

Archaeologists & the Seductive Lure
of Human Rubble

瑪莉蓮·強森 Marilyn Johnson / 著

李世明 / 譯

考古學家的崇高任務，就是讓乾泉再湧、所忘再憶、逝者再生，
再度攪動我們身處其間的歷史洪流……

——西拉姆 (C. W. Ceram)，《眾神、墳墓與學者：考古學的故事》

目次

敬畏者

——考古學家的故事

11

新兵訓練營

田野班

——脈絡說明一切

24

考古學家生存手冊

——我們的祖先是天才

48

極品飲料

——認真喝啤酒

81

玉豬龍

——如何搭訕考古學家

88

生活在廢墟

——就業問題及其他

穿越時空的旅程

——我們的合作夥伴

水下奇案

——慢慢考古，深深考古

會說話的遺物

探險家俱樂部

——古典時代和好萊塢的經典名作

重返田野班

——跟土地說悄悄話

考古學與戰爭

遺體

——誰的歷史？

見證人

——傷害的證據

危險世界考古學

——歷史性的結盟

避開標靶

——任務與尊重

垃圾堆中的寶貝

一整桶考古學家

——如果考古學家想要拯救世界

謝辭

99

110

116

138

149

170

190

205

215

234

257

敬畏者

考古學家的故事

本書不會提到恐龍出沒，如果你期待的是研究恐龍的科學家，你就得去挑一本古生物學家寫的書。這本書所寫的是考古學家的故事，他們研究人類及其遺留下來的東西：骨骼、廢棄物與遺跡。

從石器、破碎的鍋碗瓢盆到污泥，本書的考古學家在這些粗鄙的事物中勤奮工作。他們專門研究支離破碎的物件，也對背景脈絡關係有敏銳的觀察力；物件的擺設與周邊環境的關係，看似堆棄的垃圾，卻可能蘊藏價值連城的智識，若失之毫釐，將差之千里。對考古學家來說，曾經為人所知的事物被埋起來就是寶物，能夠帶來訊息、扭轉歷史敘事的礫石就是貴重之物。我曾在一卷錄影帶裡看到一位年輕的女性考古學家，站在快要變成紐約地鐵站的地道中，當時泥沙已漫淹到臀部，但工程帽下她的眼神發亮，喊著：「我們發現上面有日期的錢幣！」

末世來臨時，你需要考古學家

這時候追隨考古學家無疑是最好的年代，新發現和科學躍進持續修正我們所知：停車場挖出英國國王的骨頭，融冰中顯現青銅時代的鞋子和維京人的手套，激光雷達(Lidar)和空中測繪工具，揭示吳哥窟底下有一個龐大而古老的都市。我們常見的報章標題：「比之前所知更早，千萬年前的……有人居住」。技術進步促成某些考古學的崛起，但戰爭、商業發展、極端天氣和暖化——變遷與破壞——都對考古文化層的露出發生作用。世界變遷的速度已讓考古學家跟不上了。

然而，面對考古遺址倍增和考古專業增進，考古學家和其他文化記憶工作者有相似的惡劣處境：搶救並理解考古的苦工，獲得有限的支持。為了保留即將消失的歷史，他們指望達成的目標能有多少進展？我們以為考古學家做的事不過就像圖書管理員，他們在模糊的刻板印象背後揮汗如雨。不同於好萊塢式的瀟灑冒險家形象，他們其實不過是手持小平鏟、有點幽默，想要從過去腐朽的物件和殘骸中獲得真相的人。

我認為每個曾經在沙坑中玩耍的人，都希望長大後成為考古學家。我的童年在使用園藝工具發掘的日子中度過，像進入催眠狀態似的，被搜尋化石所吸引。這本書的研究之一是：回歸實地觀察，並以新的視角學習篩檢與端詳。我想透過考古學家的眼睛來看世界。他們在一堆廢墟中觀察到什麼？一件陶罐碎片或一顆古老牙齒，如何幫助他們拼湊過去？他們可以如何幫助我們恢復並保存歷史？

為了寫這本書，我曾爬到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頂峰，也到過羅德島州新港(New Port)的寒冷水域。我接觸敏銳的考古學家，也成為他們的技能見證者。我試圖尋找專注於不同時代各種文物的考古專家，也在得不到考古學注意的地方尋覓考古學家，例如加勒比地區和菲什基爾的雜草邊、考古學家拼湊歷史的紐約、後哥倫布的農場和墳墓。我和一群土地私語人在地中海找到發掘古典時代的方法，並學到從青銅時代到羅馬衰亡的古代考古學的品味。我研究古人類，追隨一位對冰河時期情有獨鍾的考古學家。追隨與軍隊合作、與刑警合作、與釀酒人合作的考古學家。我前往祕魯、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以色列和辛巴威，去見形形色色的考古學家。我在曾經是男性主導的這個領域，發現的女性素材更甚於男性素材。

我和我的老師一起揮汗發掘，但他們摒棄我大部分的發現。相對的，我放下作家的身段，拋開對非科學家來說似乎不太必要的技術，丟掉不能闡明考古學家本質特徵的那些糟糠、術語、尺度、放射性碳日期校準和理論。如何用一輩子來搞懂星球的表層？這才是我尋求的問題本質。

有位研究生告訴我：「末世降臨時，你最好有個考古學家朋友，因為考古學家懂得如何

取火、獵捕食物、構築山寨堡。」我立刻把她加進我的聯絡簿。誰知道什麼時候，構築山寨堡會派上用場？她接著指出，同學們的就業前景堪憂：「我們有可能如父母擔心的，住進瓦楞紙箱，成為遊民。」考古田野工作凌亂，通常是短期雇用來評估迫在眉睫的土地開發，以證明這座摩天大樓、那些管道或這個帶狀商場，不會破壞有歷史的村莊或神聖墓地。在這個行業裡，大家都是拚死拚活才能保住工作。即便他們具備專業知識、能力、經驗，還是會不斷的被要求謙遜。對於如此淵博的人來說，他們面對更多浩瀚的未知。一位考古學家聳聳肩說：「你會發現我第一本書大部分都錯了。」另一位講到他的學生：「他們未來十年所學所知，會讓我們現在的成就黯然失色。」我被那些經驗豐富、眼光遠大、疤痕上身和故事一籬筐的考古學家所吸引，他們絕對是最堅韌不拔的一群人。

四年前，我站在愛爾蘭國家博物館都柏林考古學區，端詳著從愛爾蘭沼澤撈出為數龐大的古代金器：錘領（hammered collars）、大金球、金皇冠和手鐲，以及別在耳朵的東西（他們如此認為）。當時愛爾蘭經濟受到重挫。據我所知，都柏林那時正靠著單身聯誼派對，從英國人口袋掉出的東西過活。然而，都柏林曾經遍地黃金，文物在陳列櫃中晃動，像是來自巨人國（Brobdingnag）的珠寶。

博物館主廳後面，藏在視野之外，小心翼翼閃躲不經意視線的是，征服沼澤後的考古戰利品。這些都是歷經數百、數千年儲存的人體，在缺氧沼澤中神奇地保存下來。你看到的

不是肉體爛去後的骨架，而是骨頭遭到溶蝕，留下肌肉、內臟，甚至頭髮。這是天然的木乃伊。從重播的影片中可聽到配音：「我們可以看到鐵器時代的人臉！」欣喜若狂的聲語。「他的睫毛還保留著！」每一具沼澤遺體陳列在獨立的展覽間，當你走進去的時候就好像進入一個巨大的蝸牛殼；遺體置放在鋪著壁毯的牆上，瀾漫莊嚴的寧靜。我停下來盯著克羅尼凱文人（Clonycavan Man），枯瘦矮小的傢伙有稀疏的山羊鬍和深色皮膚、乾癟的臉。頭髮盤在腦門上好像跑趴女王頭，抹上地中海特有樹種煉成的油膏。油膏的來源跟他生於斯死於斯的地方，兩者的距離超過一千多英里。

即便克羅尼凱文的臉上有睫毛，我更被大塊頭的老克洛根人（Old Croghan Man）吸引。雖然他現在斷頭斷腿，但兩千多年前曾以六英尺之軀行走於地面。他黑褐色的軀體，在幽暗燈光下看起來近乎栗色。他的雙手經過處理後，科學家已經能夠擷取指紋。十指中的八枚指甲已經復原。他是被斬首的，上臂被割破一個大洞，以柳製韌繩繫住，行凶者藉此將他放入沼澤中。此外，他的乳頭已經被切掉。那時代的愛爾蘭，似乎有吸國王乳頭以示服從的風俗。沒有乳頭，就不能成為國王。

考古學家和策展人推測，老克洛根和克羅尼凱文可能曾經是國王或頭人，或者是威脅到當權者的潛力領袖，或是被帶到王土邊境，經由儀式嚴厲處死的貴族犧牲者。（我想到我的考古學老師，她笑笑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那就稱為儀式吧。」）

二〇〇三年的幾個月，克羅尼凱文和老克洛根偶然被發現，彼此相隔約二十五英里，當時兩者被鑽地機挖出來，但遭受損害。「我們發現纖維組織物！」呼聲傳出。誰對這個呼聲有反應？考古學家、生物人類學家，以及古代髮型專家都跑來對遺體進行分析。克羅尼凱文和老克洛根死後承受的凌虐，不亞於他們生前所遭遇的酷刑——各種數位化和雷射顯像、紅外線、紫外線和X光分析、三維臉部重建、花粉分析，以及腸、胃、牙齒、皮膚的檢驗……有人推測出，製成克羅尼凱文的韌繩所用的樹種，有人確認老克洛根人袖口皮革來自什麼動物。接著，專家會將遺體醃漬，放到密封的空調玻璃棺展覽。以上所述，都需要動用數十位專家爬梳考古跡證。你可以想像，他們總動員的畫面。我真想召集一整隊考古學家！

以解讀骨頭和泥土為生

沼澤遺體、珍貴文物，總是會引人注目。海瑟·吉爾—弗勒金(Heather Gill-Ferking)說：「有人的腳像是生根似的，站著看好幾小時。」她是極少數來自北美的顧問，當鑽地機從歐洲濕地挖起另一具遺體時，她飛越大西洋前往現場。她還是大學生時，看過從丹麥沼澤地發掘的托倫人(Tollund Man)頭顱照片。兩千歲(或更老)的男性，像其他沼澤遺體一樣，托倫人雖然屍骨溶解，但身體組織依然存在，除了浸漬成棕色，其他狀況出奇完好。你

可以看到他下巴的短鬚，和起皺的前額；儘管皮繩纏繞著脖子，但表情依然平靜。這是因為沼澤有某種物質起了防腐劑作用。到底是什麼物質呢？吉爾—弗勒金被告知：沒人知道原因，但她回應：「別跟我說沒人知道。」她的論文為此設計一個實驗：把死掉的仔豬和豬蹄埋入泥沼。她研究木乃伊和沼澤遺體，並因此獲得三個學位和法醫人類學的研究生文憑，從此展開以歐洲為主要基地、稀有的考古學事業。她目前是世界木乃伊巡迴展的科學與教育部門主任，也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法學院遠距教學的學生，專長是文化遺產法。

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德國鐵器時代的席勒斯維格(Schleswig)沼澤遺體，在西莫·希尼(Seamus Heaney)的一首詩中，溫德坡少女(Windeby Girl)流傳千古，但吉爾—弗勒金的論文中，溫德坡少女的遺體獲得新觀點，認為溫德坡少女可能是男孩。吉爾—弗勒金的口氣像是在談一個共同朋友：「你知道溫德坡少女可能是男孩嗎？」她熱血沸騰地提到佛羅里達州一個考古遺址，池塘裡的泥炭底層保存許多遺體，沒有組織或器官，但保有骨架和令人驚訝的完好大腦。她指出：「只有三百六十九具沼澤遺體」，這是非常小規模的考古跡證。」有些木乃伊落入私人手中，「你會驚訝，有多少人希望擁有木乃伊。」收藏家兜售竊自歷史遺址的文物，造成考古學處境惡劣，而木乃伊巡迴展的安全問題，更令人頭痛。

我以為沼澤考古發掘很多，但吉爾—弗勒金潑了我一桶冷水。要先排乾沼澤的水，才能

做妥當的考古發掘。這太昂貴也太難了。她說：「這些沼澤遺體被鑽炭機偶然發現，但也對遺體造成很大損害。沼澤是掩埋遺體或發生事故的好地方。一隻羊掉入沼澤，牧羊人急忙要追回他的羊，也跟著掉入沼澤。不一定非得遇到流沙泥濘，事故還是會發生的。」

吉爾·弗勒金說，實驗讓她展開木乃伊世界之旅，也因而發表〈一隻小豬跑到坎布里亞；一隻小豬跑到威爾士〉(This Little Piggy Went to Cumbria; This Little Piggy Went to Wales) 這篇論文。研究過程並未殘殺仔豬，但的確有一頭母豬因為意外而死亡。她無法忍受暴力或死亡，她要丈夫放生他們在新罕布什爾州屋裡發現的蜘蛛或蒼蠅。他們有一隻名叫噬魂者阿穆特的貴賓犬，但她寧願多聊聊德國沼澤發掘出的那隻十六世紀的狗澎澎(Puffy)，為了準備木乃伊展覽，她必須研究那隻狗。狗頭骨還在，也保留許多組織和器官，和可愛的棕色蓬毛。她宣稱，這會是「現存最古老的3D軟組織動物！」

雖然老師安慰我：過一陣子，好運將會突然出現在你面前，但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我在威斯康辛州花了整個下午尋覓象形土墩(efigy mounds)，使我相信我需要一個嚮導。象形土墩是美國中西部重要的考古勝地之一，早期印第安人將土墩堆塑成動物和精靈的形象。這些土墩是世界一流的考古勝地，不亞於祕魯納斯卡線(Nasca lines)等著名遺跡。即使龐大的鳥形和幾何圖形已被刮入荒漠，但那些納斯卡線的照片還是令人印象深刻；相反的，威斯康辛州黑白的土墩照片，並沒有那麼令人印象深刻。畢竟我生長於美國，而這些都

是我的寶貝。

無論是透過地圖、標示牌，甚至觀景台(一個觀景台代表一個土墩觀景點，是嗎?)但我看不到地形景觀的特徵，更甬提什麼豹形(土墩)了。土墩在哪裡呢?我尋覓著三百五十九英尺高的東西;哎呀，原來是三百五十九英尺長。我從旅遊指南中了解，土墩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義，但我漏讀了土墩的描述：「具低矮特徵……順著土地的自然輪廓，與自然地形形成一體。」對某些人來說，是看不出在哪裡的。其形貌似鳥、蛇、豹的方式，就如同大熊、小熊星座像熊的方式;換句話說，這有助於預先知道你在尋找什麼。而那些沒有形貌、沒有動物樣態的土墩，是怎麼回事?這些土墩看起來就像渾圓的山丘。有的內有墓穴，有的沒有。它們由人類堆塑成形，是未解之謎。

美國第一個考古發掘是在獨立戰爭前後，傑佛遜在維吉尼亞州挖壕溝，卻挖到印第安人墓丘，他將發現的人骨及其他文物寫成科學報告。我只能推測那時的土墩可能比較容易辨識。

後來聽說有位考古學家戴安娜·葛林利(Diana Greenlee)，熱衷於路易斯安那州的貧窮角(Poverty Point)土墩。她主張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土墩，和山脊構作的重要性足以與其他世界遺產遺址並列，媲美大峽谷、獨立紀念館和自由女神像。葛林利解釋，幾千年前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文化低窪地區的人們，狩獵、採集之餘從遙遠的地方提來一籃一籃土壤，堆起他們的石頭、同心脊和巨大的廣場。我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貧窮角尤為突出，因為獵人和採

集者很少建土墩，他們以極快的速度建立土墩，這個遺址的規模非常巨大。根據葛林利的說法，四百英畝的土墩再加上其他泥土建物，讓英格蘭的巨石陣（Stonehenge）相形見绌。她因此宣稱，規模可與貧窮角相比的人造景觀只有火人祭（Burning Man Festival）、黑岩城和佛羅里達州的辦公大樓複合物，那時我感到敬畏。果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另一批世界遺產名單時，貧窮角名列前茅。

人工土墩和普通山丘、山崗之間的差異如此微小，誰可以分辨呢？即使透過地圖和大型標示牌也難以辨別嗎？什麼樣的人會以解讀骨頭和泥土為生呢？晚期林地印第安人（Late Woodland Indians）所建的豹型土墩，與美洲原住民所建立、更古老的大型地景「貧窮角」是如此神奇，發現並研究它的人更讓我感到興趣。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會錯過多少事呢？

阿德恩·漢那斯（L. Adrien Hanneus）告訴我一個他已經發掘十年的考古坑，南達科他州一處美洲史前原住民村莊。他在那裡發現陶片、削尖的石頭、古代營火灰，這位留長髮的考古學家說，最棒、最重要的是發現被火爆裂的石片和切碎的骨頭，這是製造骨脂的考古證據。這些訊息是我坐在南達科他州拉彼德城一家小餐館，吃著油膩膩的蛋，並請教他有關骨脂所得知的。

戲碼在泥坑裡上演

考古學家很有魅力，但他們似乎更樂於投入工作細節。漢那斯點了焦培根（若沒指定要煎到焦熟，店家會給半熟的）。他是一位骨脂專家，骨脂是新石器時代的人工油脂，是深藏動物大骨裡的穩定油脂，是古代人重要的飲食。

跟處理骨髓不一樣，淬取骨脂非常費工。漢那斯鉅細靡遺的描述：蒐集大骨、碎解後刮掉骨膜。油脂不是挖出來的，而是要熬骨頭，可惜大平原美洲原住民的鍋具尚未結實到足以裝盛開水。他們只能用營火一千度或一千兩百度燒製陶器，而陶器如果要用來裝開水，必需以兩千度來燒製。所以他們在地上挖一個坑，鋪上處理過的皮革，再放入水和碎骨頭。然後再將一堆大石塊燒到極熱，放進裝滿水的坑。如果順利，火紅的石塊會發出嘶嘶聲響並且彈出，當水沸騰後，珍貴的骨脂會浮在水面，再加以濾取。

漢那斯說，原住民辛苦大半天，只能淬取少量油脂。這個過程留下可供考古學家研究的大量廢棄物，從被火爆裂的石塊到骨頭上的砍痕。這些廢棄物代表許多辛苦勞力，顯示骨脂對他們有多麼重要。跟漢那斯所點的焦培根脂肪不同，也與動物的肌肉脂肪不一樣，骨脂可以存放數年。美洲原住民用骨脂來封存東西，這讓他們在狩獵或收成不好的時候免於挨餓，也可以用來點燈或讓獸皮防水。他們將骨脂、肉乾，和乾燥後的漿果混合做成乾肉餅，這是

新兵訓練營

千年前的熱量補充棒。帶上一袋乾肉餅，美洲原住民要走多遠就能走多遠。（如果沒有便於攜帶的食物，就得花大部分的時間打獵和覓食）。來自卡霍基亞（Cahokia）遺址的破陶片，在七百英里外南達科他州的米切爾（Mitchell）被發現，可見骨脂讓旅行和貿易成為可能。

漢那斯也以大平原美洲原住民的方式，用野牛骨和史前工具採集骨脂，再用肉乾、紅莓乾和骨脂做成乾肉餅。味道怎樣呢？他吃完培根後露齒而笑說：「噁心。」

考古學家是不講究三餐伙食的，一位田野考古學家描述他的午餐：「拿起臘腸三明治、芥末花生醬、果凍、奶酪，或許加上醃黃瓜，揉成一團，就往嘴裡送，儘快吃完就上工。」

他們也不在乎自己的健康。另一位考古學家列舉工作上的挫折：「我心想……我感染過痢疾，變得骨瘦如柴。也染上瘧疾四次，但從來沒有打過針。讓我再想想……真的沒有。」

這樣的工作也許可以滿足印第安那瓊斯（Indiana Jones）式的幻想，充滿寶物、危機四伏，但卻難以窺探其魅力之處。考古學家是探險家和冒險客，但不完全像你想像的那樣。

考古遺址看起來就像一塊空地，考古文物可能很細微，遺跡可能過於渺小而難以察覺，但戲碼在泥坑裡上演，我們的考古英雄圍在坑邊，畢恭畢敬地跪著。

1 其他不同數據指出，遺體有數百具。吉爾—弗勒金的數據估計到二〇一二年，各國所陳列展示的總數。

田野班

脈絡說明一切

對於有志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來說，田野班是必經儀式。如果你正在考慮要研讀考古學，就必需到專門培訓田野工作者的發掘現場當學徒。地點通常在沙漠或叢林，而且是在最熱、蟲蚋最多的時節。一個世紀以前，田野班在考古學家監督下簽署參與發掘工作，考古學家教你發掘的藝術並雇用當地人做苦工。現在，當地人做翻譯、司機、嚮導、廚師，而學生們扛重物、搬移石頭、拖運泥土和坑渣，例如約旦有一個汙泥坑，公元前十世紀用來煉銅。在遺址帶頭的考古學家告訴《國家地理雜誌》：「我沒有充分的數據來證明，但是我想會在這麼悲慘的環境工作的只有奴隸……或是大學生。」不僅沒有人逼學生做這些苦工，他們反而必須付學費才能參與。田野班收取高額學費，通常要價數千美元。若是沒有這批畢業生和大學生組成的勞工隊伍，考古學將不知何去何從？難道他們就是貢獻勞力與金錢，讓考古發掘得以持續進行？

田野班是通往考古發掘的捷徑。你申請了考古班，帶著傷寒和肝炎疫苗，以及抗生素和止瀉藥或瘧疾藥片，那些已從事過田野工作的人會告訴你，路要怎麼走以及如何抵達田野。你在原始的環境下努力工作。晚上你們圍坐一起，和年輕人玩罰酒遊戲，到彼此的臥鋪翻滾。

一九三〇年，有位在新墨西哥州查科峽谷田野班蹲點的學生寫下謝辭：

我熱愛你們，每一個廢墟，

讓我在酷日烘烤下得到遮蔽，

同時也是我快樂的住所。

那兒微風吹拂堆起沙丘——

是的，我會想念你，想念你教我的話語，

你熱到頭昏，該死的帳篷像火爐……

你有爽口水的水，但只能飲用……

爽口水的水，但只能飲用？這是否表示沒水洗澡？當我讀到這首短詩時，還沒有上過田野班就已經大汗淋漓，讀著布滿眉批的博物館《查科揭祕：一九二九年至今的田野班》筆記。

很顯然，田野班能帶來種種磨難的經驗：骯髒的宿舍——也許是「熱到頭昏，該死的帳篷像火爐」——吃的是罐頭食物、昆蟲騷擾、烈日灼身、塵土和骨骸。很好，儘管來吧，我可以應付燠熱和不適。我可以忍受沒有WiFi或手機，甚至可以忍受沒有除臭劑的生活，但沒水可洗澡呢？查科峽谷位於海拔六千兩百英尺的高原沙漠，要建立大型聚落是很困難的事，雖然大約兩千年前的普威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曾經辦到。這表示那個遺址比一般沙漠更靠近太陽。我試著想像那批高原沙漠的田野團隊，好幾天、好幾星期沒洗澡，肩並肩、腋窩貼近腋窩從事發掘工作。難怪頭巾總是出現在田野班的打包清單上，總要把臉包得像搶匪似的。

脈絡就是一切

我花了好幾個星期在 shovelbums.org 和 archaeological.org 網站上搜尋，留意田野班的開班公告。我考慮報名西班牙外海某個島上的羅馬廢墟田野班，距離海灘只有幾步之遙，又考慮一個在祕魯的田野班，雖然學生在社區中心打地鋪，「村子裡唯一的抽水馬桶！」可以使用，但這驚嘆號的註記讓我擔心。萬一我到了那裡卻遇到唯一的馬桶，因被眾人過度使用弄壞了，而村裡沒人知道如何修理，這下該怎麼辦？我不曾擔心會有幽閉恐懼症，直到讀了另

一個在祕魯的田野班訊息：「請當心，這個考古坑位在墳墓裡，入口非常狹窄，裡面空間有限。」再一個是希臘愛琴海美麗島嶼上的田野班，提供學生一整個墓園，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兒童墳墓。使用雙耳陶罐為葬器，因此「除了骨頭，你還有機會處理大規模的古典希臘陶器。」這樣掘墓取罐（不包括復原處置）的花費高達七千美元。

或許來個輕鬆一點的。我不斷瀏覽聖尤斯特修斯（St. Eustatius）的田野班公告，以前我從沒聽過的加勒比海島嶼，一個飽受颶風侵襲的地方。那兒有什麼樣的考古工作在進行呢？我讀到，聖尤斯特修斯「相較世界上其他規模相仿的地方，有最密集殖民時期文物和遺址。」沉船、教堂、酒館、古老的甘蔗園和奴工寮，我可以選擇任何一樣進行田野工作。贊助單位不是大學，而是獨立的考古學中心，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SECAR）。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似乎特別適合我這樣的志工，不需要或不需要從工作中累積學術資歷的人，所以花費相對便宜，到中心去發掘遺址和使用臥鋪一星期五百美元。此外，跟許多田野班不同的是，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一月到九月都開放，只在颶風季節和節日打烊。你可以挑選哪個星期要去。這真是太棒了。住在寒冷的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我，想到一月份要去加勒比海的溫暖土地進行考古發掘，真是滿心歡喜。

「不要猶豫。」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格蘭特·古爾摩（Grant Gilmore），從田野發掘地透過衛星電話勸我：「世事難料。如果你下週來，可以遇見一些從荷蘭來的考古

學家。」於是在七月的最後一天，我把頭巾、防蟲噴劑、防曬乳液，和一打熱量棒乾糧塞進背包，飛向加勒比海的大火爐。飛越古巴、牙買加、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和波多黎各，降落在聖馬丁（St. Maarten）。在那裡，我跳上一架飛往聖尤斯特修斯的小飛機。

幾百年前，加勒比海地區就像倫敦或紐約一樣，曾經是世界的中心，是全球地圖上交通路線交匯處，並且越來越密集。經過聖尤斯特修斯的交通線尤為密集，居民稱之為斯達夏（Stavia）：八平方英里內漫布火山礫石和熱帶植被。在荷蘭殖民統治下開設自由港，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絡繹不絕，多民族湧入的貿易中心於是興起，人數眾多的有猶太人和新大陸（New World）的自由黑人。奧倫吉士達（Oranjestad）是大西洋最繁忙的港口，從一七五〇到一七八〇年之間，斯達夏已具有全球的影響力，這個島如此富有因而被取了黃金岩（The Golden Rock）的別名。斯達夏運送武器給美國的革命份子，當美國戰船多利亞（Andrew Doria）號駛進港口，位於奧倫吉士達港上方的荷蘭人碉堡鳴放歡迎禮炮，但英國人非常高興，他們在一七八一年抓走荷蘭新貴，把島上倉庫裡的東西拍賣掉，並放火燒了倉庫。後來聖尤斯特修斯恢復元氣，甚至更蓬勃發展。之後法國突襲占領，並於一七九五年課徵稅賦。這是現代世界第一個自由貿易實驗的尾聲，也是斯達夏作為大西洋中心的強弩之末。

我將從這早期戲劇性的時日中，搜尋歷史遺物和物質文化。在一個我未曾聽過的地方、一個被遺忘的世界交叉路口，我將展開考古學研習，真是開心愜意。

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居然位在陡峭的山坡上一棟時髦薄荷綠房子，漂白過的牛頭骨掛在後院上方²，如果不是多了破陶罐和癩瘋病人骨頭，幾乎就像是我祖母家的閣樓。後院的門通向洞穴般中央主廳末端的小廚房，主廳塞滿層層灰塵的陳列櫃、十七世紀的盤子、十八世紀的菸斗（桿部早已不知去向）、鏽跡斑斑的炮彈、充滿文物的塑膠收納箱，以及從二〇〇五年創立以來累積的碎石。主廳外是男生和女生宿舍，空間足夠四名志工入住。我掛起下鋪友善的加拿大人凱莉借給我的蚊帳，在熱帶的雜音中睡去：蜥蜴在泥牆上亂竄、牛在哞叫、蚊子嗡嗡穿過蚊帳。暴風雨正要向島上撲來，但速度還不足以快到能推動這裡的空氣。沒有電風扇，熱氣停在我頭上像垂下的毛毯，但總算有淋浴設備。

我們的領隊吉爾摩三世（Richard Grant Gilmore III），第二天一早八點從島的另一端的住處趕來，興致勃勃地將高科技和低科技配備裝進他的越野休旅車 Land Cruiser，包括照像機和神奇的測量工具、鐵鍬、水桶、小鏟子、塑膠袋、釘子、大紗網、米尺，以及幾顆從附近樹上摘下的芒果。吉爾摩是佛羅里達州沿海在地人，有菲律賓和牙買加血統（他說：我母親是棕色的）。還不到四十歲的他，身強力壯，剪得極短的髮際露出些微銀絲。他把當天的志願者和學生趕到車後面，我們坐在車窗邊長椅上。麥特在一兩個月前就來了，沒想要逃開，凱莉四十多歲，在度她的冒險假期（他們兩位都穿剪短的牛仔褲和舊T恤），而年紀最大的我，穿著尼龍襯衫防曬，長褲則用來阻擋蟲子。我們要去尋覓破陶片和碎玻璃，屬於先人的

遺留物，但感覺像是要展開一場冒險，向未知前進。

我們出發了，車上沒有安全帶，一路顛簸通過奧倫吉士達豐富多采的陡峭街道，這是島上唯一的城鎮，座落在俯視海面的崖岸上。我們背後聳立雜草叢生的死火山是主要景觀，一座白色巨大油塔杵立在山坡附近，牛群和羊群四處遊走，再加上蓋到一半的房子，整體構成新潮的質感。儘管島嶼小、多丘陵，但石油公司帶來就業機會，我們在狹窄的路上和一輛亮黃色的悍馬車會車。我一直在尋找具有奇風異俗背景的地方，去學習田野工作的基礎知識，但你不能把工作和發生的地點分開。地點不是考古學的背景，這是重點。正如任何考古學家會告訴你的，脈絡就是一切。在斯達夏進行考古發掘，意味著將能了解現在和從前的斯達夏。

這個島的歷史與加勒比海其他地區略有不同。牙買加、巴貝多（Barbados）和波多黎各的奴隸，在地主的控制下過著噩夢般的生活，但是就如吉爾摩告訴我們的，在聖尤斯特修斯奴隸宿舍的考古發掘，訴說著不同的故事。這個島面積不大、雨水不充足，因此難以支撐大型農場。甘蔗園種植規模很小，住在奧倫吉士達的鄉紳比較像莊園園主。運用自由港，斯達夏成為世界貿易中心之一，扮演蓬勃黑市東道主的角色。其他島嶼偷偷將數以萬噸的糖運送到這裡，然後重新包裝運送到全世界，加以精製或釀成蘭姆酒，我們所要發掘的廢墟附近就是釀酒工廠。一七五〇年代中期，因為太多船隻進進出出，導致斯達夏的商人建倉庫的速度無法消化堆置的貨物。吉爾摩和他的考古發掘夥伴，掘出中國瓷器、德國蘇打水等等東

西。吉爾摩驚嘆不已：「他們真是有錢得要命，甚至還進口礦泉水！」

加勒比海其他島嶼的奴隸，都在地主的監視下生活。但在斯達夏製糖工廠附近發現奴隸的小屋，表示他們已經在迅速擴張的黑市裡工作了。除了加勒比海黑人的陶器，吉爾摩在奴隸住處發現了盜片、象牙梳子、手吹玻璃。在奴隸考古遺址中，這些物品並不常見。

吉爾摩說，斯達夏奴隸的相對自主性也可以找到書面記錄。不是歷史書，而是原始文件，是他在海牙的荷蘭皇家檔案館（Royal Dutch Archives）讀到的。他問道：「不然為什麼他們必須立法約束奴隸在鎮上馳馬放槍，或禁止奴隸的小孩在馬車上放鞭炮？」這地方太小了，以至於無法窩藏逃亡者，但斯達夏的奴隸有門道掙錢買回自己的自由。這樣做的人想要繼續留在島上，例如商人、地主與奴隸主。那些自由的黑人奴隸主，起碼有一個是女的。

推土機在遺址上嘎嘎作響

除了學習島嶼的歷史，我們也看到，對於管理多個考古遺址並且協調專家和志工輪班工作的考古學家，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山腳下面對海港，在迷人的奧倫吉士達的中心，吉爾摩先在聖尤斯特修斯歷史基金會博物館前停車，博物館座落在漂亮的十七世紀建築。後面是殖民時期打鐵鋪，正在格蘭特的妻子喬安娜·吉爾摩監工下重建，她修長、金髮，是來自英國

的考古學家。格蘭特把馬特派給她做一天的助理，馬特天生虎背熊腰又充滿熱情，他咧著笑著，以鏈囚的風格掄起大錘揮舞，打破舊的、看起來假假的窠。

吉爾摩、凱莉和我在車上，沿著海岸奔馳約莫一英里，經過華麗的紀念碑墳墓，那裡擺設著亡靈照片和大叢鮮花，放牧著黑白毛色相間的山羊和自在遊走的驢子。我們把車停在低矮的組合屋前，這裡是荷蘭考古隊駐點之處。他們的宿舍後面小山點狀，散置著又大又圓的白色儲油槽，可容納一千三百萬桶石油。德州石油集團NuStar Energy 想要擴建儲油槽，於是荷蘭考古學家和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為這了承包案工作了好幾個星期，穿過生意盎然的綠色山丘兩條大壕溝發掘並取樣，要了解擴建會不會損壞考古遺址。令他們大驚的是，到目前為止什麼也沒發現。

吉爾摩探頭車外，和柯琳·霍夫曼（Corinne Hofman）聊天，霍夫曼是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考古學教授，也是荷蘭考古隊的領導之一。在兩種語言連珠炮交流之後，她自告奮勇讓她學生的兒子阿彥和學法律的室友湯瑪斯當我們的志工，於是兩位穿著衝浪短褲、戴著反光太陽眼鏡、曬得黑黑的大學生成為我們那一天的發掘夥伴。

我們呼嘯通過柵門，深入地勢起伏而廣闊的舊甘蔗園，車轍交錯，牛羊散布在眼前。四處的石牆遺跡就像在註記這裡有個潛藏的考古遺址，雖然較為現代的垃圾也出現了：成堆的碎石混著閃爍的碎玻璃、堆積的輪胎，和生鏽的翻土用具。吉爾摩快速通過坑窪，把車停在糾結藤蔓的下方，並向植物噴灑使叮停（sting stop）。他指著奴隸宿舍遺跡的位置，一星期以前他和團隊夥伴已經調查過。我們往有葉子覆蓋、地勢稍高的地面走去，走到一個十八世紀蔗糖加工設施廢墟。我們要在崩塌的圍牆外緣進行發掘。

「三週前我們清理過這個場址，但後來草又長起來了。」吉爾摩說：「我們發現蜂窩，如果你被叮到，用一點使叮停塗擦皮膚。」他警告我們，關於莊園主屋牆腳前的毒石榴樹；如果下雨，別在毒石榴樹下躲雨，否則會造成身體二度灼傷和水泡。即使是一小滴樹汁也具有腐蝕性，如果食用其果實，我們的胃會被咬破一個一個洞，然後痛苦的死亡，或者痛不欲生。吉爾摩發出短聲咳嗽。哈！瘋狂的熱帶！於是我們集合在崩塌的糖廠圍牆邊，開始這一堂發掘課。

吉爾摩向我們示範如何發掘一個測試單位或探坑：正方形的坑洞，用來在場址取樣，以了解那裡發生過什麼事。然後他指導我們在空地上設置兩個測試坑。找到合適的地方下手挖是一門藝術，如果我是十八世紀種植園的工作者，我會在哪裡睡覺、做飯、丟垃圾、埋葬死者？大多數考古學家會在測試坑的正方設下度量，每個邊一公尺長，然後在角與角之間拉起繩線劃出範圍，但吉爾摩已經絆掉太多繩線，所以我們只好湊合著用釘子標誌角落，繫上一塊紅色塑膠片。我們兩兩成對，女士一組小帥哥一組，在地面上進行測量。我們用鏟子沿著各邊切出整齊的邊線，小心翼翼保持方正筆直。然後，我們清掉探坑上的葉子，開始挖取最

上層的沉積物。

我用鏟子挖起泥土放到篩網上。這是一個簡便靈巧的工具，在木架上放置矩形的網，木架的其中一邊有兩支木腳支撐。凱莉幫忙抬起另一邊，平衡篩網，像推著獨輪手推車，靠在她的臀部，讓我倒下泥土。接著，她用力搖篩網好幾下，在她像裝了鍊條的腿上來回搖動。每次搖動將鬆土通過篩網篩落地面，她的腳邊就堆積一個土堆。經過幾次搖晃，留在篩網上的是太大而篩不過的廢料。岩石？寶藏？或泥土塊？我們急切地挑揀廢料。我們的任務是要挖出人類用過或製造的東西，例如陶器、釘子、玻璃，和骨頭、貝殼，以及有意義的物件。我們壓碎泥土塊並摩擦岩石，但什麼也沒有。凱莉以專家的手法用手指輕彈篩，讓無用的石土渣滾向側邊。吉爾摩交代我們任務，挖穿表層土，往下挖到地表以下幾英寸的灰質層，並將碎片裝進塑膠袋。這裡有數百年前甘蔗園工人的故事，現在透過他們所遺留的廢棄物來跟我們說話。

這是持續重複的工作，也許很枯燥，但是為了找尋文物，我們把懸念拋諸腦後。大西洋上一個熱帶風暴正在形成，我們在這遙遠島嶼的神聖背景中，被毒樹叢包圍。

當我們在烈日下與有毒灌木叢和篩土奮戰的時候，吉爾摩在島上來來去去，忙著徒手作。他從一個老舊的考古場址清理一堆大石頭，丟到博物館圍籬外，以供打鐵鋪整修之用。他協調私人機師，把地質學家的笨重鑽地雷達設備，用飛機載送到島外。現在我們的領隊回

來了，他蹲在那裡，把我也已經裝袋可能是陶片和碎磚塊倒在他手上，然後毫不遲疑地一一甩過他肩頭，掉入交纏的藤蔓中。「下一位！」我當鏟工的第一個早上，已然挫敗。

荷蘭小伙子的運氣比較好，或許是他們眼尖。幾英尺外他們挖的探坑發現比較有指望的文物：一些厚厚的結著銹的釘子，以及一件可能是非裔加勒比海人的陶器，質地粗糙且紅色澤。「如果你能找到有紋路圖案的，我會買一箱啤酒、藍姆酒或牙買加葡萄柚汽水請客。」吉爾摩向我們宣告：「全世界可能有上百件完好無缺、帶著紋飾的非裔加勒比海人的陶器，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擁有其中的四分之一。」

回到中心，我們詳細寫下田野筆記，記錄當天收穫的釘子和陶片。吉爾摩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作為借鑒：一個學生帶著筆記型電腦進入考古場址，在田野現場做記錄。在記錄從每個探坑起出的新發現時，他沒有另開新檔，她在前一組數據之上輸入新的一組，然後按下「save」鍵存檔。本來應該有六十坑的記錄，結果變成只有一個坑的記錄。這是徵用志工和學生進行考古發掘所要冒的風險：總是會犯錯。借一個同事的話來說，幸好吉爾摩是個少見的怪咖，既是 A 型性格又有能力解除工作負擔。每天從大清早到傍晚，他應付各種狀況、開車、送往迎來、想對策、教導我們、提供訓練、譏諷我們、挑戰我們，最後原諒我們的過失。然後，他帶著老婆喬安娜和他們四歲女兒及兩歲兒子，在奧倫吉士達港黑沙灘銀亮海浪中游泳，然後回到住處一家人一起吃飯。到了晚上，當下工放鬆的志工們到山腳下的酷角

(Cool Corners) 酒吧享用不錯的中國菜之時，吉爾摩會窩在家裡的辦公室，研究直到深夜，除了追蹤逼近中的熱帶風暴、追蹤 Cay 上出現遭竊奪的文物，然後研讀斯達夏的史學和考古學，以拼湊那段殖民歷史。這是他寫作的主題。他在寫關於合仁達靈 (Honen Dalim，美洲第二歷史悠久的猶太教堂，一七三九年建於斯達夏) 猶太教堂的報告，吉爾摩曾幫助發掘和保護。讀過他的報告之後，我可以感覺驅動他考古志業的迫切壓力，推土機在許多考古發掘旁嘎嘎作響。吉爾摩的結論提到：「這個令人讚嘆的建築，差點遭到毀滅。」

凶猛的黃蜂盤旋在小徑上

加勒比海地區的考古文獻，多半是有關文物失蹤的主題。吉爾摩是《加勒比海地區文物保存》(Preserving Heritage in the Caribbean) 的作者之一，這是一本彙整各島嶼通報考古學遭受的挑戰，並繪製成圖表的論文集，為了刺激旅遊業發展，往往卻毀掉可能會吸引遊客的地方。這裡除了颶風，還有其他要抹除文化遺產的力量。在聖湯瑪斯 (St. Thomas)，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地主同意保存在他土地上的奴隸村遺址；接著他把土地賣給開發商，在沒有通知之下破壞了遺址。在巴貝多，考古遺址名義上受到〈古物保存法案〉(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Act) 保護；法案規定由古物諮詢委員會 (Antiquities Advisory Committee) 強制執行，但委員會未派任成員，也從未召開會議。論文集編輯寫到：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應該頒贈特別獎給巴貝多的立法者，以突顯荒謬不合邏輯的現況。

研究報告呈現吉爾摩的故事，充滿著失望心碎。有人在島上蓋房子的時候在院子發現遺體，吉爾摩和他的團隊因此前往工作。幾天後，那人對考古復原的步調越來越不耐煩，並把挖土機弄到院子。吉爾摩寫到：「那時缺乏保護考古遺體的立法，要防止肆意破壞墓地遺址可採取的做法很有限。」這可能是島上第一個已知的奴隸墓地發掘，也是加勒比海地區極少數奴隸墓地遺址之一。吉爾摩以各地考古學家的口頭禪總結他的報告：「許多重要歷史永遠消失了。」這是在考古文獻中最普遍的情節，不僅發生在加勒比海地區，而是到處發生，從開發者剷平祕魯古印加金字塔，到塔利班在阿富汗炸毀巴米揚大佛像的例子比比皆是。

吉爾摩的專業是歷史考古學，研究的是晚近歷史，特別最近幾百年。歷史考古學運用文獻記載，並搭配歷史文物進行研究。他喜歡取笑研究更早期時代的考古學家，大部分的考古學家都屬於這類。吉爾摩的考古坑充滿象牙梳子、醫藥文物瓶、海泡石菸管，以及把蔗糖釀成蘭姆酒的工廠零件。而那些多數的考古學家在研究什麼呢？是石器嗎？吉爾摩逗弄一位剛從多明尼加共和國、前哥倫布時期考古坑來的新生說：「有發現柱洞嗎？」柱洞指的是房屋木頭柱子，可能曾經陷落其中、黑暗潮濕的泥洞。是的，學生認真地說，他發現三個柱洞之後就毫無進展了。我們裝作欽佩，盡管我也認為象牙梳子、玻璃瓶等十八世紀的文物，比起

黑暗潮濕的泥洞來得有趣多了。想像一下，挖了幾星期才找到三個柱洞。我覺得吉爾摩愛說笑又好調侃，是因為這種話語能保持他的精神振作。要知道，這裡可是個孤獨寂寥的島嶼啊。

吉爾摩似乎被荷蘭團員柯琳·霍夫曼、門諾·胡葛蘭(Memo Hoogland)夫婦二人，和他們的學生所鼓舞。他們幾個星期前，就到斯達夏調查新油庫將要使用的土地。加勒比海考古學家相對人數少，互相爭勝的嫌隙在所難免，但他們也相互合作，一起發掘、一起觀測政治大環境的氛圍。斯達夏是二〇一〇年崩解前的荷屬安地斯的一部分，現在是荷蘭的直轄市，受荷蘭法律約束。對吉爾摩來說，他的工作目標之一是和胡葛蘭共組團隊，遊說荷蘭政府保存這裡的考古資源。政治工作雖然耗時，卻有助於未來考古工作順利進行。吉爾摩、霍夫曼和胡葛蘭發揮老式鄉里的睦鄰精神，須要時就互相幫助。「因為到處都在開發，因此我們做了很多考古學搶救工作，」霍夫曼說：「我們到處幫忙。上個月開發商碰上一個需要發掘的頭骨時，我們就去了沙巴島。」

傍晚，從白天熱過頭的田野現場歸來，齊聚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總部，那種睦鄰互助的情意滿盈。我們繼續其他考古學工作，清洗和記錄發掘到的物件。霍夫曼是前哥倫布時期加勒比海地區人口學專家，她在後院的野餐桌接待訪客。她的兩個博士生和我用舊牙刷清理文物，擦拭破陶片和羊齒上的灰塵和污垢。雞群在晾衣繩下啄食，蜥蜴（棕色條紋、綠身藍頭）快速爬過破門廊，繞行泡著舊船錨（另一件文物）的水桶。五十來歲的霍夫曼，

皮膚曬成古銅色，神色略顯慵懶，穿著短褲和低胸T恤，棒球帽底下一頭黑髮，金色耳環閃閃發亮，長相酷似艾莉·麥克勞(Ali MacGraw)。她的學生稱她為神（她的丈夫是半神，他們的兒子是幼神）。有人跟我說：「大家聚在一起，等她下指令。下什麼指令呢？誰來搖扇子嗎？」

我問霍夫曼，是否曾參與處理有機遺骸的工作，她說沒有，但她的丈夫門諾，最近在荷蘭發掘過幾處一八二〇年代的墳墓，所以「他必須處理那些臉部鬚毛和眼球。」眼球！她做了個鬼臉，我打了一個寒顫，但兩位坐在野餐桌上的可愛博士生卻毫無驚怯感；他們一位是牙齒專家，另一位專攻嬰兒頭蓋骨修顛術。修顛術確實存在於古代世界，父母把小嬰兒的顛骨夾緊、壓平並加以綑綁，讓頭部長得「不那麼尖！」我搶話插嘴說。但我錯了，的確有些父母非得把小孩弄成尖頭。其他父母喜歡讓小孩頭骨隆起，像超能壞蛋麥克邁(Megamind)。我了解為何這會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論文題目。

忽然間，霍夫曼在野餐桌上手宣布：「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來延續印第安那瓊斯的探險。如何？格蘭特，大家週五都可以出去尋找史前遺址吧？」這時候，吉爾摩從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散亂的陰影中出現，他剛和一群學生和志工把島嶼地圖的3D運算數據輸入。他同意出發探險。我們會參考聖馬丁考古學家留下的地圖，他曾在一九八九年帶領一隊學生穿過島嶼，標記地表發現和可發掘的位置。有個我們將檢視的點，位於奎爾峰

(Omit) 舊火山半山腰，另一個點在靠近奎爾山頂的叢林，吉爾摩的學生曾在那裡發現貝殼製的工具。

探險家之日隨黎明到來，在公雞的瘋狂叫聲中，天色隨之亮起。吉爾摩八點來接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從亮藍色的後門衝出，竄入迷濛的雨中，衝上打包完成的越野休旅車。田野班展開田野之旅！「大家來吧！」吉爾摩興奮地說道：「這部Land Cruiser可以搭載十三個海軍陸戰隊員！」於是，包括兩位新志工和荷蘭博士生共十人，一起擠成歡愉的人團，往奎爾峰一路顛跛前進，背包裝滿昆蟲噴劑和水壺。我又一次裹著輕便尼龍衫，長袖、長褲、長靴、厚襪子，軟盤帽的繫繩繫在下顎，隨時迎戰熱帶的攻擊。荷蘭人穿無袖上衣和短褲，在冷靜和活潑中充滿期待，其他人則包裹得幾乎看不到皮膚。吉爾摩在車痕交錯的奎爾峰停車，有人用全球定位系統(GPS)尋找一九八〇年代學生留下記號的區域。

我們踏上蔥鬱的綠色小徑。霍夫曼俯身撿起一塊珊瑚翻了翻。她說：「看看這個，你看扁平的這面？這肯定是手工造成的。」學生們對霍夫曼發現地景中古代器物的雷射感應讚嘆不已，我對她這麼十拿九穩的態度印象深刻。你如何區別這是人工刃邊，還是自然力造成的斷裂？這需要經驗，也需要辨識細微差異和人工模式的眼力。馬特跑回車上拿來磨利的砍刀，動手砍劈發現珊瑚器物所在後方的藤蔓。霍夫曼笑著說：「能夠馬上反應是好的，我說這樣做，他就去做了，對吧？」砍劈的時候驚動了荷蘭人稱為「Tacky」的黃蜂蜂巢，凶猛

的黃蜂盤旋在小徑上。一位博士生說：「別讓牠們纏住你。」我們小心翼翼在周邊的地面上戳探，但沒發現別的，於是放棄那個點。我們沿著小徑往前漫步，走到可以看到大西洋壯麗海岬的高地牧牛場。環顧周遭美景，這不就是成為加勒比考古學家的最好理由。

印第安那瓊斯的冒險

我們重新集合並徒步返回，把黃蜂之下的珊瑚器物拋諸腦後，來到四處雜草叢生登山口，登頂奎爾峰。吉爾摩帶隊，我們跟在後面縱隊前進，上坡路令我喘息不止。攀爬的時候，大家的褐色肌肉都晃動著。當我們到達吉爾摩的學生曾通報發現器物的區域時，他要我們尋找果樹。不管是殖民時期、前哥倫比亞時期或是古代，人們尋覓著誘人的果樹。我們散開來，躡手躡腳找路就像山羊要走過大蟻穴和蜘蛛網。我們循著掉果腐爛氣味找到芒果樹，並集中搜索那一帶。

我們都懷抱甜美的懸疑感，因為古人曾在此走動，而我的渴望特別強烈。翌日農園發掘後，吉爾摩要我填平兩個探坑。我仔細用泥土填坑，但坑角的釘子標記顯得凌亂，因此我把釘子收起來，就像跟在孩子後面收拾東西一樣。稍後勘测此區的兩個荷蘭人對吉爾摩喊道，他們找不到兩個探坑的標記。我說：「難道我不該收掉釘子？」吉爾莫平靜地回答：「我有

要你拿掉釘子嗎？」我想確認自己犯的錯有多大：「該不會跟刪除電腦六十筆場址資料一樣糟糕吧？」吉爾摩包容地說：「不會，不會，你只抹掉兩個。」我在這個探險日幾無訓練卻極度懊悔，因此我表現得更拚命。不久，我在芒果樹下發現兩個破貝殼。沒破的，不特別，但破掉的意思著，可能有人想用來製作器物。吉爾摩檢查其中一個貝殼，他指給一位博士生看，博士生並未刻意停下手邊工作。「這比較像是寄居蟹，」他說。這對我真是莫大的救贖。

山上突然傳出一陣騷動。有人大叫「黃蜂！」另一人在擱自己的耳朵，一位荷蘭考古學家大喊：「快跑！」我們十人都快速穿越林子往下坡逃竄。吉爾摩拍打法律系學生湯瑪斯的頭，從他的長髮拉出一隻黃蜂。荷蘭隊友則蹣跚爬越，大吼大叫。我走近半路躊躇留步的吉爾摩，他的手往下指著，並靠近兩株植物：「百合，這不是野生的，是奴隸拿來種在墓地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標示物當中，這似乎是最有指望的，但吉爾摩會先註記在地圖上，以便往後調查。「快點，黃蜂還纏著我們！」志工從更遠處傳來喊叫聲，我們往下跌跌撞撞衝下最後一段斜坡。當我們衝到路上，湯瑪斯垂著頭，霍夫曼正用衛生紙從他的頭髮裡拉出另一隻黃蜂。一位荷蘭學生正在處理她腰間被叮的傷口，另一位則抖掉他手臂上的刺。

你是說黃蜂？一群結實又強健的考古學家被昆蟲打敗？我知道這似乎很蠢，但想想考古學家在中美洲考古發掘遇到可怕的蛇、蜘蛛和蠍子時說過的話，他淡淡揮揮手說：「蛇是愚

蠢的，蜘蛛善良可愛，我們害怕這些生物並不合理。」那什麼是合理的恐懼？「叢林中最致命的是蚊子。」他宣稱。而最有可能置我們於死地是什麼？「是蟲子。」

這些蟲子並不是小蜜蜂。「這是非洲殺人蜂。」吉爾摩解釋：「牠們大約五年前出現在島上，有哨蜂巡邏所屬領域，會在你頭上彈跳，戳撞你的額頭，如果你不走開，牠們會纏著你。」天啊，襲擊人類的蟲子。

但考古學家沒有被嚇壞，也不煩惱。每個人滿臉通紅，似乎以一種（或許可名之為快樂）高亢狀態在養精蓄銳。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覺得有樂趣。即便有兩隻瘋狂的黃蜂試圖鑽入他的頭殼，但湯瑪斯擺脫叮咬後依然笑臉迎人。這比待在法學院有趣多了！這是我們渴望的冒險，印第安那瓊斯的冒險，由我們和一群殺人蜂擔綱演出。

吉爾摩坐在島嶼北岸熱蘭灣（Zeelander Bay）舒適的家中，望著他的妻子微笑著，她正在向我說明她青春時期是如何愛上考古學。喬安娜比吉爾摩小十歲，聲音嬌美、和善中帶著鐵石心腸，她曾研究麻瘋病人骨骸損壞的情況。她第一次來到斯達夏與吉爾摩一起工作的時候，是一名碩士生，而他是倫敦大學學院的博士候選人。後來她成為他的女友，然後成為他的妻子。她害羞地告訴我：「有一年，格蘭特送我一個頭骨當生日禮物。」「真的？哪一年？」我問，然後他們夫妻倆開始討論起來。夜風來回吹拂著海灣，他們的小孩在屋裡睡著了。「二十一歲的時候嗎？」她想了一下。「不對，是再過幾年。肯定不是聖誕節。」他

說：「不是聖誕節，那會嚇到你媽。還是情人節？」這是一個謎。接受解謎訓練、在地圖上標示並記下日期的人，卻搞不清楚自己過往那段鮮奇的事發生在哪一年。

終於下雨了。我抵達斯達夏之時，就已在海外盤旋、威脅島嶼的熱帶風暴，終於來了，帶來酷暑八月的傾盆大雨。大雨把我們這些小志工關在室內，上陶器課並講故事秀圖片，討論十八世紀的菸斗、鏡子和墨水瓶，有些標示著「警方證據」，因為是從試圖走私出境的醫生手中沒收的。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陶器？因為它存放得久。千百年來，大多數文化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製造陶器，因為它呈現令人驚嘆的多樣性，讓我們知道陶器製造者和使用者的故事。我擦拭來自歐洲和亞洲的乳白釉和珍珠釉陶器，感受本地石釉陶器上的一層粗鹽釉。吉爾摩想到，新來的志工考特尼上過陶器課，並借她的經驗來解釋，差異是怎麼造成的。他向我們介紹斯達夏美麗的六角形藍珠，對收藏者來說，這個著名的藍色珠價值一百五十美元或兩百美元。我曾涉獵珠器考古學，訂閱《珠器研究社期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Bead Researchers*），也曾飛往婆羅洲參加珠器國際會議。每當有暴風雨，珠器和英國人燒毀斯達夏倉庫沉落的物件，就會被沖上岸。吉爾摩說：「我敢說，暴風雨後你們三、四十人一定會去海灘尋找藍珠。」

熱氣騰騰的隔天，我們回到甘蔗園，這次是來學習如何操作全站儀（total station），也就是測量距離，和幫助考古學家定位考古場址的測量工具。吉爾摩攜帶一套高科技工具，以及同樣重要的一套低科技工具，也就是十九世紀版狄德羅（Diderot）的《貿易與產業百科全書畫報》（*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rades and Industry*），該書有詳盡的圖示，包括糖廠在內的各種行業如何運作。如果對它們一無所知，你就無法辨識文物。這是歷史考古學、產業考古學、軍事考古學，以及任何類型的考古學挑戰之一。你必須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挖一個甘蔗園時，必須知道糖廠的構成物件是什麼，才能辨認進入煉糖過程轉為蘭姆酒的物件。如果我們眼力好，也許能找到從粗糖萃取糖蜜的錐形糖鍋。

下課後，吉爾摩和志工操作篩網，而我不斷穿插提問並做筆記。

「哎呀，蜘蛛。」我聽到吉爾摩說，但我正在胡亂塗寫中，沒有看到他從篩網中挑起蜘蛛往肩後拋。幾分鐘後，又出現一隻灰色的狼蛛，有嬰兒拳頭大小，在他襯衫前緣。我感到毛毛的，從沒見過吉爾摩如此一動不動的。他站起來，除了眼睛，全身僵止，用期待的眼光看著我。這是抉擇的時刻，是要把兩個測試坑的事情一筆勾銷，還是要袖手旁觀，讓我的第一位考古學老師遭受狼蛛攻擊。我不能讓他再次失望，而我也需要他，他是考古資料的來源，也是我的毒樹木老師，他還提供我去機場的座車。我用鉛筆伸入蜘蛛底下，試著將牠撥落襯衫，但這要命的東西不停爬向吉爾摩的脖子。當我觸及蜘蛛的胸肉，把牠彈到吉爾摩的肩膀上，他說的不是謝謝，而是「我覺得你弄傷牠的腿了。」

「你擔心牠的腿？」我大吃一驚。

「拜託，牠是無害的。」他說完後，再去撿拾篩網篩下的泥土。這時，我們看到藍色閃光。他拿起來貼近臉，「是藍珠嗎？」我屏息問道。「不是。」他說：「這是螻蛄的卵殼。」接著把它扔掉。

我在田野班的課程接近尾聲。我離開吉爾摩和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跟著荷蘭考古學家到海灘散步。有時我們會在此游泳的海灘很小，它位於碼頭舊橋和岩石露頭之間。斯達夏有它的魅力，但是站在加勒比海岸，就看不到這個島嶼了。如果你想往城北海岸線走，必須經過一個潛水中心，穿越飯店酒吧後面的停車場，小心翼翼的通過垃圾桶和流動廁所，然後在岩石上找到出路。我跟著霍夫曼和她兩個學生安妮和海莉，沿著觀光景點跨過沙地走向廢棄的癲瘋病院，看見海浪拍打在岩石上。

我們看見海水是如何拍打島嶼的海岸，大約六英尺高的崖面，從雜草叢生的岩石露頭栽入僅存的沙灘。安妮指著一個泛白、表面粗糙的懸崖：「這是頭骨的一部分。」這嚇了我一跳。「人的頭骨？」「是呀！」她和海莉往前移動，以便看得更仔細。霍夫曼正在檢視附近的一堆石頭和貝殼。「這是一個垃圾堆。」她說：「一個垃圾場，大約有一千多年歷史。」這些考古知識的豐富資源，卻任憑風吹雨打，有些會在接下來的風暴中被沖走。我問她：「誰擁有這片土地？」「這是政府的土地。」霍夫曼說：「我不曉得他們是否認為這些值得考古發掘。」

我沿著岩石走去，差點踩到一片彩繪陶器碎片，它躺在低潮海港岩石旁邊，向我眨眼。你知道嗎？當我把它撿起，放在指間翻動，是一個精美的陶片（是石釉嗎？）大概有三吋長，邊緣下方塗上藍色，以及藍色和紅褐色的景物，過度磨損而難以確定畫的是什麼。這是來自英國人燒毀的倉庫遺跡嗎？我把它包起來帶回去給吉爾摩。「這是很好的陶片。」他說著並將它翻面，然後打電話給馬特要他來看看。他的結論是：很可能是十七世紀德國威斯特沃（Westervald）出品的。我感到一陣發熱。他沒有責罵我撿起它，畢竟考古學家希望文物擺在它的脈絡中，以便更為完整地了解它們來自何處，以及如何嵌進歷史場景。若是我將它留在原地，這個陶片很可能就隨波浪消逝。吉爾摩把它歸檔，加入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的文物中。這些文物都是從土地挖出或從大海撈出的陳年碎片，小心地貼上標籤並加以保存。這裡的考古記錄當中，現在有我的一份。

1 摘自麥克斯威爾人類學博物館的一個展覽，新墨西哥州阿爾布克基（Albuquerque）。

2 二〇一三年三月初，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搬到比較不那麼時髦的奧倫吉士達地區的聚落。

考古學家生存手冊

——我們的祖先是天才

約翰·謝伊 (John Shea) 腰間掛著一把帶鞘瑞士刀，他的助教肩上扛著一把阿契利 (Acheulean) 時期的古代巨斧，他們踱步穿越多風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校園。因位於幾萬年前的冰河末端邊緣，校園裡散落著岩塊巨石。在「人類起源考古學」講座上，謝伊為我們這些學生畫圖說明，跨越地平線遠道而來的各種早期人類有什麼不同。我們的遠古祖先直立人 (*Homo erectus*) 又高又瘦，是善於壓制獵物的獵人，他們圍捕獵物就像一群帶刀的狼。另一方面，尼安德塔人 (*Neandertals*) ——謝伊教我拼成「Neandertal」——是伐木人。「他們擁有水桶胸的身材，像個足球後衛，或像是波士頓棕熊隊，或是像我。」謝伊說，尼安德塔人結實多毛的外型，正是男性考古學家具有的典型身材。俯看這場景：溫和的石溪分校學生正滑著智慧型手機或三五成群聊天，看到兩名帶著傢伙、長得像尼安德塔人的男子嚇人地走近，便讓開路來。謝伊承認：「我曾經被校警攔下。」

他的辦公室有形形色的武器、刀具、三角矛頭和斧頭，擺在辦公桌、窗台和書架上，有他考古發掘的紀念品，以及用打石技巧琢磨、獨具風格的石器製品。謝伊是一位古人類學家，也是石器專家，他研究古人類和他們的工具。二〇一一年底我們相遇時，可以感覺到四十九歲的謝伊依然渾身孩子氣，他出身麻州勞工家庭，在緬因州北部阿卡迪亞族 (Acadian) 祖母家附近的森林度過童年。「我大概七、八歲時，家人就知道我會成為一名考古學家。」他說：「我在後院挖坑，製作原始工具。《林間最後的小孩》(The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就是在講我。六〇年代末的一個冬天，我被大雪困住，《時代》生活叢書有關史前的書籍在下雪之前送來，書裡都是有關早期人類如何製造工具和各種矛頭的圖片。我想：哇塞，這太有趣了！」謝伊家附近很難取得像石英岩或玄武岩這種好的打石原料，但鎮上的垃圾場卻有很多玻璃，他在鎮裡的大學打工。「垃圾場管理員是考古學家最好的差事。」他說，有一回他發現廉價酒瓶瓶底是練習打石最好的原料，他把酒瓶敲碎。「你可以用來製造大矛頭。」

「對我來說，考古學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石器連結人類和他們處置環境的方式。所以它們是工具，是達成目的的手段。我是這樣看待器物的。」他舉起沉重的斧片，一個大鬍子男人在昏暗的辦公室舞刀弄槍，我屏住呼吸。「我同事會說這是一把瑪雅三型古典斧頭。」這是很好的命名，專家可以解釋三型、二型和一型之間有何不同，但謝伊的打石匠經驗從中看到更多，富有特定歷史意義的獨特器物。「我能看到挫痕與裂痕類型，也許製造者要磨利時弄

壞了，這就像我看一塊石頭就像你在看一本書的脈絡。」

謝伊談到最近有關早期人類的新聞。遙遠的喬治亞發現直立人頭骨，或在印尼出土的小佛羅瑞斯人〔*Homo floresiensis*，綽號哈比人（*Hobbit*）〕，或用小指骨識別智人（*Homo Sapiens*）的一支，稱為丹尼索瓦人（*Denisova*）。遠古祖先生活之所以引起他的興趣，不僅因為這是考古學主題，他也融入古人類的生活，包括生火、製繩、追蹤動物（雖然他不打獵，他會說：我認為這太殘酷），或花幾小時以碎石製作矛頭。如果你不嘗試去體驗他們的生活，又如何了解早期人類呢？

生活在冰河時期的好處

石器啟動了謝伊的考古事業。他的石器實務經驗讓他獲得貝里茲一處考古發掘工作，在附近進行考古發掘的研究生，把他介紹給剛受聘於哈佛大學、著名的南非考古學家格林·以撒（*Glynn Isaac*）。學生告訴謝伊：「他們會收任何人。」哈佛大學研究所已經拒絕了謝伊，但以撒見了他，詢問石器的事。謝伊把手伸進裝得滿滿的背包，拿出矛頭和刀器。不久，以撒幫他安排哈佛全額獎學金。此後，謝伊以石器專家身分周遊世界的考古發掘現場。他說：「我是考古學界的阿甘。」他曾經在歐洲、約旦和以色列工作（他在以色列時，醫生從他嘴

脣和牙齦取出鱗菌菇）。他最近寫一本近東石器的百科全書指南。他曾在厄利崔亞（*Eritrea*）和坦桑尼亞工作，在肯亞和石溪分校同事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共事，李基是傳奇考古學家路易斯·李基和瑪麗·李基（*Louis and Mary Leakey*）的兒子。在伊索比亞，他看見當地小孩攜帶卡拉什尼可夫（*Kalashnikovs*）衝鋒槍晃來晃去。

在伊索比亞，謝伊貢獻最新的考古記錄。早在六〇年代，李基就在伊索比亞南部的歐莫河流域基比什地區（*Ono Kibish*）發現幾件古智人頭骨，估計有十三萬年。謝伊說：「這地區非常偏遠，工作非常艱困，部落之間不斷以牛隻互相襲擊，所以很危險，但幾個考古學家下定決心的說：我們有了岩石定年的新方法，讓我們去看看吧！」他們想找到墓葬遺址，試著替尚未受到擾亂的地底岩石定年，但李基的早期探險還沒有全球定位系統。「我們和地質學家一起擠在車裡，透過比對那時拍攝的超八厘米電影定格找到遺址。」已經四十年了，但是「我們發現同樣的灌木，同樣的樹，同樣的岩石露頭，和同樣可以拼接的斷裂骨頭。沒有比這更棒了。」將頭骨下方的岩石定年，團隊估計歐莫基比什遺骨的年代不只十三萬年前，而是十九萬五千年前，這已是發現最古老的智人化石，謝伊以驕傲的口吻說：「這是屬於石溪人的發現。」

歐莫基比什也帶給謝伊新證據，支持他對史前祖先智力的假設。他是所有科學家中小數看到原始人的天才，但有個觀點一直困擾他：從某個時間點起，早期人類開始以現代人的方

式思考和行動。他告訴《科學》雜誌，這是「十九世紀的科學模型，認為演化具有方向性，而以我們現代人類為終點的想法……這令人為難，我們再也不需要這種想法了。」謝伊認為，以他在伊索比亞尋找智人化石時發現的石器矛頭來說，由於作工如此細緻，製作這些石器矛頭的人不會是原始的。「他們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他認為他們跟當代人的智力和適應力相當，彼此若有差異，也只不過就像我們和其他人種之間的差異。相較於我們，他們只是面對不同的環境和挑戰。

謝伊像在為我們對抗誹謗而單打獨鬥。他指出，尼安德塔人是唯一的靈長類名字成為一種侮辱的物種，但尼安德塔人作為一個物種存活了幾十萬年。這難道不該獲得尊重嗎？謝伊當然是公務員保險公司（GEICO）聰明又嘴賤的穴居人舊廣告系列的粉絲，他說：「這些廣告裡有真理的元素。」他喜歡這些廣告，寫了一封信給拍攝影片的廣告部：「感謝你們，讓史前考古學教起課來更容易。」該公司雖然從未回應，但後來公務員保險公司承諾拷貝一張誤解穴居人的照片給他，讓他收入科學論文。

謝伊熱衷的主題可以縮小到一個時代，特別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從二十萬年前到四萬年前。他說：「為了看到美麗新世界，我想生活在冰河時期。我想當第一批從西伯利亞往下走到下四十八州那批人的一員，第一批美國人之一……生活在冰河時期的好處之一是周圍不會有很多人。你要不斷遷徙，而且必須靠智慧過活。你不能只有十五種工具，其實也沒辦法攜

帶這些工具。沒有村落，也就沒有村落裡的笨蛋。想像一個沒有笨蛋的世界！」他喜歡說，笨蛋是無法在有獅子的環境下活下去。

在長島郊區的石溪分校，謝伊這種人最不可能住下來的地方，卻變成最常見到他的地方。他回憶學生時代，曾飛過這地方的上空。「我第一次出國從埃及回來，飛機駛出甘迺迪機場，然後翻轉航向波士頓。往窗外看去，我只能看到納蘇郡（Nassau County）。你知道的，房子、房子還是房子，車子、車子還是車子，游泳池、游泳池還是游泳池。我跟教授說：你看看，我永遠無法在那種地方生活。之後我得到這個工作，我打電話給他，他說：太好了，約翰你在哪裡？我說：你不會相信的。在長島？是的。」

謝伊與同是考古學的妻子派崔夏·克勞馥（Patricia Crawford），住在離校園約兩分鐘自行車程的地方，他說：「要聽到宿舍的活人獻祭是夠近了。」為了擺脫住郊區的幽閉恐懼，他和克勞馥常騎自行車超過三十五英里。夏天時，謝伊經常前往非洲參加考古發掘。他們最近在聖塔菲（Santa Fe）買了一間小屋，每年到那裡四、五次。高地沙漠最讓謝伊有家的感覺，「一走出家門就置身山中，附近還有山獅跑來跑去。」

還有什麼能比在二十萬年前的非洲醒來更好的事？謝伊說，如果你是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或直立人，「你知道會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嗎？就是在地面生活，因為你必須爬到樹上睡覺。為什麼要在樹上睡覺？因為至少有五種不同的食肉動物在你附近過活，

牠們都在夜間獵食，而且具有夜視能力，嗅覺靈敏可達數公里。你已列在牠們的菜單上。」謝伊有狼一般的臉龐，會在潛行獵食者的挑戰中智取勝出。他會沒事的，但我會變成牠們的嘴上肉。而你會如何呢？

不過，先別管食肉動物了。誰能幫忙解釋古代人類的考古學嗎？「Homo」這個字已讓我搞混了（古代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有誰能比找到智人最早證據的人更適合引導我們呢？我問謝伊，能否去聽他的課，他馬上答應讓我去旁聽他的「人類起源考古學」，但我沒告訴他，在高中生物課堂上，我解剖麻醉過的青蛙，牠卻掙脫腿上的別針跳開。

從冬天到春天，我每週上兩次謝伊的課，學習世界各地重要考古學遺址所進行的虛擬實境。謝伊要學生用考古學家的方式思考，於是我們關注考古專業所發現的一切，並試著把像器物、藝術、建築、墓地的片段拼湊起來找出含意。在謝伊無所忌諱的嘮叨中，我獲得許多啟發。你知道我們原人祖先的大腦，足以容納兩杯啤酒嗎？但現在我們的大腦已大到足以容納六罐啤酒。我開始了解在時間洪流中，這些考古學知識有多麼渺小、零散又撲朔迷離。

我學習考古學語言，稱呼曾在歐洲土地上遊走、胸部寬廣突出、隨時備妥石器的人類為尼安德塔人。我丈夫覺得我的念法很拗口，但我對他說：「難道你以為教古人類學的人，會不知道如何正確發音嗎？」我指出，最近公共電視（PBS）或國家地理頻道（不談外星人的頻道之一）放映的紀錄片中，配音員顯然是外行人，他的發音是尼安德索人

（*Neanderthals*），而考古學家的發音是尼安德塔人（*Neandertals*）。我投入考古學家的行列，堅持採用考古學家的發音。²

旁聽謝伊的課的學生已有五、六十人，教室前方是上世紀留下的黑板和投影螢幕與講桌。透過長窗，我們可以聽到工程車嘎嘎作響，大學拚命地蓋更多時髦校舍。研究生都還邋塌，除了紫色、橙色、綠寶石色的光鮮高檔運動鞋之外，他們一點也不浮誇。他們計劃在學期中開車到孟菲斯，參加考古學大會。在田納西州沿路停下來，採收燧石塊用來學習打石的材料。他們興奮地看著孟菲斯一間酒吧的露台，拴著一隻活蹦亂跳的山羊。對這些學生來說，山羊不只是兄弟會惡作劇的花招，他們還有很多關於山羊的經驗。他們曾研究山羊馴化史、中東的食用山羊，他們也從世界各地考古發掘中辨識山羊的骨骼和牙齒。山羊在課程中扮小而關鍵的角色，當謝伊宣布考古學學會將再次舉辦春季烤羊時，逗樂了這些研究生。他會教我們如何製作自己的石器，用於屠宰山羊。他向我們保證，這將是春季社交活動。其實山羊是從附近肉販買來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起中學時的解剖課，當我膽小的用解剖刀捅一下時，青蛙卻甦醒過來。

謝伊以非正統的思考方式設計「人類起源考古學」課程。已二十多年的傳統記敘式教學法，是依照時間序從最早各種人類講到現代，但謝伊打算用不同的教學法。記敘故事體已經存在約五千年，謝伊說：「這在人類之間是普遍的行為模式。」他認為這對科學課程來說，

是有缺陷的模式。他指出：「記敘體把現實的複雜性排除在外……把人類起源的故事，建立在目前所知有限的資料基礎上。如果你在辨認人類先祖的時候犯了錯，或誤解他們被迫離開森林的原因，或在工具的使用、兩腳走路，或搞錯了到底什麼才是導致他們成功的原因。如果敘事早已存在錯誤，那麼加入敘事的每件事也都錯了……這門課就像搭時光機回到過去。這是《扭轉時光機》(Hot Tub Time Machine)，只是沒有電影裡的浴缸，否則會遇見一九七〇年代的尷尬記憶。」

他上溯六千年到八千年，從數千、數萬個考古學遺址挑出十個，再從中東、歐洲、中國、印尼、北非和南非，依區域排列，最後來到少數可用的東非古遺址，人猿和類人猿等人類曾經生活的地方。(古人類學家對美洲不太感興趣，不論是北美洲或南美洲都太年輕，幾乎一萬三千年前或一萬四千年前，都沒有人類存活的證據，謝伊說：「我連一萬兩千年前的美洲都不加理會」。)不過，走上想像的旅程之前，必須理解一些科學原則，尤其是考古學家採用地質學的均變論(uniformitarianism)：只用現在可觀察的過程來解釋過去。「如此可以把不利的觀念完全排除，不列入研究表單，就像古代外星人那些題材。」謝伊解釋：「當代有人看過外星人降臨，又幫我們出主意構築建物嗎？」

謝伊希望我們能像優秀的科學家一樣，能夠區分詮釋和觀察的差異。他在桌子上放一個水杯來描述。半滿？半空？既不涉及判斷也不渲染描述。好的科學家只會形容它是半杯水。

要注意，做描述時可能出現的不經意偏見。此外，我們還必須記住某些文物，根本不曾出現在考古學記錄中。「假設古人類宰了一頭羊、造了幾艘獨木舟和一把吉他，最後，木工遺物是不會留下來的。經過幾個冰河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宰羊遺址。」為什麼古人類學家會對火石著迷？因為這是倖存的文物。

另一門重要功課是：謝伊要我們從世上一切皆可一分為二的概念迷霧走出來。每個故事都有兩面舊觀念，抹除了故事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面。即使把過去兩百五十萬年區分成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都太過簡化。「寫下來，」他說：「二分法是笨蛋。」冬去春來，一有空檔他就會問：「誰在用二分法？」年輕有力的聲音齊聲回應，有如尼安德塔人準備伏擊龐大長毛象時的呼聲：「笨蛋！」

我們的課程從中東開始，首先是新石器時代密集的耶律哥(Jericho)村落，也被稱為蘇坦土城(Tell es-Sultan, Tell是指世代居住並持續堆疊的土堆)。結果數個世紀後，耶律哥人住的地方變成七十英尺高的土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移往山下路邊，而要打掉舊的泥磚屋加蓋新屋，結果造福了數百年後到訪的考古學家。考古學家喜歡土堆，因為像千層蛋糕，前陶器時代的遺留物在底層，上層則是近代人的沉積物，包括陶器和啃過的動物骨頭。

我坐在一張不舒服的塑膠椅上，看著教授用粉筆畫著圖表，我沉思考古學家對墳墓和垃圾的投入程度。即使距離八千年，我也聞得到腐臭味。考古學家掰開勞苦的古代農民一張張

嘴，看到「大部分都罹患牙周病」。謝伊告訴我們：「這些傢伙比起我們現代人較矮、身形較為弓曲，而且比我們更體弱多病。果真如此，他們可能只剩下半數牙齒。」牙齒是考古學家的金礦。有位考古學家跟我說：「就像嘴裡的化石。」此外還有墳墓（很好，這次旅程我們會爬進不少墳墓）。耶律哥人把死者埋在住處附近，埋在他們生活區域底下，即使是死去的小孩也會加以埋葬。但幾千年前的狩獵採集者，卻把嬰屍當垃圾丟掉。

誰知道為什麼？

耶律哥出土的彩繪、裝飾的人頭骨，有來自遠方的綠松石、黑曜石和貝殼陪葬；而且築牆圍起，也有一個塔。謝伊一頭栽入去探索那些石器（lithics），也就是石造武器。有幾種不同的矛頭在耶律哥出土，包括小石鏃、有許多缺口能重創獵物的長矛頭，也有「超級尺寸的特大號箭頭，被刺入保證攪破。」謝伊說：「這可能是用來癱瘓獵物，但你不希望獵物被打傷後跑掉。什麼時候癱瘓牠，會比殺掉牠好？」我環顧課堂上的同學，個個面無表情。我們吃的漢堡，裡面夾的漢堡肉煮熟前已經有人幫忙絞碎，為了吃肉去和獵物搏鬥，鐵定出師不利。「有誰是退伍軍人嗎？」他問：「對戰中打傷、打殘對方，是什麼意思？打死一個算一個。打傷一個卻可以讓三個人在戰鬥中出局。這些不是狩獵武器，而是戰爭武器。」

謝伊把時光機回撥到兩萬五千年前，來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那時的人們花大量時間製作工具和工藝品。謝伊告訴我們有關下維斯東尼查（Dolní Věstonice）的奇妙遺址，位於現在的捷克。長毛象的骨頭散落在現場，框建在石座上的圓屋。下維斯東尼查人珍愛長毛象的骨頭，他們用來當燃料（想像那惡臭味）。他們還用象牙或其他材料雕出結實的小人像，頭小小的，乳房和臀部卻很大，刻出狹縫做外陰部，以及一雙寫實的腳。這很普遍，歐洲到處都看得到這樣的維納斯人型。下維斯東尼查真正特別的是陶器，這些陶器不是製成裝盛食物或飲料的容器，卻做成動物雕像。這些最早的陶工也製作攪入氧化銅和鹽的陶土球，加熱燒製使動物雕像堅固；加熱陶土球使他們在有色火焰中爆開，這是古代的鞭炮。

墳墓是這個遺址最奇妙的一部分。謝伊提到的三具年輕遺體格外神奇，刻意的排列讓我們不得不聯想殮葬者有意透露什麼故事。謝伊描述這場景：左邊是二十來歲的男性骨骸，頭骨掩埋在紅赭石粉末裡，他的一隻手擱在置中那位、顯然是女性的骨盆上。中間那位女性背骨殘缺，微向右側另一位男性彎曲。他們的手臂串聯，兩者頭部也覆蓋紅赭石粉末。這是肥皂劇？三角戀情？古老版本的羅密歐與茱莉葉？不論是從隱含的意義還是細部元素都是個謎。就以赭石粉來說。我們可以想到赭石粉做的粉筆是畫圖或身體彩繪的好材料，但為什麼要用赭石粉陪葬？智人與尼安德塔人都使用礦物顏料陪葬死者。誰知道為什麼，維納斯人型在歐洲到處可見？誰知道為什麼，一大堆出土的手斧遍布非洲、歐洲和亞洲？「誰知道為什麼？」

麼？」這句話經常出現在考古學論文中。

考古學家活在謎團裡。捉弄人的是，挖開考古遺址並從各種角度研究它，不曾回答所有問題，卻總是引發更多問題。我們研究考古學，蒐集人類過去真實的斷簡殘篇，但我們越是回到更久遠的過去，越是看到人類歷史畫面的不完整。

下維斯東尼查還有另一個奇怪的墳墓，這是個老婦的墳墓。她被發現在一個長毛象的肩胛骨下方，旁邊有狐狸骸骨，科學家說，從她的臉骨可以看出左臉塌陷。下維斯東尼查附近也發現，象牙雕刻的頭像和刻著人臉的象牙花片，結果發現，兩者都是左臉塌陷。雕刻頭像有拇指般大小，「雕刻這象牙應該要花幾十個小時。」謝伊心存敬意地說，那婦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下維斯東尼查人或許神祕陌生，但上溯兩倍時間，到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尼安德塔人，接著再往前數十萬年，先到海德堡人再到直立人，就像在觀賞嚴重受損、銀幕閃爍的黑白時空漫遊影片。尼安德塔人分布於歐洲和東地中海黎凡特（the Levant）之間，一直到俄羅斯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住在山洞裡。他們也曾住在其他房屋嗎？我們只知道那些住在洞穴的，他們的遺跡被保留下來。尼安德塔人和智人都曾經居住在黎凡特；那麼，為什麼在八萬到五萬年前此一重要時期，智人在這區域的考古學記錄不見蹤影。再問一次：誰知道為什麼？

尼安德塔人與智人是否曾經相互繁殖？二〇一〇年尼安德塔人送進實驗室做基因組測序，接著科學家宣布小部分的歐亞DNA可溯源至尼安德塔人，之後就引發這個熱門話題。研究成果在通俗報刊到處蔓延，「你就是摩登原始人！」「你要找尼安德塔人嗎？」然而，如同大多數古人類學的新聞報導，結論很快就被質疑。智人帶有尼安德塔人基因痕跡，是因為混血還是因為擁有共同祖先？演化遺傳學「是年輕的科學」，謝伊說：「他們不過是在一九九六年取得尼安德塔人的DNA，結論依然混沌未明。」這對考古學家來說，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謝伊承認，麥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實驗室所做的基因組測序，聲譽一流，但他對實驗室的經驗沒有信心，「你所能做的只是在一旁看著採樣然後污染它。」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目前還沒有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兩者見過面。」因為從未在同時同地，發現尼安德塔人與智人的工具或骨頭。他以「我們的表親」稱呼尼安德塔人，並承認「尼安德塔人只不過是我們之中一些人的祖先。」他認為，一部分尼安德塔人的魅力來自他們的遺體很容易找到，有大量的標本，也因為歐洲科學家在自家後院進行考古發掘的傳統偏好，因為葡萄酒、乳酪和香腸伸手可得。

謝伊真正感興趣的是工具器物，某些地點的證據顯示，智人曾經和尼安德塔人使用同種刀具和工具，例如他在以色列發掘的洞穴。他說：「複雜的拋射武器似乎是智人獨有的，尼安德塔人似乎並不曾使用過。」

經過謝伊的精彩描述，我終於學會區分人類演化樹狀圖的糾結分枝。智人住在山洞裡，垃圾放前面、人睡在後面，海德堡人住的洞穴卻不是這樣。海德堡人可能是智人和尼安德塔人最後的共同祖先，他們在七十萬年到三十萬年以前，過著像兄弟會男兒（fat boys）一般的生活。古代男孩女孩祖先邈遠不修邊幅的想法讓我入迷。「他們擁有巨大沉重的石器工具……可能使用蠻力解決問題，好像行動不經大腦的突擊隊員，」謝伊隨興說著：「如果你打算去澤西海岸參加真人實境秀節目，你應該帶海德堡人一起去。」

更古老的直立人體格高瘦，像狼一樣追捕獵物，一百萬到兩百萬年前在非洲出現。大部分直立人的化石令人毛骨悚然，頭骨的部分不見了。被吃掉了嗎？我想到另一個體態狀似尼安德塔人的傢伙路易斯（Louis C.K.），他在滑稽脫口秀中提醒我們，每天上班途中已經不用擔心被獵殺或吃掉，他喊道：「我們已經走出食物鏈了！這是莫大的進化。」

再來是佛羅瑞斯人。二十一世紀發現高三英尺的矮人族，看來直到約一萬八千年前才出現在印尼佛羅瑞斯島（Island of Flores）。謝伊建議：「你想要出名嗎？去學習印尼話吧，申請許可後在那進行考古發掘。」

至於我們更早期祖先的不同樣態，例如原人（Proto-humans）中的傍人（Paranthropus）和南方猿人（Australopithecus），是兩百萬到四百萬年前出現在非洲的人種，他們有特大號的牙齒，這有助於他們啃食大量植物。謝伊說：「你走近他們會先聽到他們放屁。」好了

吧，我們絕不會把他們跟直立人搞混，更不會與智人混淆。

謝伊認為，我應該跟大學生一起參加人類起源考古學的考試。雖然我迷上海德堡人，又從已滅絕的許多古代人類故事中得到新趣味，但我還是嚇到了。重點是，我以為旁聽生不用寫報告或參加考試。謝伊說：「不，這對你有好處，會讓你的心智專注。就看你要怎麼決定了。」他之所以會想要我參加考試，應該是我翹了課，我的蒼白焦慮可能跟我的年紀有關。「自從上次你做科學測驗到現在有多久了？」他問。讓我算算看，從十年級的生物課到現在，四十二年了嗎？

考試當天，選了課卻不見得會上課的學生都出現了。考試前，謝伊提到伊拉克山尼達洞窟（Shanidar Cave），在五、六〇年代被考古學家索勒奇夫婦瑞福和羅斯（Ralph and Rose Solecki）所發掘，他們發現尼安德塔人以花陪葬的證據。這是令人吃驚的發現，但從未被驗證。很快的，這件事成為珍·奧爾（Jean Auel）暢銷小說的靈感來源，《愛拉與穴熊族》（*The Clan of the Cave Bear*）是她的首部作品。但謝伊很好奇，尼安德塔人真的用花陪葬嗎？還是當地穴居的嚙齒動物把花帶來呢？我持懷疑態度，我認為是嚙齒動物帶來的。

接著，謝伊發了考卷，大部分是複選題，有關全球溫度變化和地質紀元、石器時代兵器與陪葬品的年代測定，以及根據克里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滅絕的人類》（*The Humans Who Went Extinct*）一書撰述短文。題目是：「依照芬利森的看法，為什麼尼安德塔

人消失呢？智人演化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我忙亂作答、來回檢查、擦掉重寫、汗水滴到試卷上，我下筆寫著：尼安德塔人過著小團體的生活、棲息地狹小，面對氣候暖化、獵物種類改變時，他們的生存策略有限。智人的交通和貿易範圍廣，有靈活的應變和適應能力。一旦穀物收成不足，馴鹿又不夠，他們會打包家當前去表親的家。

考試結束後，超過危險標準的腎上腺素在我血管裡狂奔，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感到挫折而拍打方向盤。該死！機運！我忘了機運！機運和運氣，是演化存活的重要因素。

收入微薄的考古業

在紐約第二天，我走下地鐵階梯時感到胸悶。我放慢腳步，讓多變而複雜的智人同類從我身旁川流而過。如果我在地鐵車廂暈倒，他們會發現我的筆記本，寫滿謝伊的提示和佳句，謝伊曾自稱大鬍子怪咖（Beardo the Weirdo）：「絕對不要在水坑旁邊露營、不要跟河馬過不去、狒狒就像發瘋的德國牧羊犬，以及你們之中誰有封蠟？」刑事鑑定小組看到以上文字會下什麼結論？若我在烤山羊大會之前死去真是遺憾。骨骼殘留物和滅絕的鮮明想法，在那時湧上我的心頭。胸悶依然存在且開始疼痛，我急忙奔向急診室，吊上點滴，心電儀輸出

我的脈衝跳動圖，我心中默念護士問的問題：我是否壓力太大？

我看著她善良、關切的眼神。我告訴她，我剛做完幾十年來第一次的科學測驗。難道這會讓我心跳停止？

我並未停止心跳，但為了安全起見，我在醫院度過週末，讀著一千多頁的教科書《人類歷程》（*The Human Career*）指定閱讀的章節，並乖乖地做更多測驗，包括被急救人員圍著，在跑步機快走的測驗。我的心臟還不賴呢。

謝伊用電子郵件把考古學測驗結果寄給我，成績不差。「32/33」他寫道：「還不錯。」有沒有搞錯？只答錯一題？我感覺胸口的壓力減輕了。機運作為人類滅絕因素那題，讓我傷心不說也罷，我的確還弄錯納圖孚人（*Naturans*）那題，他們是一萬年前智人文化的一支⁵。可愛的納圖孚人，在現今的中東地區興盛幾千年。他們養狗、使用研鉢研杵，花好幾個小時把骨頭做成的珠子拋光。我想像中的他們是：好廚師、悠閒的鄉民、愛好工藝和藝術。如果我必須回到過去，我要做一個納圖孚人，和名叫荷馬的狗在一起。我們會吃瞪羚。這時耳邊響起謝伊的聲音：「瞪羚是納圖孚人的超級大漢堡。」

「裸身的小孩，從小河彎道靠近岩灘的隱蔽處跑出來。」聽到《愛拉與穴熊族》開頭第一句讓我心跳加快，這本有聲書陪伴我度過往返石溪的長途駕駛。奧爾的小說，場景設定在兩萬五千年前，講述走失的智人女孩被尼安德塔人收養的故事。這本書在一九八〇年非常暢

銷，之後的續集有五本，最後一本在二〇一一年出版，稱為「地球之子」(Earth's Children) 系列，⁶ 結合冒險和浪漫的冰河時期生存手冊。奧爾最大的成就是把穴居人的野蠻形象，以美麗、聰明、足智多謀的洞穴女孩取而代之。透過愛拉這個角色，奧爾創造了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 (Venus of Willendorf) 之外，舊石器時代晚期最著名的人物身影。奧爾透過考古學家提供的訊息，勾勒出書中精巧細緻又複雜的社會。

奧爾說，她本來想像的是「少女與完全不同的人類族群一起生活的故事，他們讓她留下來照顧族群中一位手殘的老翁。」她想把故事設定在遙遠的過去，但對這樣的時代背景一無所知。「穴居人是什麼個性？」她思索著。在她著手研究時，偶然翻到拉爾孚·索勒基 (Ralph Solecki) 的書，索勒基和妻子發現山尼達塌方處喪生的尼安德塔人，據信是以鮮花陪葬。「在世時瞎掉一隻眼、癱腿，而且一隻手臂從胳膊處截斷。這不就是我故事裡手殘的老翁嗎？他真的存在！」奧爾設定一組問題：「獨眼、單臂又癱腿的尼安德塔穴居老翁如何生存？他在部族分工的角色是什麼？是誰截斷他的胳膊？是誰幫他止血？他暈厥的時候是誰來進行護理呢？」接著，她在第一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中一一設定答案：她的尼安德塔人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巫師，照顧他的姊姊是位熟練的女醫。他們碰到異族人孤女愛拉，出於同情，他們收養她並納入部族。當巫師的姊姊過世，愛拉在她身上擺了花藥做成的花環致意。在書的謝辭中，奧爾寫到她如何被索勒基的作品感動並表達歉意：「這是科學事實用於小說創作成

為藝文協約 (Literary license) 的案例。但實際上，是一位尼安德索人把花放進墳墓。」⁷

奧爾顯然讀過索勒基以外的考古學家作品，其中某些考古學家認為，發現史前藝術的大洞穴，是分布範圍廣闊的部族季節性聚會場所。另一些考古學家，將尼安德塔人的骨頭損害描述為近距離獵殺，就像是牛仔競技造成的骨傷。她研究認知科學論文以設定尼安德塔人的語言，假定其發音聽起來比智人喉音更重，她替他們取了咕噠咕噠 (grunlike) 的名字，像烏拔 (Uba)、咕孚 (Goov)、克雷伯 (Creb)、布隆 (Broud)。來自歐洲和中東遺址的文物出現在她書中，例如到處可見的維納斯形狀的偶像，就被她視為崇拜大地之母的宗教指標，更成為遠方智人支系的共同宗教。她探索考古學家對特定文物的專業知識，例如籃子和紡織品分解較快，因此古代的婦女手工文物蕩然無存。奧爾知道，尼安德塔人和智人這兩種不同的人類，在歐洲的重疊年代可能有上萬年（在中東則重疊五萬年或更久），即使尚無考古證據，互相有過接觸是可能的。所以她設計雙方處於敵對的故事情節，並有許多戲劇性的機會進行互動。

在奧爾筆下，尼安德塔人行動遲緩、強悍、屬父系社會，智人則靈活、創新、屬母系社會，而愛拉成為兩者之間的使節。保護她的巫師兄妹過世後，愛拉被趕出部族並在遠方的山谷獨居，直到名叫姜德勒的旅人將她重新引入智人的世界。姜德勒的族人看不起卻又害怕尼安德塔人，管他們叫鈍頭族 (Flatheads) 和畜生。族人難以相信愛拉的故事，無法相信尼安

德塔人的咕噥聲和手勢可以構成語言，無法相信尼安德塔人社會的複雜度和精緻度和他們一樣。愛拉了解這兩個族群都是人類，地球之子。她是第一個平等論者。

奧爾透過她的女主角「愛拉 (Ayla)、奧爾 (Auel)」。這是巧合嗎？」遠望幾千年的人類演化。愛拉嫻熟算術和多種語言，並發明家畜馴養、騎馬、槍矛投射、骨針縫紉，並且開始用打火石打火（奧爾把陶器和肥皂的發明歸功於另一個角色）。愛拉也是一名出色的獵人和優秀的廚師。她是治療師也會整骨、施用麻醉藥草、調製迷幻混酒、避孕並治療宿醉。她甚至發現拉斯考 (Lascoux) 洞穴，並遇見繪製洞穴壁畫的藝術家。還有，她吹口哨引鳥落地、不僅馴養馬、狼，更馴養穴獅，這些動物對她完全服從。雖然救她的尼安德塔人覺得她很醜，但她是美麗、自然，有瀑布奔流般的黃頭髮。和完美身材。「噢！母親呀！噢！多尼 (Doni) 女神！」她的情人姜德勒常常這樣呼喊，以祈求女神降臨。跟愛拉一樣，姜德勒身材高大、金髮、身材健美，冰河般的藍眼睛。也許是少年阿利安人？

這套書有四千多頁，有聲書一百八十二小時，讀來卻欲罷不能。我發現下維斯東尼查也被編寫到故事裡，有段描寫專制領導人毒害三個年輕人，而臉龐局部癱瘓的長者，協助搞垮專制者。我在書中讀到一些獨白段落，說飲食配油脂真是太棒了。如果古人造訪我們的世界，他們或許對智慧型手機和無人戰機感到吃驚，對我們的無脂節食更會覺得不可思議。在書中我還讀到，勇猛的獵人愛拉背著自己的小孩，睥視凶惡的貂熊，手邊卻只有擲矛器可以自衛。奧爾引領我們進入這個危險的世界，但我們和愛拉站在一起，她的能幹、勇氣和智慧，克服路途上面臨的挑戰。書中也有驚人的意象，就像對愛拉的尼安德塔保護人的描述，提醒我們兩萬五千年造成什麼差別：「她的頭髮雪白，她的臉像羊皮紙包緊臉骨，以致於臉頰凹陷而雙眼深邃。她看起來已經有一千歲那麼老了，但其實她才剛過二十六歲。」

奧爾的書、訪談和演講，都在向她的權威題材來源致敬。系列第六冊，也就是最後一冊出版過後不久，奧爾和古人類學家伊恩·塔特索 (Ian Tattersall) 坐在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台階上。「三十年來，珍·奧爾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塔特索如此介紹她：「想重建消失的古代世界，且強調內容可信的人必須做好功課。這是古人類學的福氣……因為奧爾確實很努力做好功課。」著名的人類學家和尼安德塔人專家克里斯·史特林格 (Chris Stringer)，與奧爾連袂出現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他不像塔特索那麼熱情洋溢，但當奧爾說到，她真的用鹿的腦漿鞣了一張鹿皮，他感到吃驚。有位考古學家呼應塔特索的說法：「作者做了功課，你必須相信她。」如果你想了解古代藥草、屠宰長毛象、用野羊毛或獾的肛腺製作衛生棉，奧爾都能告訴你。塔特索說，奧爾對人很熱情。她和她丈夫於一九九三年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舉辦一場研討會，根據《考古學》期刊的描述，在那個「國際盛會中，學者討論了舊石器時代的符號，並享用香檳王 (Don Pérignon) 和來自奧爾窖藏的滴金莊甜酒 (Château d'Yquem)。」

但有些考古學家對奧爾的成功，及隨之而來的榮寵感到不滿。這不只是因為她賺了大錢。有位考古學家告訴我：「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是，她到法國南部，在各個考古遺址廣受歡迎。她還觸摸一些發掘出的遺物，若是我們去摸會被殺頭的。」他坐在她的演講聽眾席中，有七位男性考古學家和一千五百位女性。對這些我找來的男人來說，真是個難熬的夜晚。這位作家推翻穴居人原始、野蠻的形象，卻以憑空創造出幹練、適應能力強的女英雄取而代之。就像謝伊和其他古人類學者一樣，奧爾相信祖先很幹練。看看帳篷下那些她號召來的外行人，感嘆考古學的前景！

一九九〇年，奧爾在美國考古學會的年會演說，向齊聚一堂的專業人士保證：「沒有人比我更尊重和敬佩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其實，我多少算是個考古學狂熱份子。」但她接著說，這根本是考古學家的錯，即使大家聽過他們的夢幻研究，也了解有限。她發牢騷的說：也許考古學應該別再聽起來這麼科學，放棄如克洛維斯、薄刀片、更新世和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些術語。¹⁰「至少某些報告用清晰、易懂的語言來寫。」她接著說：「向大眾說傳奇故事，讓他們知道你正在做的事不僅很重要，而且有趣、刺激、引人入勝。帶他們進入你們的考古世界。告訴他們石器有多鋒利。」當我首次用黑曜石做成刀片，並且用它切下一塊皮的時候，我發現再也沒有什麼事能夠把我的想法轉變得如此戲劇化。

「跟大眾說說傳奇故事，他們會因此愛死你們。」她再次強調。

然而，她的作品不就是基於這些人的考古發掘、硬梆梆的科學，以及深奧的思維所構成？不就是這些人把成果交到她的手上，並且中斷自己的工作來回答她的問題？考古學家必須面對的挑戰還要加上一條：他們兢兢業業從事收入微薄的考古行業，到頭來可能被受益的人詮釋成是一種失敗，而不是一種志業。

成為真正的人類

謝伊的考古學狂人名聲被加油添醋，就像在《科學》雜誌公開他生平事蹟的故事一樣，開頭就寫到：「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的某一天，哈佛大學一位受驚嚇的祕書把校警叫來。一個似乎發瘋的年輕人，在哈佛大學皮巴迪博物館 (Peabody Museum) 的庭院，把一頭鹿逼得走投無路，並向牠投擲長矛。」鹿被刺死了，這是石器實驗現場，這位年輕人既沒有發瘋，也非狂徒。

我不止一次看到謝伊與人舌戰，他的方法之一是嘲諷。在課堂上，他質疑考古學家和大學行政人員的智力，而且經常罵髒話。當研究生一臉嚇呆的表情看著他，他卻一笑置之。在古人類學會的年會上，從早到晚為期兩天的發表會，包括豪威森谷 (Howieson's Poort)，希烏度 (Sibudu) 洞窟新出土的資料。謝伊從激烈辯論中找到樂趣，並且毫不猶豫地戳穿各種

假設。他對著標記未完成的斧頭（就像準科學家把杯子標示半滿）大叫：他怎麼知道這是未完成的？有個短小精悍的考古學家認為，在南非的遺址發現這些工具很不尋常，應該取個新名字，也引來謝伊的反對。「難道這世間真的需要這個嗎？」他坦率直言。

在考古學中，工具的分類和命名方式撲朔迷離。《演化人類學》一篇報告的副標題是「魔鬼的叮囑」(Advice from Uncle Screwtape)，謝伊採用石器分類的慣例。模仿C·S·路易斯原著《魔鬼家書》(Screwtape Letters)，謝伊扮演魔鬼的角色叮囑後生晚輩，如何研究與人類演化不相干、持久耐用的器物。謝伊以符合他個性的口氣寫道：「親愛的侄兒：很高興得知你決定從事石器研究。你做了明智的選擇。數百萬年前，會說話的猴子把這些光滑的物體拖回洞穴。千萬別為了你要描寫的事情感到困惑。」他建議：「如果你和同事對於如何分類特定器物的意見不一致，請建立和他不同的分類……當你寫到石器的功能，別浪費時間做實驗……用你的直覺，並把你對石器功能的假設放進工具的名稱中，例如刮刀、手斧、劈刀。」這很合理！拿石器來做實驗，是找出其功用的好方法，如果你不知道工具的功用，理所當然不應該將它標註為刮刀。對於分類，謝伊告訴我：「大家都說很混亂，即使在這一工作很久的人也如此說。」為什麼考古學家總是想替某種類型的石器取新名字？因為一旦命名被提及，命名的人就會被提到。

會議結束後，謝伊將剛才的舌戰拋諸腦後，雖然他承認對小型古人類學會議的熱血鬥智樂在其中。在更大型的考古學會議中，大家為了表現得體都太客氣了。看到他的奮戰後，我也希望他的利嘴休息一下。一天晚上，我造訪他樹木蒼鬱的後院，坐在網狀的戶外休閒椅上，聽他們夫婦倆講中東的考古學故事，他們倆都曾經在那裡進行考古發掘。在樹底下，謝伊溫和放鬆。我告訴他，我讀了索勒基的《山尼達：花葬第一人》(Shanidar: The First Flower People)，索勒基寫給非專業讀者，有關尼安德塔人以花陪葬死者的書。我想像我們會一起竊笑：什麼樣的科學家會用「花葬第一人」當作書的副標題？¹¹但謝伊居然以和緩的語氣打圓場，認為我應該放過考古學前輩。他說：「別忘了，這本書有五十多年了。」這時候，我看到這位熱血教師、愛挑釁的古人類家善良且細膩的一面。¹²

在他家後院，他伸手向一隻慢慢走近的花栗鼠遞上一顆花生，他的妻子克勞馥深情款款地望著他。「不只是花栗鼠，鳥也愛他。」她說。

他們相識時謝伊大學四年級，正坐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研討會座席上。她比他年長且「聽過的搖滾樂只有披頭四。」他用一種不可思議的語調說。他帶她去聽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和黑旗樂團(Black Flag)的演唱會，她則帶他去歌劇院和劇場看戲。「我們去看《玩偶之家》。我想學娜拉尖叫：讓我離開這裡！」謝伊回憶說：「但我們都喜歡莎士比亞。」他們第一次約會去圖書館。他們每週兩、三次去當地公共圖書館津津有味地閱讀，這不奇怪，因為他們都沉醉在文學小說。克勞馥在考古學系石溪分校兼職，現在實驗室工作。

她說自己總是精打細算，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能買得起聖達菲住所的原因。我接收他們在長島的簡樸房屋，原有的廚房、浴室、餐廳與兔籠，每一樣都維持原貌未經裝飾。他們的生活充滿目標。

謝伊和克勞馥在約旦的羅馬廢墟進行考古發掘時，「我們經常坐在發掘現場，高塚上古老的青銅時代廟宇。太陽快要下山時，我們喝一杯，看著孩子們在帳篷裡玩耍，鬼鬼祟祟進出。那是珍·古德和黑猩猩。雄性頭目正要去找雌性玩伴……」他笑起來：「我熱愛我的工作。」他談到伊索比亞的發掘，那裡一切都不對勁，「我們被牛攻擊，遇到多次小火災，也曾把車開進河裡。你想得到的災難，我們都遭遇過。」他的學生有什麼反應？「我們明年再來一次吧！」學生變得對考古學更有熱情是額外的收穫，而且學生更是逗樂了他們夫妻倆。「如果你想獲得喜劇式的療癒，遠征時別忘了帶一票二十來歲的孩子一起去。」

烤山羊的那天早上天色晴朗，四月的亮藍天空和變化多端的白雲，冷到須要套上長袖運動衫。我在長島附近開車繞來繞去，尋找荒地場址終於找到了，就在偏僻的路口。現場感覺像一個童子軍營地，環狀道路供校車行駛，還有周邊用木鏢鏑圍起來的空地。是的！是木鏢鏑，殖民時期用來公開羞辱的刑具。這個場所是學校團體學習美國歷史的指定地點之一。謝伊發現這個場所的規則、管制或保險顧慮不多，學生可以玩火、使用鋒利刀具和拋射武器，沒有人會為了擔心法律責任而抓狂。他穿著亮紅色上衣四處奔忙，在紅色附屬建物背後，他

指揮挖出一個棺材大小的坑，學生把木條堆起來生火。當謝伊在課堂上談到火，他的呼嚕聲就像癩四（Beavis）咕嚕嚕的笑，或是像大頭蛋（Butt-head）。「點火！」轟轟。火太棒了！轟轟轟。」

我告訴大家，我要去烤山羊了。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在吹牛，但我擠過這隻烤山羊的奶。可是供應商的羊剛好賣完了，因此我們站在火坑周圍，喝著鄧肯甜甜圈（Dunkin' Donuts Box O' Joe）的咖啡，看著謝伊打開他的全套打石工具，等著研究生開車送來一隻羔羊。我的頭埋進筆記本，把我的失望亂寫一通。「屠宰山羊」似乎很酷、半野蠻的，但「屠宰羔羊」呢？不要吧。即使聽起來山羊都比較妥當，「山羊」（goat）拼字裡有粗野硬實的「g」和「t」，而「羔羊」是柔軟嬰幼的咩咩叫。我注意到謝伊迴避羔羊的用語，他宣布：「他們已經拿到屠宰肉，在路上了。」

鐵銹斑斑的貨車終於抵達，研究生拖出塑膠袋包裝的可憐羔羊肉。看來份量是不夠三十人食用：研究生、大學生，再加上謝伊的兩位教授同事，但是謝伊並不在意。也許他認為上完屠宰課後，有些人會失去胃口。血淋淋的袋裝肉等著，而我們一群人在沙坑前的樹蔭下聚集，謝伊打開血汗墊、擺好錘石、一包低檔黑曜石和急救包。他在一隻腳的大腿上鋪上皮革作為安全工作區，嚴肅地說：「弄這個不小心會切到自己。」

謝伊說，黑曜石來自德州提供我們好幾萬顆的盤商。盤商從華盛頓州取得這些火山岩，

鋒利到可以用來刮鬍子。謝伊遞給我一大塊黑曜石和一块錘石，我吸了一口氣，試著模仿他使盡全力用錘石敲擊黑曜石。說時遲那時快，光滑的石片噴飛打到謝伊的臉頰。該死！我差點傷了他的眼睛。「別在意，沒事。」他抹了抹臉，接下來的教學他戴上護目鏡。

謝伊接過我那塊黑曜石進行打石說明，他做了旋轉，幫我找一個好角度。在他嚴格的指導下，我試著製作幾片薄的三角矛頭。我把第一個矛頭的邊磨鈍，這樣握起來就不會割到手，接著再用刀子進行造型。我還做了另外兩個，都比較粗曠尖銳。「你現在是穴居女郎了。」謝伊對我說。

幾位學生的手指受傷了，OK繃被拿出來好幾次。我們約十多人打製完成工具時，謝伊把羊肉從塑膠袋中取出，大家幫忙把羊肉倒掛在沙坑角落的木框架上，並在地面鋪上大片塑膠布。小羊頭已經切除。謝伊解釋：「頭部很複雜難搞。雖有好的肉質，但有大量結構，要加以剝取很耗時間，處理牙齒周圍的工作也很危險。」冰河時期人們必須練就快速屠宰，並小心提防獅子的出沒。他們會把獵物的頭提回家，不在現場處理。謝伊輕輕拿著他的石片，跪在地上，切動並剝掉羔羊皮，然後往回撕，羊皮掛在頸腔下像飄動的斗篷。骨架、肋骨清楚可見，小羊羔的腳在斗篷前面晃來晃去，看似柔弱卻很嚇人。

動物皮是最骯髒的部分，謝伊處理羊皮之後洗淨雙手，然後抬起羔羊的前腿。「這是最容易支解的部位，骨頭就懸在那兒，一條切痕也沒留下。」他邊指著邊說。切痕是考古學家

註記古人類活動的一種方式，文獻充滿學位論文和一般論文，討論自然骨頭斷裂和透過工具，或以其他方式故意做出的切痕之間的比較。謝伊繼續細心宰切，用斧頭砍斷肋骨，「不要去抓靠近骨頭斷裂的部位，太銳利了。」他接著解下長長的羊背排，「這部位有大骨腱，是弓弦或縫合傷口的優良材料。」他沿著喉嚨切開，然後把刀片在他牛仔褲上抹掉黏黏的脂肪。生羊肉的氣味，幾乎和熟羊肉的氣味相同，瀰漫在空氣中。

謝伊把我們分成幾個屠宰組，在乾淨的篷布上拆解肋骨和宰切羊排。「刮下來！」他說：「有些上等肉黏在骨頭上和側椎骨下面，不要在意蒼蠅，牠們是來告訴你食物仍然可以食用。」我試著投入敬業精神，把飛源性疾病或蒼蠅腿上的粘性物拋諸腦後。

我用石刀切肉，這比我廚房裡的一些刀具更好用，但因為石刀太小，我弄了滿身羊血。後來我到乾淨的洗手間洗手，看著羊肉碎末流進排水管。我踱步到坑邊，學生把肋骨和肉片鋪在烤架上並移置到火焰上方。他們談論旅途中吃過的怪東西：巴伐利亞野豬、馬奶、眼珠。

有人問我：「去年我們把頭當足球踢的時候，你也在這裡嗎？」我敢打賭，那是個山羊頭。我吃了自製皮塔圓餅上的一些烤羊排，又好吃又噁心，站在我身旁的謝伊，笑著用沾滿血水的手捧著腿骨啃咬。「還不錯，」他說。我回想起當我只答錯一題問答題的時候，他說「不錯」。他的「不錯」就是好的意思。

接著他帶一堆長矛跑到空地，集合大家進行標槍投射器的投擲課程。對考古學家和考古學研究生來說，這個週末不算特別：吃著烤肉、拋射武器。

謝伊的荒野和石器打製經驗塑造了他的工作，他也希望他的學生，從這些實用知識中受益。鼓勵我們熟悉火、石器和屠宰，鼓勵我們參與應用均變論的實驗考古學，他說：「我希望你們拓展經驗，以便觀察過去。」謝伊偶爾開一堂稱為「原始技術」的課，離長島聚滿大商店和快餐店的大道一英里遠的地方，他教導偏遠郊區的學生打製石器、扔長矛和生火。他不希望當代智人忘記本來會做的事。這時，煮熟的羊肉香味，瀰漫在空氣中。

謝伊告訴我，他的座右銘是「永不敗逃。有一年，我的學生在雪地生火，同學對我說：哎喲，好冷、好濕啊！我們可以進屋嗎？我說：不行！如果你現在生得了火，你就隨時可以生得了火。這是理想的機會。你應該感謝大神（Great Spirit）給的機會。那麼請閉嘴，把黃金火焰生起來吧。一定有些人辦不到，因此辦得到的學生就不插手，以確認每個成員都能完成。一大群陌生人之間互助合作，是人類衍生出的另一特質。黑猩猩無法持續數分鐘，專注在某個主題上，而這些學生有條理地找出不同的生火方式，讓大家進入狀況。我為他們感到驕傲。我告訴他們：現在你們成為真正的人類了！」

1 記者麥克爾·巴爾特（Michael Balter）在《科學》雜誌的人物側記中引用謝伊的話，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

2 在德國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官方博物館，仍然使用 Neanderthal（發音 Neanderl）的拼寫，而《演化人類學》（*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期刊還是採用舊拼法，但我採用我老師的拼法。

3 這個實驗室也分析鑑定過智人另一分支，丹尼索瓦人（Denisova）小指的 DNA。

4 年代較久的如智利維德峰（Monte Verde，其歷史可回溯到一萬四千八百年前）遺址、德州的巴特繆克溪聚落（Buttermilk Creek Complex，年代逼近一萬五千五百年前）一直存在爭議，但逐漸得到考古學社群的接受，但年代更早的美洲人類遺址還有爭議。

5 一旦你掌握人類的差異，你可以去學習考古學版本的「文化」以求額外加分，也就是以遺留文物來命名人類種類。尼安德塔人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因為是他們各支都具有相同的文物文化：莫斯特人（Mousterian，這個名稱來自於尼安德塔人最早被鑑定的文物）。智人有不計其數的文物文化，例如：阿奇利人（Acheulian）、銅石人（Chalcolithic）、納圖孚人、克洛維斯人（Clovis）、福爾森人（Folsom）、歐德萬人（Oldovan）、約蒙人（Jomon）。

6 珍·奧爾已經把「地球之子」這個詞註冊商標。

7 奧爾發音是尼安德塔人（Neanderl），卻以尼安德索人（Neanderthal）拼字，所以引述時我順從她的拼法。

8 戴露·漢娜（Daryl Hannah）主演的片子，腳本以奧爾的第一本書為藍本。奧爾心灰意冷地把版權買回，此後再沒有人拍過關於愛拉的電影。

9 書中有大量皮草上纏綿的場景，雖然尼安德塔人或智人都搞不懂為什麼會懷孕。「你今晚要跟我共享皮草嗎？」是可敬的智人男性求愛方式，這跟大地之母賜與族人的愉悅稟賦有關，特別是女性的愉悅。性關係是開放的，男人和女人配對並共炕，但他們可以自由地拈花惹草，尤其是在慶典和夏季集會的時候。男人介紹伴侶的小孩叫做「我的炕孩兒」(the children of my hearth)。如果有個小孩剛好長得像他，他會說這是「我精靈的孩兒」(the child of my spirit)，小孩的誕生是偉大地之母的神力塑造，跟他們無關。尼安德塔男人剛好相反。呃，好吧，我是說有些尼安德塔男人。他們擺出某種姿勢表達「幫我解決需要」的意思，並期望女人跪下獻身，像狒狒的作風。想像不到，尼安德塔女人會拒絕男人的求愛。最後終於有人把性和生育關連起來，她就是愛拉。

10 紐澤西考古學會討論板管理員建議，成員國避免專業術語，雖然他們說的是像「冰攪作用」(cryurbation)和「天擇說」(selectionism)這些字，而不是「更新世」。

11 在倫敦以《山尼達：尼安德塔人的人性》(Allen Lane, 一九七二)的書名出版，這個版本更有條理。

12 他在處理我的無知時特別親切。在我們第一次訪談的文字轉錄中：「謝伊：你聽過歐莫河的基比什(Omo Kibish)嗎？我：這是最古老的什麼，是嗎？」

極品飲料

認真喝啤酒

我第一次論文發表會的規劃很簡單，到美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年度研討會，與專題講者派崔克·麥高文(Patrick McGovern)喝一杯：「古代啤酒、紅酒，以及極品飲料裡的印第安那瓊斯。」極品飲料是麥高文替紅酒、啤酒和蜂蜜酒混成酒的命名。我在往費城的火車上仔細讀著研討會議程，祖先求醉的慾望是我可以與談的主題，我擔心這可能是我唯一能理解的議題。「東羅多彼(Rhodope)山脈的石窟聖地：聾石(Gloukhie Kamani)崇拜情結」？我心裡打問號，「克里特與青銅時代中期，奇亞島阿依亞伊里尼城(Ayia Irini, Kea)的關連」？我心裡又打問號。

我往萬豪飯店大廳走去，裡頭擠滿人。他們都是什麼人啊？我想知道。三千兩百位考古學家，男士健談、滿面鬍鬚、臉曬傷、身穿牛仔褲和卡其服，女士戴著奇風異俗耳環、小貓高跟鞋，以及你從未在田野場址見過的衣服。他們自動分類，各自往羅多彼山脈(原來是在

保加利亞)或青銅時代中期的方向走去，他們已經聽到沙漠、叢林或地下墓穴的召喚，或許他們在地圖上射飛鏢找目標。他們是考古學的一部分。

好奇心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但我要自在地進入熟悉領域，來思索求醉這件事。以美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研討會主辦者的智慧，必然已經知道，把古代祖先求醉定為主題的學術講座必定取悅眾人，不但會吸引專業人士，也會讓業餘愛好者趨之若鶩。他們訂下兩英里外，賓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的禮堂，和美麗的中國圓形大廳，而且廣邀大眾，又包車從飯店到博物館接送想要探討這個主題的考古學家。

業餘愛好者加上專業人士，總數八百人以上，眾聲喧嘩。我們坐在舊禮堂霉臭的座位，討論醉酒科學及其歷史。麥高文在六〇年代有點離經叛道，一頭蓬亂白髮，全白的鬍子，脣上的鬍鬚較黑。他曾指導賓州大學在約旦的考古發掘，擔任幾個考古場址的陶器專家。他告訴我們，有一回他為了了解那些古陶罐到底是用來裝什麼，他到實驗室樓上的儲藏室，翻找考古學家從土耳其戈第昂(Gordion)米達斯(Midas)墓中挖出的青銅罐，發現它依然安坐在原本的紙袋裡，罐內沾黏著未分析的殘留物。麥高文承認：「這是我進行過最簡單的發掘。」他以化學知識將這些黏稠物進行測試。在某些罐子，他分析出烤羊肉和扁豆湯的殘餚。在其他罐子，他找到葡萄酒、蜂蜜、青稞啤酒的混合物。「我從沒聽說有人會把這些東西混合在一起。」他說：「我感到吃驚。想想看，把啤酒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一口氣喝下

去是什麼情形。」他認為，也許米達斯和他子民正在做什麼實驗。

蒸餾酒考古學

經常能在大眾媒體看到麥高文的消息。《史密森》(Smithsonian)雜誌總結他的發現：「他鑑定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大麥啤酒、最古老的葡萄酒，各種最古老的酒類，以及中國黃河流域約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釀製的熟料。」因為他對人類文化飲酒史的深厚知識，以及分析酒精殘留硬塊的科技能力，麥高文廣受世界各地酒吧歡迎。他經常以客人或演講者的身分出現酒吧，請他喝的酒是討論主題也是他的飲料。有一次，麥高文在這類聚會中談到精釀，他描述自己在賓州大學庫房骯髒的青銅罐採集殘留物時，忽然想向釀酒人提出挑戰：「如果你想嘗嘗逆萃做出的米達斯飲料，明天早上九點到我的實驗室。」他告訴研討會的聽眾，那時有二十位精釀的釀酒人接受他的挑戰，最後站出來的男子是角鯊頭手釀啤酒廠(Dogfish Head Craft Brewery)的山姆·卡拉喬尼(Sam Calagione)，他曾自行研發中世紀的梅子酒。在兩人聯手下，以混合蜂蜜、白麴香葡萄和藏紅花，調製出金點(Midas Touch)啤酒。這款屢獲殊榮的啤酒引起風潮，將考古遺跡加以逆向萃取的釀酒蔚為潮流。對釀酒人來說，這是吸引人的生意，但對麥高文而言，這卻是實驗性的考古學行動：「從過去尋找線

索，看我們能否在現代重現這些飲料的製程。」

在研討會中，麥高文向全神貫注的聽眾解說他的極品飲料研究重心，也對酒癮和酗酒表達關注，這不僅緩和了嚴肅主題，也提醒我們，醉酒研究具有多樣面向。他以寓教於樂的方法進行演講，他還播放大象和猴子喝醉酒的影片。所有生物都樂於享用酒精，不只是人類。馬來西亞的樹鼯也愛喝酒。他說：「喝了發酵飲料，會讓你愉悅的情緒。稍後，你們某些人也會有這種感覺。」不久我們便蜂擁上樓，聚集在華麗高聳、有拱形天花板的大廳，那裡有寶物點綴，還擺放提神飲料。

麥高文的演講是免費的，但招待費要二十九美元。對我來說有點貴，尤其你若浪費可換取雲嶺 (Yuengling) 或百威啤酒的單瓶飲料券。但這次提供的是，麥高文與角鯊頭初次合作釀造金點啤酒之後，陸續推出非常特殊的精釀酒：賈湖堡啤酒 (Chateau Jiahu)。根據麥高文在中國發現的，九千年前的殘餘物所釀的米和蜂蜜的混合液體，以及洪都拉斯巧克力口味的神飲 (Theobroma)，埃及大亨奇 (Ta Henket) 啤酒，甚至有罕見的希莎酒 (Chicha)。這是來自南美洲玉米飲料，再摻入麥高文和卡拉喬尼的口水以助發酵 (謝謝，這個我不要)。這些都不是便宜貨，通常四瓶裝的金點啤酒在專賣店要價二十美元。價格之所以貴，一部分是因為番紅花，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香料，也因為番紅花，啤酒才能變成金色。

演講後，我在圓形大廳碰到麥高文。他坐在摺疊桌旁，聽眾剛買了他的著作《打開過去的瓶塞：探索紅酒、啤酒及其他酒精飲料》，他正忙著找錢。這位演講者、成功的專題講師，他擔任博物館生物分子實驗室主管，也是我們的主人。他親自賣自己的書似乎有損尊嚴。我遞上啤酒，接手處理他收錢找錢的動作，讓他可以空出手來親筆簽書，跟他的粉絲談話。他看上去不知所措，但到手的啤酒很誘人。講了快一小時古代對酒的渴求，他是口渴了。

能夠替共同創造金點啤酒的麥高文開一瓶，酒保很開心。麥高文和我敲瓶、品嘗一口。用蜂蜜啤酒，或啤酒加紅酒的組合來描述金點啤酒是不公平的。它是神聖的，我不想牛飲，只是把每一口含在嘴裡。麥高文稱它是弗利吉亞水酒 (Phrygian grog)。我很喜歡這樣稱呼。這是多麼棒的弗利吉亞水酒呀！搞半天我才弄清楚，為何這東西這麼美味，也許是因為有普通啤酒的三倍熱量。如果啤酒是液體麵包，金點啤酒就是液體蛋糕，是用蜂蜜浸透的。喝酒沒讓我找錯錢，我還推銷《打開過去的瓶塞》，這本書讓我感到刺激、興奮、迷醉，是化學奇才充滿熱情的作品。例如書中提到非洲的發酵香蕉殘餘物細節，作者感到狂喜的寫下：「非洲最早香蕉的發現，一下子提早了三千年。」

不久，我見識啤酒考古學家遭到他的粉絲圍攻，這些人多數是專業人士，我聽過他們之中關於古代戰車道路或岩石藝術的演講，他們幾乎要躍過桌面，分享從麥高文的作品中獲得的樂趣。他是明星或者明星是他的課題，古代啤酒和烈啤酒 (Ale)？兩者難分難解。某些人在二〇〇四年，巴塞隆那的啤酒研討會上和他喝過，其他是當地的釀酒人或老同事，腳步

不穩是因為年紀，而不是因為喝酒。有人把她的學生推到他身邊，並說：「蒸餾酒考古學這麼棒的工作，是年輕人該做的。」我感覺像坐在貓王旁邊，他簡直就是貓王本人被描繪得害羞、謙卑的那個樣子。麥高文透露，當他快要喝完的時候，角鯊頭就會送來更多。真是不錯的外快！

我從雜亂的點心桌上拿取一盤乳酪糕點，當考古學家和粉絲停下來聊啤酒花的時候，我繼續吃著食物。我也向粉絲兜售麥高文的書。「啊，我想要買一本！」有位考古學家說：「但我身上沒有錢啊。」「你回家後再寄支票給他。」我建議，並從一疊麥高文的名片中抽出一張貼在書頁上。麥高文，或角鯊頭啤酒給他取的綽號：派博士(Dr. Pat)，在未付錢的書上簽了名，並試圖鎮定地看著他的書被帶出門。麥高文沒有嫌我率性，我們握握手，他感謝我在需要的時候幫忙他。後來他寫給我一封電子郵件，想知道我是否記下那個沒付錢就走掉的考古學家叫什麼名字。我沒有記下，但幸運的是，支票很快就到了麥高文手上。即使已有醉意的考古學家，還是記得欠債還錢。

大廳一下子淨空了，考古學家和考古迷都四散了。只留下滿地空瓶子。

1 這次講座之後，角鯊頭又推出從考古學獲取靈感的釀酒：伊斯托卡青銅器啤酒(Birra Etrusca Bronze)，成分包括石榴和衣索比亞的沒藥植物，以兩千八百年前伊斯托卡古墓發現的殘留物為基礎；夏堤(Sah'tea)，是第九世紀芬蘭黑麥型飲料；北歐(Nordichem Europe)，是公元前四世紀中期香楊梅(bog myrtle)和沼澤蔓越莓混合飲料；以及智酒(K'asir)，是取法三千五百年前丹麥飲料容器殘留物而得的配方。

玉豬龍

如何搭訕考古學家

同一個研討會，不同的酒吧。狂熱粉絲早就回家了，所以嚴肅的考古學可以開始了。考古學家列隊在費城萬豪飯店接待廳東晃西晃，耐心等待供應食物。稍後他們要替考古領域具有卓越貢獻的同事慶祝，但他們先擠在房間後面。啾啾，一瓶接一瓶酒打開了，每位考古學家走近點心桌猛吃猛喝，啤酒、乳酪和葡萄紛紛下肚。

酒保供應源源不斷的啤酒，排在我前面的可愛年長女士開玩笑說：「顯然我們都同意啤酒是考古學的國際飲料，對學生和鑄子幫來說夠便宜了，如果能在研討會頒獎之夜喝幾杯，更可以不費分文！」輪到她點酒了，她說：「請給我白葡萄酒。我的姊妹喝起來了！」我們互相碰了斟著酸味自釀酒的酒杯，一些酒灑在浸濕的飲料台上。

她的名字叫薩拉·米利吉·尼爾森（Sarah Millidge Nelson），八十多歲，雪白的衛斯理式童花頭。她穿著鮮明的褲子和外套，灑脫的領巾，和 Merrell Mary Jones 休閒鞋。她盤髮露

出脖子，像是要杵在烈日下工作。我可能夢見過她。

我想猜測她曾在哪裡進行考古發掘，從她的風格、端莊、輕鬆戲謔的話語，我想像她曾去過希臘或是地中海。她說：「妳猜錯了。」她是到中國，靠近蒙古的東北，一具真人大小的女神雕像出土。出乎意料能在中國找到女性大泥雕，尤其是五、六千年前，但在中國牛河梁的女神廟，確實發現這尊女神像碎片，伴隨其他雕塑出土，其中包括帶有豬頭的玉墜子，當地人稱為玉豬龍。

這就是你搭訕考古學家時會發生的對話。我們接著又談論骨脂、尖頭嬰兒、玉豬龍。無論我聽了多少次，或曾在腦海中把豬與龍連結在一起，我仍然從這種家常又神祕的組合得到樂趣。即使尼爾森很優雅，她還是脫口而出「玉豬龍」。

女神廟是尼爾森進行發掘的遺址。一九八七年，她是第一個被允許訪問女神廟的外國考古學家，並兩度獲得美國的補助前往發掘，雖然她將補助款壓縮成持續七年節儉的夏季行程，但中國的破土許可一直到她經費用完都還沒批下來。拿不到許可的考古學家可以做什麼呢？有一次她和幾個學生進行探地雷達，測量女神廟和太陽、星星和行星之間的準線，她是研究女神廟遺址的考古天文學。最近，她申請另一筆發掘女神廟的補助但遭到拒絕，她懷疑是因為年齡的關係。這是我想不到的，考古學家可以專注一個遺址多年，卻從來沒有機會破土動工。除了耐力、堅強和苦力，考古學家似乎還需要運氣。我也料想不到，發掘的渴望到

了九十幾歲還如此旺盛。

我坐在這位女性考古學家身旁，她想去遙遠中國做勞動的希望遭遇挫敗，但聽到同行因成功地按照理念行動而受獎時依然平靜：這位男士因對考古學的卓越貢獻獲得金質獎章，那位女士贏得三個學生已經獲得的教學獎。對前輩來說，這似乎是恰當且是遲來的獎勵。我還一時糊塗替尼爾森感到遺憾。

我們交換名片後各奔東西，我被各式各樣的考古學家吸引，但尼爾森留在我的腦海裡。她也許對發掘女神廟的付出不感到失望，但她終於成為公認的亞洲考古學權威，尤其對中國長城外的遙遠地點和文化研究，那裡一度稱為滿洲。一位美國學者指出：「我們這些有機會在亞洲從事考古學工作的人，常對這地區研究的質量印象深刻，也對西方相關文獻少得可憐感到印象深刻。」在西方的考古學家當中，這位學者推崇尼爾森是詮釋亞洲文明的關鍵學者，尤其是中國和韓國。我越是解讀尼爾森，越是得到這樣的信息：我遇到了先驅者。

中國商代的后婦好

除了亞洲考古學著作，尼爾森還編寫一整個書架關於性別的書。為了幫助女人進入男人的考古俱樂部，她坦率發聲，她不僅研究過去的男人和器物，也研究女人。當考古工作要破土

之時，卻有很多人要阻擋你，你怎麼辦？幾個月後，我在孟菲斯的美國考古學會年會又遇見尼爾森，我們身旁再次充滿喝啤酒的人，而我們坐在其間喝我們的紅酒，我必須聽她的故事。

尼爾森對我娓娓道來。她在一九五三年畢業於衛斯理（Wellesley）學院，學位是聖經考古學。她嫁給一位哈佛人，在德國住過幾年，因為她丈夫霍爾是駐紮當地的軍醫。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們育有三個兒子。他們常常搬家，但尼爾森並不介意，只要他們能住在像歐洲或舊金山令人興奮的地方，但住在美國南部小鎮是令人窒息的。她說：「有一次，我渴望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於是說服一位朋友陪我在烈日下，後座載著小孩的自行車，尋找標註在軍用地圖上的印第安土墩。我們一個土墩也沒發現，後來我才知道，土墩在射程範圍內，標靶沿著土墩架起來，屬軍事禁區了。」軍方派遣霍爾去北卡羅萊納州布拉格堡，但被她否決了，她告訴霍爾：「輪到我做決定了。」

三十六歲時，尼爾森取得密西根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入學資格，面試時她穿戴珍珠和高跟鞋。她再次成為一個學生，三個孩子的母親嘗試去適應嬉皮生活。她的多數教授講得直白，培訓婦女是在浪費時間。即使她在亞洲待了那陣子之後，她還是會提到，重返大學是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文化衝擊。

她的丈夫接受一九七〇到七一年的韓國任務，軍方委婉表明不得攜眷，尼爾森打算去台灣做博士論文研究，並且把小孩和家庭教師一起接過去。此時她帶著小孩到她妹妹的加州房

子暫住，尼爾森發現她的計劃瓦解了。孩子們拿不到超過三十天的簽證，她說：「我們沒辦法每個月飛一次香港，更何況做母親的會把小孩送到陌生的地方嗎？」她和三個兒子、妹妹的五個小孩，和八隻貓只好留在加州。她說：「我必須離開那裡。」她於是前往韓國，在基地外圍住了一年，這樣她和孩子們至少每隔一週的週末就可以去探望她丈夫一次。她對韓國考古學不甚了解，那裡沒有她能講的語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或中文）所寫的文獻，於是她自學韓語。

不管複雜的文法，也不管韓文和中文裡的漢字。尼爾森和身邊跑來跑去的九歲和十二、三歲的男童一起學習。韓語是微妙的語言，含意不明確，這讓她發狂。韓語「適用於微言大義，不適合直白的陳述句。」她在她一本書的序言寫道：「和每個不同的本地韓語老師閱讀韓文的時候，我問究竟這句話是在講什麼。他們告訴我：你必須在字裡行間探索意義。有時連我的老師都不敢肯定，是否正確表達句子的意義。」儘管如此，她還是花了一整年學習韓文。

後來有位老師介紹她一位當地考古學家，提供她參與共同調查漢江沿岸考古遺址的機會。這位考古學家提供許可證和工具，尼爾森則運用她在研究所學到的新測量方法寫了一個計劃，也協助這個韓國考古隊，從軍中販賣部取得美國香菸和啤酒。

尼爾森動員陸軍眷屬來幫助調查。「我們住的地方多的是無所事事的女眷，因為她們只為跟著丈夫而來，所以我把她們組織成很棒的田野團隊。她們之中有些人的老公非常有用，

有的手上有美國海軍的詳細地圖，有的坐直升機攝影，飛到漢江上空拍照。某位女士有部非常好的車，還有司機歐先生，他戴著白色小手套，載我們到處去探險，歐先生還跟著我們一起進行發掘。」她對於眾人這麼投入感到得意。她說：「新鮮、令人驚奇的事先後降臨。」漢江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成了她的論文題目，尼爾森四十一歲時完成學業，成為密西根大學第二位女性考古學博士。之後她重返韓國多次，其中兩次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到訪。六十二歲時她出版《韓國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orea*），距離她第一次臨時成行到韓國已經超過二十年。她在這本書的扉頁寫了一段話：「寫這本書是希望，把過去缺席的韓國放進世界考古學地圖。」

我想像以她的故事為腳本的音樂喜劇，她和動感十足的陸軍妻眷，在韓國河岸篩檢泥土、唱著歌，有戴白手套的歐先生相伴。時光飛逝，最後她出了一本成功的書。但連結韓國文化有何意義？這本書的序言提到：「某人的名字可以拼寫成「Lee、L、Rhee、Rh」或「Yi」，有時同個作者會用不同的拼法拼寫他的名字。」序言又提到，如何涵蓋北韓的考古學，當「一直難以取得北韓的考古學報告，尤其某段時期在南韓擁有北韓報告是非法的。」她告訴我，有一次他們被開槍警告，因為發掘地點太靠近軍事區。

尼爾森撩起頭髮讓脖子散熱。我們在孟菲斯會議中心對面的飯店大廳搶到一張桌子。考古學家在我們旁邊大聲叫喊、摔破玻璃瓶。尼爾森因為黃斑部病變，左眼除了周緣已經完全

看不到了。她有認人的麻煩，但似乎仍然認得每個人。她把一整票的同事介紹給我，有些在中國陪伴她共渡時光，有些是她在義大利百樂糾(Bolagio)的研究夥伴，我們在吵雜聲中提高音量聊著，在歡樂的情境中點了好幾杯葡萄酒。她有些故事就像奇風異俗小說的場景，有巫師和戰士環繞。在首爾授課時，她和學生會坐在城牆上的岩石，看著巫堂女巫師們進行儀式。有一次，女巫師招手要他們下來，參加優美的儀式舞蹈。「我聽說過中國商代的后婦好(Lady Hao of the Shang dynasty)嗎？」尼爾森感到疑惑。她的僕人除了一個被腰斬，其他都被斷頭！

七十幾歲時，尼爾森回顧她關於古代女王、女神，和女巫的學術著作，打算從她在韓國和中國學到的東西找點樂子，不只是女性大泥像和奇風異俗的故事，而是整個東方與西方，包括考古領域中的性、性別歧視、文物洗劫，和飲酒與嫉妒。她在丹佛的家中創作考古小說，她稱之為教學小說，把真實的文物和考古發現當作題材。尼爾森很清楚，「我們對這些時期所知不多，但我們用所知的一切把這時期轉變成文字。」包括玉豬龍。它是紅山女神廟建造者的身分象徵，以及把預言刻在骨頭上的甲骨，中國東北到處可見這些文物。

尼爾森透過這些小說另闢考古學揭祕的蹊徑，藉此想像遙遠過去種種的另一種工具。例如，發掘韓國屋宅罕見的雙炕，就刺激其中一本小說的寫作。為什麼是雙炕？尼爾森想起一位男性考古學家推測，這住宅屬於擁有兩個妻子的首領。這個假設困擾著她。首領可能有

兩個配偶，但如果首領是一個女人呢？她說：「來自東亞的大量證據顯示，婦女扮演領導角色。如果檢視歷史各個時期，你可以看到好幾位優越的女性統治中國。」韓國最大的古墳在古新羅區出土，墳中的貴族女人戴著華麗的皇冠，雖然寫下的歷史都只提國王。「婦好」不僅以戰士裝備陪葬，根據甲骨銘文，她還率領男人戰鬥。「我們不知道的事很多。」尼爾森說：「但我們的確知道很多史實被掩埋或曲解了。」

在現實的風氣下，尼爾森勇於面對出版市場的挑戰，創辦了RKLOG出版社，她打算出版自己的一本小說，也出版其他考古學家的小說。「RKLOG。」「妳大聲念這幾個字母看看。」她笑著說。她不缺讀者，讀過她有關女神學術著作的粉絲可以證實。

在尼爾森的一本小說中，一位年長的教授被問到他未來的計劃。「我剛退休不久，但我有很多想法要寫下來，我可能不會真的退休。」當尼爾森和我在Skype碰上，我憶起她小說中這個段落。那時她年屆八十二，正為了要前往約旦參加一個研討會在打包行李。前一年她造訪十個國家，從蒙古到摩洛哥，包括見證日全蝕的澳洲之行。她以直接注射眼睛控制黃斑部病變。「我只能說，」她表示：「感謝現代醫學。」她正在進行要發表的六篇不同主題的論文、構思三部小說，並整理在男人田野調查領域中做一個女人的回憶錄草稿。這份草稿開頭就引用一個著名男性考古學家的看法：考古學專業沒有性別的問題，卻有「下巴毛」理論家和「胸毛」²田野工作者之分。尼爾森明白表示，她面對最艱難的挑戰既非下巴毛也不是

胸毛，而是必須和男性同事進行的競爭，她寫道：「我的考古學著作預設：過去女人所做的事可以加以復原，而且是有趣的。」

她覺得「而且是有趣的」這句話是不言而喻。在某種程度，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是他們本來就想找的，如果對於尋找女強人的證據不感興趣，那麼即便有滿坑滿谷的女王和女戰士，你什麼都看不到。

藝廊插曲

機緣安排我和尼爾森相遇，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一年，我看到《紐約時報》有一則中國紅山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的廣告。我認為紅山是震懾人心的文化，但在曼哈頓居然有展示尼爾森心愛的女神廟器物，顯然是在做交易。之前只能在佛羅里達才看得到在美國展示的兩隻玉豬龍，而且全美博物館加起來可能只有四隻。但是現在我只要搭短程的火車到紐約，就能在藝廊看到十幾隻或更多玉豬龍。我在警衛的桌上簽名，接著有專人拿走我的外套、供應茶水，讓我在充滿寶藏的大房間裡自由在地遊走，又有亞洲情調的輕音樂營造氣氛。隱藏的監視器盯著我，是要防止我盜走玉豬龍嗎？巡視整個展覽間後，我還沒看到一隻玉豬龍。直到看過勾雲形玉珮和貓頭鷹吊墜之後，我終於看到玉豬龍了。「Pig Dragon」英文字面容

易使人誤解，其實玉豬龍沒有鱗片或長尾，它是一塊形狀像早期中國龍形符號的玉石，呈弧形「C」。它的表面光滑，頂部雕刻豬臉。大小從圓潤小戒子到大型紙鎮都有，顏色有暗綠翡翠色、蒼綠色或黃色。就我所見，每張豬臉都不一樣。

我注意到，玉豬龍賣了剩一件。別擔心，貨源還很多。藝品商跟我說，他有很多收藏，還拿出六、七件讓我驚艷不已。「這真的是豬臉嗎？」他認為可能是熊。「這件不錯，」他邊說邊輕輕推我一下，要我看標價一萬到一萬一千美元的一塊深色大玉雕，但他打算賣我八千五百美元。我問他是否有鑑定書。「喔，有啊！」他說每一件都有三位專家鑑定。天真的我沒有想到，這些可能是假貨。不，我說我不要。我怎麼知道這些是合法的呢？我如何能相信這些不是贓物？他說：「這該怎麼說才好呢？這些都是意外發現的，農民在他們田園撿到的。我每件都有申報並繳納關稅和附加稅，但是……」他聳聳肩。

他要我用手機拍下玉豬龍，並給我一份標有尺寸和描述的正版照片，又送我一份價值七十五美元、精緻的目錄。我自認是個作家，雖然在簽名簿留下真實姓名，但始終沒有機會分享這件事。我是個文化探索者，卻不是好的收藏家。像我身邊穿著得體、故作內行的男女參觀者就屬於後者。雖然都是古藝術的同好，但藝品商和我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也許他還在我回心轉意拿出信用卡呢。

「大多數的紅山文化玉器，是從中小型墓葬出土的。」我讀著目錄第一頁，接著研究有

助於了解現址墳墓模樣的照片，以及伴有玉器的骨骸出土時的墳墓。目錄上寫著：每個墓可望有三到九件文物，欲購從速。

任何考古學家都會說：遭洗劫的器物已失去考古學意義。尼爾森小說中的女主角率直表白：「多年來，藝術史學家以為紅山玉器來自商朝，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脈絡可循。」其實中國商代和紅山文化相隔三千年。玉豬龍一旦遭到洗劫，即使在藝品商的手中依然美麗，但已不能追溯年代，也不能弄清楚出土的地點，更無法告訴我們所屬人群的故事。被劫奪的器物失去說明歷史的能力。

1 根據考古學家和學者米瑞·史塔克(Miriam T. Stark)研究，尼爾森寫了第一本重要的韓國考古學英文文獻，以及中國考古學四大重要英文文獻之一。她也在丹佛大學教三十年的考古學，並獲得教學獎。

2 在尼爾森的《性別考古學》一書中，她把下巴毛(the hairy-chinned)和胸毛(the hairy-chested)的二分法，歸於考古學家阿福·基德(Alfred Kidder)所述。

生活在廢墟 —— 就業問題及其他

與認真研究和保存文化遺跡的專家一樣，考古學家發覺他們的工作報酬根本不夠餬口。我們對這行業的了解，考古學家的平均薪資低於藝術家。據估計，這個行業有百分之五十的失業率。二〇一四年《富比世》以首份工作高失業率和首份工作低報酬率為指標，認為人類學和考古學是最差的學院主修。二〇一二年在孟菲斯的研討會，聚集超過三千位考古學家，我踏入標示「就業服務中心」的場地，看到張貼招募全職的工作只有五個。考古學家可以透過文化資源管理(CRM)公司(這種公司替開發商處理符合文資保存的開發規範)找到短期的田野工作，但長期缺可遇不可求。我向謝伊提到五個工作機會，並告訴他，我多麼敬佩他的考古業夥伴，面對捉襟見肘的殘酷前景時還能夠保持毅力和幽默。但他冷酷地說：「這讓你學到什麼？這讓你知道我們有多熱愛這份工作。」非關浪漫的熱愛，沉浸在充滿希望的幻覺中：窘況愈來愈明顯，成本代價高昂。

在同一个研討會，我的考古學老師拉著我快速路過瑪雅和非洲的展覽間，與奇風異俗的「斐濟之火專題民族誌考古學」。她一邊說：「我想你會感興趣的。」一邊帶我穿過會議中心曲折的通道，到一些被遺忘、非熱門的的展覽間。博物館、收藏和策展委員會困坐愁城，齊聚其中一個展覽間。聯邦預算危機和美國政府瀕臨停擺，會引起美國公民要求縮減政府資助，雖然考古學家習慣克勤克儉，但他們此時處於危機狀態。

在展覽間裡，檔案學專家、博物館館長，以及文物專家和考古學家，討論著他們面對的挑戰，他們管理的一間間堆滿尚未登記造冊的出土古物讓他們傷透腦筋，考古學雜物、材料，幾乎要把他們淹沒了。

「我們不會勸碩士生、博士生停止發掘，但我們實在應該這麼做。你看看，我們的空間裝不下正要挖出來的文物！」

「這個收藏品將要丟進垃圾場了！我們沒有能力資助儲藏空間！連續三年了，情況越來越糟糕！」

「我們真的有必要發掘更多一八八〇年代的農舍遺址嗎？」

有人喊道：「叫他們挖慢一點！」另一人答腔：「我們試過了！」

沒有經費贊助志工，將堆積如山的收藏品加以分類。有人說：專業人士只要有入帳就感到慶幸。到處都是被遺棄的收藏品，因為把它們挖出來的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已經歇業。

據我所知，聯邦救救美國的寶物 (Save America's Treasures) 是保護美國瀕危和珍貴文化遺產中規模最大、最成功的補助計劃，但該年度卻沒有得到任何資助，因此經營這項計劃的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再接受申請。聯邦歷史保存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uncil on Historic Preservation) 甚至不談那些收藏品。為了資助這項工作而在一九六六年立法的國家歷史保護法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雖然每六年修法一次，但預算持續下修。

在展覽間裡，接受美軍工兵團委託策展，並管理考古收藏的考古學家說得很淒慘，他認為像是大蕭條時代的農民，作物才要收成卻被風災摧毀：「國家歷史保護是初步工程。從立法完成起，我和同代許多人在考古領域受雇一輩子。前無古人，可能也無來者。縱使許多人警告這是不受歡迎的立法，但太多人漠視其後果。我們活化歷史，然而一旦法案日落西山，加上我們這代凋零殆盡，到時候考古學一旦殞落也沒有人會在意了。」

絕望中出現兩道曙光。國家人文基金 (NEH) 每年提供十八項獎助，持續為文物儲藏空間注入活力，提供檔案專家和博物館館長援助。另外，根據考古學家喬凡娜·維特利 (Giovanna Vitelli) 轉述，她剛獲得美隆基金會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資助，指導牛津大學阿什莫爾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的大學約聘計劃，用於構思教師參與收藏的新方法。她說：「我有一堆錢和一堆博士後研究員。」他邀請大家一起合作：「我在沙坑裡，而且有一堆玩具。」

她似乎是唯一不用哭天搶地，也不至於處境艱難的考古學家。

我跟隨幾位考古收藏的烏鴉嘴（Cassandras）到另一個座談會場，討論考古資訊的取得和保存，並當面提問優雅、和藹可親的約翰·耶倫（John Yellen），他主持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深具影響力的補助計劃，把許多考古學家送進田野。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考古學補助金，只提供長期保存考古資料的計劃，這樣其他研究人員也可以查用那些資料。但「一旦他們有錢了，」耶倫坦承：「我們就幫不上忙了。」考古學家資料查用的專屬權限，要維持多久之後才開放呢？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考古學家無法從發掘和出版之間走出來，這導致知識工作裹足不前、文物和資訊束諸高閣，其他研究者想要查閱也不得其門而入。

耶倫表示，國家科學基金會也「面臨國會省錢的要求，我們的差旅預算降了百分之十五。座談者提供建言、評審申請案，但我們沒有錢提供點心，而且提案申請大量增加。」

難怪那天晚上在飯店大廳的噪音震耳欲聾，考古學家跨桌喊叫，或坐在戶外噴水池邊嘲笑諸神。幸運的田野考古學家，有的將前往土耳其，有的要去南非海岸的洞窟，有的會去祕魯沙漠，有的要去華盛頓州，有的去喬治亞德馬尼西（Dmanisi，漂亮的直立人頭骨）或者他們散落鄉野，在推土機壓過之前搶救歷史。削瘦、飢腸轆轆的研究生結隊漫步。助理教授點著皺巴巴的鈔票，互相比較差旅補助多寡，而文物保管者則對著啤酒念念有詞。

完美的工作

二〇一一年夏天，吉爾摩提醒我不要遲疑，盡快前往聖尤斯特修斯，我終於了解其中緣故。他主持獨立的斯達夏考古學中心，他熱愛這份工作，但我遇到他之前正墮入黯淡期。

吉爾摩氣質獨特，兼具活力與沉著，在熱帶凡事慢條斯理的島上，他盡善盡美達成嚴苛的考古學工作。一九九七年，吉爾摩與當地人合力建立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雖然直到二〇〇四年都沒有獲得資助。正如他所說的，研究中心的創建只能用奇蹟來形容。吉爾摩年邁的老師諾曼·巴卡（Norman Barka）最先彰顯島嶼在殖民時期，一度是全球經濟的重要通衢，巴卡曾經對他說：「如果斯達夏能搞出一個考古學中心，我願意吃掉我的帽子。」隨著歲月流逝，當地的支持起起落落，基本教義派又贏得最近的選舉，這對考古中心的創設不是好兆頭。之後，在我到來的一個月前，兩名女志工遭到毆打，這是首樁考古研究中心的衝突案件。她們擊退酒醉的當地人並通報這件攻擊事件，但警方拒絕受理。吉爾摩要求與警長會面，並強烈抗議警方吃案。接著，志工的汽車被扣押，吉爾摩也數度遭到攔檢，他開始感到自己不受歡迎。

我回憶坐上汽車，在奧倫吉士達可愛的鵝卵石上顛簸前進，吉爾摩噴著鼻息說：「路況糟透了，石頭本來是在地底下的。我跟他們說過，應該只挖開上面的廢棄物就好，但他們

就是不願意這樣。」一天早上，他將車停在海邊，派志工麥特到聖尤斯特修斯考古學研究中心，監看擴建海港的疏浚作業，確保挖泥船不會破壞碼頭被燒毀時沉沒的舊倉庫遺跡。我問麥特在幹什麼，吉爾摩說：「盯著他們，以免毀了遺跡。」他的老師巴卡在海島待了二十年，久到足以成為「厭煩的悲觀者，這一點我也快趕上了。」吉爾摩挖苦地說。當他們的兒子接近學齡，他和喬安娜討論後決定，孩子需要一個新環境。

我首度到訪斯達夏之時，恰好是他的島嶼時光將告終的時刻。

吉爾摩和喬安娜別無工作，他們計劃前往英國、美國或是荷蘭，相信在積蓄用罄之前會找到工作。這時節找考古工作很糟糕，但喬安娜有碩士學位、博物館工作經驗、冷靜的性情，以及不屈不撓的意志，而吉爾摩強壯、俊俏、有自信、知識豐富且足智多謀，並具有博士學位與經營考古中心七年資歷。兩人都曾在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根據《衛報》報導，倫敦大學學院在英國擠掉歷史悠久的劍橋大學，成為世界頂級的考古學學校。吉爾摩想寫自己的「終身故事」，並計劃至少寫三本關於斯達夏的書，包括一本加勒比海考古學百科全書。

我用Skype和吉爾摩與喬安娜保持聯繫，吉爾摩的Skype個人資料照片微笑穿著印有「生活在廢墟」²標語的T恤。六月間我們見面，這時他們離開斯達夏已經七個月了。他們暫住喬安娜母親在利奇菲爾德（Lichfield）的房子，倫敦往北車程需要幾小時，那裡是英國西米德蘭茲郡（West Midlands）的美麗古城。秋去冬來，當吉爾摩年屆不惑，他們快五歲的

女兒開始上學，兩歲的兒子進入幼稚園，接二連三的面試都無法提供有給職位。這麼多應徵工作，吉爾摩都進入決選，但紀錄並未改變：申請一百九十次，零就業機會。喬安娜已經不想再創紀錄了，她應徵了三十份工作。「我們自我激勵，面試表現良好是很大的鼓舞。接著畫下希望的句點。然後……」她聳聳肩：「我們再次重新來過。」

吉爾摩和喬安娜的生理時鐘仍停留在加勒比海，很晚才到利奇菲爾德的飯店接我。我們擠在從她母親手上買來的小黃車裡，去遊覽迷人古城的景點，吉爾摩窩在後座兩個兒童座椅中間。兩個孩子難得第一次上午都在學校，他們夫妻倆有幾小時悠閒空檔。

我們在中世紀利奇菲爾德大教堂的飛簷和彩色玻璃底下漫步，徘徊在禮拜堂的側間，那裡展示著重要的考古文物，從祭壇下方出土的十八世紀利奇菲爾德天使，二〇〇九年在附近田野發現的斯塔福德郡寶庫（Staffordshire Hoard），一堆價值連城的金銀與武器。策展的女士搞不定展示櫃的照明，吉爾摩幫忙找到一名懂得修理的警衛。

我們擠回車上，這次換我坐在兩個兒童座椅中間，經過田野鄉村前往古羅馬城牆，那是喬安娜第一次學習考古發掘的地方，生氣盎然的綠色風景裡的破落廢墟群。我們身處英國鄉村奇境，起伏的山丘被石牆切過，來自湯馬斯·哈代作品的綠色小徑。「這裡美麗而動人。」我熱情地說，喬安娜和吉爾摩愉悅相視。吉爾摩說：「這是第一次，連續六星期出太陽。」喬安娜補充說：「我們在三月確實有個美好的星期，還記得嗎？」

喬安娜想起，得知考古學工作機會非常稀少之後，她狠狠地沿著歷史悠久的城牆發掘。「我要成為考古學家，我要成為考古學家！」我到訪前一週，她和吉爾摩在母親的閣樓裡發現她的舊日記本，字裡行間充滿對考古的痴迷，以及當她去向吉爾摩學習時，與斯達夏的第一次接觸。她認真敬業，修短的指甲足以證明，於是他挑她做研究助理。「考古學，愛它、恨它，生活不能沒有它。」她總結說：「真是個難題啊！」吉爾摩從沒想過要走其他路，他的父母（父親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學家）當他四、五歲時就要他成為考古學家，那時他已經在收集化石和石頭。喬安娜和吉爾摩注定走入難以維生的這一行。

我們把車開到他們優雅的磚造房舍，喬安娜的母親最近再婚，搬到附近與新婚夫婦同住，而喬安娜前去把孩子接回來。孩子們進來時躲在她的腿後，伊里亞斯正打著噴嚏流著鼻涕，他的命名緣於伊里亞斯·阿什莫爾（Elias Ashmole，他的無價蒐藏放在牛津大學阿什莫爾博物館）。他和艾密莉都對英國春季的病毒和感染很受不了，才剛痊癒又因為伊里亞斯舔了火車車窗又生病了。

下午原來計劃把吉爾摩趕去做物理治療，因為他持續在舊粘土坑中發掘導致膝蓋受傷。我們其他人則去十四世紀莊園所在的博德瑟特（Beaudesert）逛一下午，他們夫妻倆曾經在那裡擔任志工。但孩子們不依，因為吉爾摩考英國駕照沒過關，要弄好這個下午的工作是這麼複雜，就像在斯達夏渡過的典型一日，耍寶的顧問和志工，要去許多地方卻只有一輛車。

最簡單的方案是喬安娜開車載走吉爾摩和伊里亞斯，艾密莉和我留下來。四歲的她和我相伴塗抹、玩著色遊戲一小時。「我怕妳。」當我們完成滿桌亮麗的圖畫後艾密莉坦承。我恍然大悟，哎呀，他們居然放心把孩子丟給我。但還好沒事，我們為此感到好笑。吉爾摩和喬安娜到了英國之後正學著如何更謹慎，但他們來自島嶼悠閒過活的習慣難改。

加勒比海養成的習性，讓他們能夠從容應付孩子的情緒波動。為人父母如此平靜，當伊里亞斯情緒失控的時候，吉爾摩還在忙著告訴我，他曾做過的殖民文物導覽工作。情緒是會傳染的，一會兒艾密莉也哭了。一個在喬安娜懷裡嗚咽，一個在吉爾摩胸前嚎叫，喬安娜對我微笑，她說：「這是家常便飯。」天氣好也沒有用，即使出陽的日子也會變得灰濛濛的。「上週的暴風雨糟透了，街上不見人影。」吉爾摩說：「早知道就繼續留在斯達夏。」「但是這兒有雜貨店呀，」喬安娜反駁。這麼多的選擇，即使是特價、快過期的產品，都比島上所有的更新鮮。串流視訊的年代讓斯達夏處於劣勢，因為它幾乎是西半球最後取得寬頻的地方。我提到一部紀錄片，吉爾摩卻腦中一片空白，他開玩笑說：「是十三年前出品的嗎？」

當時英國廣播公司正在播《教你動手做》（*Mister Maker*）兒童節目，那是我們整個下午專注所在，看著表情豐富的英國佬用造型粘土和通條，做出三隻小外星人玩具。在斯塔福德郡客廳裡的小孩著迷專注，大人則露出小孩們不能理解的微笑。喬安娜的母親和她的新婚夫婦正在路上，要來共享紅酒和印度菜晚餐，最重要的是，一起談論考古學。

他們心中不曾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他們開開心心向前走。我了解他們，無論是否陷入困境，他們都能快樂過生活，即使面對小朋友脫序，喬安娜還是認為：「這是家常便飯，」她臉上帶著微笑，而吉爾摩也不怕苦。他們爽朗地承認，不工作的好處是可以陪小孩。斯達夏的時光一去不復返。有位從島上逃離後住在荷蘭的朋友，已經決定退休後要返回，吉爾摩沉痛轉述：「你知道有句荷蘭話：dat is verkeerd?（那是錯的？）好吧，我告訴她：dat is zo verkeerd（真的錯了）。」

他搖搖頭，然後開始勾勒他和喬安娜想丟給考古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ICAHM）的偉大夢想：在Google地圖上登錄考古遺址和紀念碑。任何人都可以透過iPad列出考古遺址。全世界的考古學目錄！

二〇一三年，距離我造訪利奇菲爾德將近一年後，喬安娜在臉書上發布「格蘭特·吉爾摩是我的今日英雄，因為他從不放棄。」吉爾摩剛找到自行車店的工作不久，又提到他的身體狀況良好。二〇一三年稍後，就在他離開斯達夏兩年後，他獲得謝菲爾德（Sheffield）大學考古學系六個月的教職。這代表他職涯迷途的終結。二〇一四年初他參與共同編輯的《加勒比地區考古學百科全書》出版了，不久後他找到一份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的差事，這是另一個歷史考古學的搖籃，他擔任查爾斯頓學院「歷史保存與社區規劃計劃」的負責人。他的任務是在課程裡引進更多考古學。「是的，我們開了香檳，」做了三十個月的性向測驗後，他終於告訴我：「結局真是不可思議。我想應該是應徵三百多個工作，才成全現在這個完美的工作。」

1 這位考古學家是試圖募資雇用退伍軍人，協助整理和保存這些資料的桑尼·崔林寶（Sonny Trimble）。

2 吉爾摩的Twitter名稱是：@Dig_or_Die。

穿越時空的旅程 ——我們的合作夥伴

「許多重要的歷史永遠消失了。」我想到吉爾摩一份報告裡的這句話，那時我穿著沾滿灰塵的灰棕色越野鞋出門，手上拿著一本《族群的綠洲：華人在黑山》(Ethnic Oasis: The Chinese in the Black Hills)。受到這本書共同作者、考古學家羅絲·耶斯迭·佛夏(Rose Estep Fosha)的鼓舞，我一直在尋找南達科他州枯木鎮上中國城最後的片磚塊瓦。這座城不夠大到獨立為一個城鎮，但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淘金年代，數百名華人曾經在下主街附近生活和工作。在那個年代，這裡是泥濘髒汙的街道，現在已鋪上古樸的紅磚，恢復以前漂亮的風貌。我從主街往下走，經過共濟會所，沿著寬闊門廊放置長椅的富蘭克林旅館、查理·亞特(Charlie Uter)故居、凱文·科斯納的小酒館、開放式T恤店、博奕娛樂場，流行音樂和卡鏘卡鏘錢幣落進當地人口袋的聲音，至少有一部分表示保存歷史的成果。拯救搖搖欲墜建築物的期望，把博奕產業帶進了枯木鎮。

天氣異常溫暖的九月，一整天臭氧構成的雲層堆集在山丘上方。傍晚，血紅到發紫的天空籠罩在有歷史感的建築，遊客拍照或在有吃角子老虎機的娛樂場閒晃。我來到枯木鎮較新、較未開發的區域，街道一側聳立著之味的漢普敦飯店(Hampton Inn)和田莉齊娛樂場(Tin Lizzie Casino)。另一側則是背靠侵蝕土牆、整排鋪著薄薄一層碎石子的停車場。我看到裸露的樹根和牆壁坍塌的地基。掛在鏈條上的標示將停車場分區：ACES娛樂場及漢普敦飯店停車場、代客停車區、來賓專用停車區。垃圾桶旁立著枯木鎮華人的大型解說看板，不遠處藍色垃圾車停靠在老舊的擋土牆邊。這就是碩果僅存的中國城。

前一天，我攀上陡峭山坡到摩利亞山公墓(Mount Moriah Cemetery)，是狂野比爾·希科克(Wild Bill Hickok)和多難珍妮(Calamity Jane)安葬的所在。墓園裡最近重建華人奉奠供品的祭台，用的是從中國城黃飛力(Fee Lee Wong，音譯)的榮粹商號(Wing Tsue Emporium)拆除後搶救來的剩餘磚塊。二十世紀的前數十年，黃飛力是枯木鎮最具聲望的華商，居間聯繫白人與亞裔的重要人物。祭台就像一個亮白色小廟，座落於老舊歪斜墓園區上方山丘的一側，就在狂野多難的比爾和珍妮的墓地小徑往上走的地方，南北戰爭時期墓碑上鮮明的白色十字架幾乎磨平了，而猶太區則堆起石頭緬懷祖先。一旁有全新的墓碑紀念「黃飛力的嬰兒，枯木鎮出生，死於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和「黃小孩，枯木鎮出生，死於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枯木鎮華人的故事，是個智謀洋溢的故事。從一開始追逐潛在高報酬的金礦發掘，到後來成為枯木鎮的商人、洗衣店和餐館老闆，並包辦礦工的日常需求。即使金礦發掘毫無所獲，礦工還是需要食物和乾淨的衣服。很少華人帶著妻子移民過來，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之後禁止進一步的移民，男性人口銳減。黃飛力運氣好，把他妻子帶來了，雖然他們的孩子有兩個死亡，但有八個活下來。

他的後人在二〇〇四年重逢，聚集在下主街，就在他們的曾祖父和曾曾祖父建造的建物前，拍下一張紀念照片。在他們離開前，黃飛力後人拜會市長並遊說保留建物。市長向他們保證，大家都想要保存建築。屋主在取得許可拆除兩邊不穩定結構時，已特別被要求保留建築物。但不知何故，在二〇〇五年的聖誕夜，屋主和他的兒子開始拆屋，枯木鎮最後所剩的中國城建築遺跡：榮粹商號，最後成為街道上的一堆碎石瓦礫。

考古學家蘿絲的聲音激動，述說著拆屋的故事：「十八個月來我不得不邊說邊哭，這是枯木鎮最棒的歷史片段。」當她和丈夫考古學家麥克向我談到枯木鎮考古發掘時，他們努力保持冷靜。

對佛夏夫妻而言，拆屋故事不是唯一令他們難過，他們與其他考古學家還有別的傷心故事。被寫出來的遺址、成為遺產標的物的遺址和旅遊遺址，通常伴隨著損壞和毀滅的故事；光是想想帕德農神廟，或是龐貝古城就足以理解。但是有多少遺址因為疏忽或是利慾薰心而

被毀滅，造成遺址寶藏遭到翻土掩埋或在eBay上拍賣兜售？多年來，蘿絲關切枯木鎮遺留物的流失與危迫，她監督中國城基地的發掘，經過一再懇求，終於說服榮粹商號的老闆讓她做建築物內部的記錄，哪怕只有一個小時。這是能被接受的謙遜要求。屋主讓她進入，要求她一個小時內離開，她喀嚓、喀嚓拍著照片，只有一層樓，不能更多了，只有一小時，不能再待久了，她說：「我在一個發表會中提到……出乎意料，我居然可以不流淚完成報告。」

為什麼你想成為考古學家？

離枯木鎮空地一小時車程、湍急市（Rapid City）波提切利義大利餐廳（Botticelli Ristorante）的包廂裡，麥克專注聆聽他妻子談話。他熱切追蹤長毛象遺址，尋找人類把長毛象的骨頭切削成工具的地方，他說：「新鮮的長毛象骨頭用起來像石頭，還更好用呢！」尋找一萬三千年前北美人類文化證據——考古學家稱為前克洛維斯（pre-Clovis）時期——他確信這時期來自西方一個長毛象屠宰遺址，他說：「回推人類進入新世界的時間很有趣，因為爭論激烈。」他在南達科他州布魯金斯（Brookings）發現一個遺址，應該可以通過未被擾動的嚴格遺址標準，他們把此處取得的長毛象斷骨標本送進兩個實驗室測定年代。「只有一種生物能夠擊破長毛象的骨頭，那就是人類。」實驗室測定斷骨的年代約為一萬四千五百

年前，比最早的克洛維斯矛頭還早一千多年。但在他和志工尚未完成發掘工作和記錄堆積層之前，郡公路維修班破壞了一部分遺址。或許是搞錯了，或許是修路範圍的因素。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這故事毫無詩意，也沒有情緒。「所有你能做的，只是一笑置之了。」他說。

儘管失望，但佛夏一家人別無其他生活方式的選擇。五十幾歲的蘿絲，任職聯邦緊急措施署 (FEMA)；麥克比蘿絲小四歲，在南達科他州政府工作，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我為人民工作。」假期時即便不去參與考古發掘，他們也會造訪遺址。

傍晚的光線穿透餐廳的窗戶，蘿絲和麥克分享一份義大利三明治，兩人低著頭朝向對方。她金髮，他則禿頂以下整齊梳到耳朵下方。她的花披肩披在肩上，他穿著整齊的背心和硬領襯衫。蘿絲說，她從小學四年級就想成為考古學家。「我告訴老師我想挖泥土，不是要挖死人那種，我是想挖出在我們幫他命名之前就已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她的老師體貼地問她：「為什麼你想成為考古學家呢？」蘿絲三十四歲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考上大學之前，她從堪薩斯城的家裡通勤到堪薩斯大學。麥克是她第一個田野班的助理主任，他們在那裡相遇。她說，他有天賦，看風景時可以找出景物千年萬代以前的樣子。他有本領知道發掘遺址時第一鏟應該從哪裡下鏟，這結合了訓練、對土壤的敏感度、對地貌了解，景物如何歷時演變。麥克稱他所做的是「穿越時空的旅程。」

蘿絲的第一任丈夫，孩子的爹，在第一場田野班將結業時來訪，正好是她發現陶罐邊飾那天。她說：「這比常見的大塊，我們弄到陶罐頸和罐緣。」麥克指出，裝飾很關鍵，因為「這透露出，是誰做的以及何時做的。」「我是如此激動。」蘿絲說：「現在談起來仍然感到心寒！」她叫她丈夫出來看看她的偉大發現。「他走過來說：蘿絲，你頂著大太陽在外面幹嘛，為了破東西發狂？你瘋了嗎？我想了想，我們兩人之中有一個是瘋了。」或許離婚無可避免，田野班那個夏天的八年後，她和麥克結婚了。

他們到現在在一起多久了？「十四年。」蘿絲不假思索地說，但麥克搖了搖頭。「我怕你會問。我回答這問題幾千次了。」他笑著說。

我羨慕他們能夠在風景中看到遺址和文物，並告訴他們威斯康辛的隱形象形土墩。麥克和蘿絲笑著說，他們認識的人，包括考古學家都不會辨識地貌。

「跟知道自己看到什麼的人走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我說：「有人可以辨識土墩的形貌，或注意地面上的玻璃珠。」我正想著聖尤斯特修斯的藍色玻璃珠。

「而且還會問到這玻璃珠是從哪裡來的。」麥克看著蘿絲，接續我描繪的意象說。
她盯著他看，並低聲說：「是船難。」

水下奇案

——慢慢考古，深深考古

她終於讓我進入她的總部，凱西·阿巴斯（Kathy Abbas）表示：「我是這裡的女王。」位於新港海軍綜合大樓（Newport Naval Complex）組合屋裡的一間倉庫。房間裡充滿海洋史跡的塑膠牛奶箱，和好幾貨架的鑲鐵文物。我看著周圍整齊的紙堆和地圖，黃色的塑膠貓砂盆裝滿捲尺、網線和防水筆記板。這到底算什麼女王？接著，她帶我去看她的寶物埋在哪裡：海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最大的一支戰艦群，沉沒安息的海底墳墓。

車子隆隆前進，我坐在她的副駕駛座上。這款車適合海洋考古學家：老舊但功能齊全，又氣質灑脫，十七年車齡的 Pontiac Trans Sport，儀表板上有三個亮著的警示燈，里程顯示已經超過八萬英里。阿巴斯飄飛的白髮襯著美麗的方臉，頭頂編髮成髻，她有海藍色、雪亮的眼睛。駕駛座後推以緩和骨質疏鬆造成的脊椎傷害，阿巴斯警告我，後座的哈巴狗蒂娃，最近剛除了跳蚤，但可能還有。阿巴斯昨晚被跳蚤咬了，她想嚇跑我嗎？門都沒有。

我提出訪談請求後，考古學家就義正辭嚴的表示：「我很樂意和你聊聊海洋考古學的內容和難題。但不可能讓你從岸上觀察考古團隊，我們也不會釋出未發表的智慧財產權給你。」就是這個人，曾在學者分享作品的學術社群網（Academia.edu）張貼公告：「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Rhode Island Marine Archaeology Project, RIMAP）以及我本人，不會在這個網站張貼本研究的報告、出版品或資料。任何這樣做的人不但違犯保密原則，並且有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訴訟風險。」她是一頭鬥牛犬，有哈巴狗相伴。想坐上她的副駕駛座，我必須加入她的組織（討價還價之後二十五美元），還得提供格蘭特·吉爾摩的推薦信，因為她的辦公室位於海軍基地，我也必須提供我的社會安全號碼，還要接受安全檢查。但我下定決心要到現址去看她。在這組織鬆散行業中，有學院考古學家、政府部門的考古學家，也有約聘的考古學家，阿巴斯也和吉爾摩一樣，創辦了獨立的考古學中心。考古學中心位在新港紙醉金迷海港區的陰暗角落，又有落腳羅德島大學著名的沉船探險家羅伯·巴拉德（Robert Ballard）的競爭，她卻能夠近乎不費分文做到。不擔心池塘擁擠，她讓自已名聲響亮，戮力推動考古學。

阿巴斯猛踩油門踏板，車子帶著我們經過位在海軍基地上的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辦公室，在通往新港美麗的林蔭大道和街景的外圍。她又給我另一個警告：「十年前我買了這部二手車，送修划不來，因此車子如果拋錨的話，我會把你丟在路邊。」她嚴正警告，除了別的麻煩之外，我們最後可能要靠兩隻腳行進。陰沉的秋日，我們在跳蚤肆虐、破爛不堪的車

上，嘎嘎響過海軍基地門口的武警哨所，前往新港豪宅區、歷史艦隊沉浸其中的港區水域。

阿巴斯王國的寶藏包括一七七八年由英國故意擊沉的十三艘船艦，用以阻擋法國馳援美國的軍艦，以解救新港的海上攻勢。沒有人知道，如果戰爭期間法國海軍阻止英國擊沉船艦又將如何？所有被擊沉的船艦成為歷史的獎賜，其中某些船隻用來載運武器和士兵以攻打叛變的殖民地，另一些載運過戰俘。阿巴斯指稱，這些船隻當中有一艘之前是奮進號，又稱奮進號三桅帆船（Endeavour Bark），第一艘搭載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周遊世界的船隻。對多數美國人來說，庫克不過是一個十八世紀的冒險客，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他是探險家之王。他的奮進號航程把澳洲和紐西蘭納入地圖，奮進號是澳洲的尼娜號、平塔號和聖瑪麗亞號（哥倫布首航艦隊），甚至也可以說是澳洲的五月花號。庫克的名聲響亮，讓阿巴斯的投入超乎尋常考古學家的壓力。她吐露：「難以想像，許多人聯絡我們只是想要盜取消息，以利尋找庫克船長的奮進號。」設想一下，擔心海賊的海洋考古學家是什麼模樣。

阿巴斯近七十歲，花了十五年待在新港海港區，從事沉船的保衛工作，同時準備進行徹底的發掘，但「我們根本還沒準備好。」她告訴我：「我們還有好幾年的工作還沒做好。」因此，船只好繼續沉浸在開放水域裡，隨時面臨天災和遭劫的風險，阿巴斯透露：「現在就有船停泊在那裡。」但她不想急就章。她說，考古學家用對方法進行水下發掘的諸事中，最

需要有個可以進行研究和保存研究發現的場地。所有冒出來的東西都必須加以保存，如果我們講的只是替裝著脆弱文物的罐子換水，尺寸夠小也可以放在貨架上，但這些陸續而來的負擔看來已經十分沉重，但當要保存的是一艘沉船的時候，難度就倍增了。若要保存的是一整個艦隊，困難的程度就更不用說。一旦去碰它，你就是在擾亂它。確切的說，你可能在破壞遺址，讓未來考古研究更麻煩。所以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專家們異口同聲：考古學的未來躺在水底下。我的一位老師說：「如果你想成為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就去學習水肺潛水。」回到南達科他州的內陸場景，當話題轉向海洋時，麥克·佛夏出竅癡迷，他說：「冰河融化後水漲高三百英尺。那裡的水下風景訴說著原住民的故事，那是早期遺址所在之處。」雖然佛夏對水下考古學並不在行，但他熱切關注其發展，從開挖英國詹姆斯敦（Jamestown）目前部分淹沒的最早住屋，到發現英格蘭外海四十多艘一次世界大戰的潛水艇，有些仍載著當時的船員。外行人眼中黑黑黏黏的石頭和纏滿飄流海藻的團塊，居然是開啟歷史深層奧祕的關鍵。

阿巴斯並非自始就關注沉船或淹在水下的考古遺址，她輕描淡寫地說：「我的職業生涯很特別，走的不是慣有的路線。」她是空軍的孩子，成長期間待過世界各地，最後落腳在南伊利諾州立大學。儘管還在上大學，她已經嫁給前伊拉克駐聯合國大使的兒子，政變後在大學任教的阿拉伯皇室。她主修人類學，以為終將定居中東，並在貝魯特和巴格達的博物館找

工作。她有一位具影響力的考古學老師泰勒（W. W. Taylor）告訴課堂學生說，考古學沒有女性發展的空間。「現在他當然廣受質疑了。」阿巴斯冷淡地說。她早就學會在沒有鼓勵的情況下堅持下去。

文化變色龍

阿巴斯在哈佛攻讀學位時，並不知道左舷和右舷的差別。她想弄明白馬、牛和豬從歐洲運到美洲是多久前的事，她模仿戴單邊眼鏡的英國海洋考古學家教授說：「親愛的，這麼重要的問題早已被解決了。」（令人氣憤！匠氣！殖民心態！）想知道豬和馬如何運到美國，自然引領她研究船舶，她也開始對船舶產生興趣。她拋下維吉尼亞州黑人大學的終身教職，鑽研水肺潛水和航海課程，又跑去新港做海事檢驗員的幫工。她開心地說：「我奔向大海，我是美國第一個從事海事檢驗的女性。我會去機房檢查，他們把擴音系統交給我。我會說：打開艙底。讓我看看發動機。」船舶機械運作原理的基本知識，至今仍讓她受用。

阿巴斯和丈夫離婚了（沒生孩子，但她保留夫姓，「Abbas」在阿拉伯文裡是神和堅強的意思）。她在新港經營一年遊艇博物館，接著失業了。高不成低不就，且又「不是天真到人家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她有自己目標，她想在水上工作。

有一天，阿巴斯跟著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一位考古學家到紐約喬治湖（Lake George），潛水員在那裡發現法國與印第安戰爭期間一艘沉沒的木造戰船。潛水員獲得紐約州政府的許可，在考古學家指導下進行調查。但當考古學家隔天離開後，阿巴斯反客為主，包辦了北美地區最古老的戰船開挖工程。

為了研究木造戰船，阿巴斯在新港和喬治湖之間搭慢速巴士往返通勤，替羅德島州政府工作的考古學家建議她，乾脆為自己的州政府工作。羅德島擁有為數眾多的沉船，這位考古學家負責保存羅德島的歷史遺產，雖然許多遺產位在水上或水下，但他卻沒有水上、水下考古的工作組員和專業知識。根據阿巴斯所說的：「他們甚至沒有全州歷史遺產的清單。除了偶然浮現的吉光片羽，他們不知道哪些遺產丟失了，哪些遺產可以發掘。」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於一九九二年在阿巴斯的餐桌上誕生。「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列出清單。」資料庫自此持續增長。她訓練志工記錄羅得島的海洋歷史，以協助水下遺址的調查。她和同事提供歷史、潛水、發掘和史蹟保護等課程，教導博物館工作者、水手、青少年與退休人員。她的許多學生繼續攻讀這個領域的研究所，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也提供大學生航海史和海洋考古學的田野體驗課程。她發現，大多數人對船一點也不了解。沉沒艦隊中的船隻有重要的歷史含意，她想教育大眾去理解和欣賞，她也想培養有能力的考古學家幹部，第一時間就知道挖到的是什麼。

一開始，阿巴斯自給自足，為了賺取補貼研究室的花費，她到新港一些漂亮房子做清潔婦，就是我們搭車到處晃的時候所看到的那些漂亮房子。阿巴斯打掃豪門太太的家，她說：「她們知道我在搞非營利組織。你可能以為她們會給點小費或捐款，但是並沒有，我還碰到貴婦向我說：你最棒了，我想念你，我找不到比你打掃更好的人了。」

這位考古學家居然告訴我，她是一個能幹的清潔婦？沒錯。阿巴斯說：「我認為你若擅長某些事，其他方面通常也會做得很好。」

阿巴斯十年前差點跑去伊利諾州從事保險工作，而退出水下考古工作。還好，她領悟庫克船長的奮進號發生了什麼事，這成了她的事業契機，她答應稍後跟我說明來龍去脈。

阿巴斯把車駛進新港老街的停車處，她突然閃進印刷廠，我和小狗蒂娃等著。「怎麼了？」我問狗兒，蒂娃用後腿搔著身體回應我。蒂娃被救回兩次，第一次是在主人過世後被阿巴斯的朋友救起，接著是阿巴斯的朋友死了，阿巴斯告訴我：「大概要過一年之後，小狗才體會主人回不來了。」蒂娃現在看來鎮靜坦然，擔任未來水下考古的吉祥物一定不是問題。

阿巴斯和推著推車的男人從印刷廠走出來，裝著小冊的箱子堆滿推車，她把箱子推進後車廂。「看到了嗎，這是本州獨立戰爭遺址系列。」阿巴斯解釋：「我們辦公室產出大量灰色文獻，你知道什麼是灰色文獻吧？就是尚未交付商業出版的研究報告和書籍。」羅德島海

洋考古學計劃產出的灰色文獻，包括獨立革命期間羅得島歷史五卷，那是阿巴斯寫的。

獨立戰爭醫院傳單的背面介紹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這是個志工組織，訓練田野工作人員，並邀請他們參與歷史研究。「想做點令人振奮的事嗎？」她用這種調調跟我說：「發現它、處理它、將它歸檔，就是你可以做的！」她也大方地在傳單背面註明：「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徵求：便於民眾使用的文物保護、儲存和展示設備。」

「我會帶你去漢莫斯密農場（Hammersmith Farm）的獨立戰爭醫院古蹟。」阿巴斯說。一如我和別的考古學家共同經歷過的，我們踏上的旅程充滿鮮活的歷史：獨立戰爭時代的間諜住過的殖民時期的房舍，朵瑞絲·杜克（Doris Duke）的豪宅，但也有鬼影幢幢的地方。阿巴斯的導覽包括，已被都市更新計劃摧毀的十八世紀碼頭魅影。她指出：「陸地上也能進行海洋考古。」

獨立戰爭醫院古蹟現在住了一些農民和康寶濃湯的女繼承人，農民幫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種植不知名牧草。打理過的鄉村風景，有些糞便和汙泥在農場上，也有山羊閒晃，看來是田納西的發昏羊，屬於稀有品種。

遊歷漢莫斯密讓我得以一窺阿巴斯的社交生活。她告訴我尤沙的故事，他住在漢莫斯密附近，尤沙是前外交官休·奧金克勞斯三世（Hugh Auchincloss III）的綽號，他的同母異父兄妹包括高爾·維達（Gore Vidal）和賈姬·歐納西斯（Jackie Onassis），阿巴斯笑著說：

「想判斷彼此關係的親近程度，就看你能否以他寵物的名字稱呼他。」賈姬和甘迺迪的婚宴就在這裡舉行嗎？阿巴斯前往新港農舍別墅，參加那場別開生面的晚宴，她說：「是的，我化了妝又穿上漂亮的衣服。」這張照片和她穿著絲絨背心拿著雞尾酒的照片，出現在學會的網頁上，「我是他們調教的猴子。」她開玩笑說，我們這些老前輩都是窮人。她是說和投機客比起來，他們相對不富裕，其實很多老前輩比她有錢。

我曾遇過一位自稱文化變色龍考古學家，但是這個形容詞適用所有的考古學家，尤其是阿巴斯。她是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的專家，有能力評估遊艇的價值和適水力，她嘲笑量產而失去精緻的麥克豪宅 (McMansion)，她說：「你可以看出哪裡不一樣，對吧？」她選擇一文不名的生活，開著故障的車穿過貴族社區，她曾在那裡做清潔女工，也曾是晚宴的座上賓。

打工擦地板的考古學家

新港的資深成員中，投資阿巴斯的考古研究中心最多的是小亨利·安德森艦長 (Commodore Henry H. Anderson, Jr.)，大家都叫他哈利，紐約遊艇俱樂部前總裁，也是航海事業和航海教育的贊助人。他已經九十幾歲，終身未娶，是新港著名的黃金單身漢。他介紹

有可能贊助的人給阿巴斯，並且帶她到鎮上四處參與社交活動，當她的護花老爺，就是他提供的種子基金，讓她可以前往倫敦弄清楚奮進號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故事傳誦多年，庫克船長的奮進號在聞名遐邇的航程結束後，退役並重新命名為自由號 (La Liberté)。據說，當他運送鯨油前往殖民地時，在新港擱淺。自由號的木料經過打理事並確認為奮進號的部件，在新港歷史學會和澳洲國家海事博物館都展示過，奮進號的尾柱成為主題圖象，儘管已經是一塊老舊、蛀壞的木頭。

但是在一九九八年，阿巴斯嘗試要鑑別新港港底的英國運輸船隊，她收到來自兩個澳洲業餘史學家共同署名的一封信，他們認為大家認錯船了。他們相信，博物館展示所謂的奮進號的木料，確實是來自另一艘庫克的船。澳洲人隨信附上他們所寫的一篇文章，結尾的一句話吊足阿巴斯的胃口：「信末寫說：沒有人知道奮進號發生什麼事，一七七九版的《勞氏船級年鑑》(Lloyd's Register) 中，他以三明治助爵號 (Lord Sandwich) 之名從倫敦帶領船隊出海，在那之後，他就退役了。」碰巧，阿巴斯的水下獨立戰爭艦隊中就有一艘三明治助爵號，她說：「殺雞不用牛刀，這也用不著請出火箭科學家來驚嘆一聲：啊哈！」三明治助爵號就是重要的歷史船艦，如果它就是奮進號，那麼舉世聞名的船難殘骸，就泡在新港的水域中了。

一位友人提供阿巴斯飛往倫敦的機票，從英格蘭惠特比 (Whitby) 寄出，那裡是庫克船

隊的造船基地。曾和阿巴斯一起潛水、知道她研究主題的友好歷史學家，提供她過夜的沙發，就在公共紀錄辦公室（The Public Record Office）附近的轉角。在夢幻的七天中，阿巴斯把安德森的五百美元捐款花掉，換成一張張資料複本，為了追蹤彭布羅克伯爵號（Earl of Pembroke）運煤船的歷史。詹姆斯·庫克和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挑選彭布羅克伯爵號並裝配器材，將船名改為HM三桅帆船奮進號，用這艘船創造歷史性的環球首航。這艘三桅帆船或稱小帆船，成為西方第一艘盡覽紐西蘭和澳洲東岸的船隻。回到英國後，船被出售了，重新命名為三明治助爵號。新船主提供船班運務，支援英國海外戰爭。經過維修後，三明治助爵號運送黑森傭兵（Hessian mercenaries）前往羅德島，然後在新港碼頭附近停留成為監獄船，監禁被英方擄獲的殖民者。當法國艦隊援助獨立革命，英國下令擊沉包括三明治助爵號在內、停靠在碼頭的英方船隻，一方面阻絕法軍上岸，一方面免於船隻落入法國人之手。

阿巴斯滿足地說：「我發現一分文件，推翻一段故事卻又彰顯另一段歷史。這就是我所說的事業契機。」尚未揭曉的懸疑之處在於：三明治助爵號、奮進號的前身，是否仍然浸泡在新港的淤泥下？有殘骸留下嗎？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能否證明這一點？有東西可以展示嗎？如果是這樣，國際遊客會不會川流不息前來羅德島？到伊利諾州退休的計劃被阿巴斯丟進海裡，她退休不了了。

庫克是英格蘭約克郡農民之子，是阿巴斯津津樂道的身世。就跟阿巴斯一樣，庫克穿過錨鏈管（hawsepipe，航海俚語：從默默無聞的底層升到頂層）竄升而上。阿巴斯告訴我：他是個「無名小卒，但他的探勘事業、地圖測繪和地理發現，在世界上沒有人可以超越！他真的很重要。而且他在夏威夷遇刺並被吃掉的傳奇，更讓他的故事迷倒眾生。」

「他被吃掉？」我問。

她像在說悄悄話，卻故意提高音量回答：「噓！別講太大聲，這可能真的發生了！」²

「我對新港的觀光客說：這裡有十八世紀漂亮的家園豪宅，但美國還有更好、更大的豪宅。新港擁有其他地方沒有的，是這艘和庫克有關的船艦。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阿巴斯說服美國人，特別是羅德島居民，這位國際知名人物應該對他們頗具意義。她現在是胸懷行銷計劃、熱情無比的學者，或許她能找到強尼·戴普（Johnny Depp），說服他拍部有關庫克船長的電影。

新港之旅最後一站是海濱的亞當斯堡（Adams Fort），交通錐圍著海角上的停車區。她對警衛說：「我跟考古隊一起來的。」交通錐快速移開，讓我們的車進入。我們向右駛往碼頭，即使天空灰蒙蒙的，但光線還是很燦爛。阿巴斯指著山羊島（Goat Island），那裡曾經是海盜處以絞刑並埋葬的處所，現在他們的遺體上聳立著凱悅麗晶飯店。山羊島到克萊本佩爾橋（the Claiborne Pell Bridge），有個矩形往東延伸到岸邊，港灣中兩平方英里的區域，就

是獨立戰爭艦隊被擊沉的地方。

阿巴斯發起監管這兩平方英里港灣的活動，並代表州政府求償，她說：「比起保存法，打撈法雖然老舊，但對保護遺跡卻更有效也更成熟。」這個想法來自她的同事凱莉·林奇（Kerry Lynch），她說：「如果打撈者可以擁有文物，那麼我們何必為了保存法傷腦筋？」阿巴斯實現這個想法，由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和州檢察總長前往聯邦法院，代表羅得島州政府取得兩平方英里區域內，所有非機動木船的求償權。由於他們的勇氣和政治手腕，羅得島州政府目前持有三明治勳爵號，也就是之前的奮進號，和其他護衛艦的保管和所有權，聯邦法警有權逮捕試圖擾亂沉船殘骸的人。

阿巴斯巧妙地以打撈法代表州政府求償，被其他海洋考古學家視為典範。她常被引用的文章〈海洋考古學家論寶藏打撈〉，以激憤的語氣開頭：「那些拚命搶拆沉船裡閃亮寶藏的盜寶者，不是所有律師都肯對他們拍馬屁。諸多重要的歷史遺址，不是所有考古學家都弱智無能，我們決意讓這些沉船與世隔絕。」

和藍色的加勒比海不一樣，新港水域是棕色的。有位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潛水員回想：當地潛水區能見度低到「大家必須綁在一起。」但技術突飛猛進，尤其是側向掃描聲納系統，可以產出精彩的海底地貌影像，但阿巴斯說：「很多區域的地形看起來就像沉船。」我問她，超過兩百年的沉船還會剩下什麼？一堆壓艙石直立在那裡，保護淤泥下的木板和其

他沉船部件。對外行人來說，歷史沉船的壓艙石堆看起來和港灣底層其他石堆差不多，即使是內行人，這些堆疊物看起來也是模糊不清，必須進行考古學家所謂的實地調查（ground truthing）步驟。阿巴斯說：「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做實地調查。」但淤泥下的木質船骸難道不會腐爛？其實，若是不受擾亂，淤泥會形成免於氧化的保護層，在尚未暴露於空氣中之前，沉船的有機骸體不至於分解。

阿巴斯表示：「如果你請我吃午餐，我就給你看看從沉船裡拿到的紡織品、皮革和其他東西。數量非常多。」一九六〇年代以前，考古學家懷疑水下發掘可以得到文物。此後這些疑慮消失了，即使幾年前還可用的保存方法，現在也不堪採用了。這是阿巴斯發掘進度緩慢的另一個原因，不過技術一年比一年純熟了。有考古學家說，考古學的未來在水下。阿巴斯卻認為，未來要看材料科學和保存方法的技術進展。保存已發現的遺跡是最困難的，她厭倦了那些英雄或探險家，他們認為找到有名的沉船最重要。事實上，找到船的重要性只不過占百分之五。

於是我請她吃午餐。我們坐在主教第四街餐車（Bishop's 4th Street Diner）的隔間座位，海軍基地外面環狀叉路上老舊破爛的銀色飛艇，窗口綴滿貝蒂（Betty Boop）小配件。女服務生熱絡招呼熟客阿巴斯，立刻幫她點餐：半熟漢堡和薯條。

阿巴斯曾經培訓幾個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工作的替代人選，但有人能像她一樣辛勤工

作、省吃儉用，一個月花不到一千元嗎？（這份收入包括她十多年教學工作的社會安全福利金）「很難要求必須養家的年輕人做到這點。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說：你以為你一年可以有六萬美元收入嗎？誰跟你說的？即使賺三萬都很難。我真不敢相信。我做研究生的時候，有更多可支用的收入！」阿巴斯痛斥大部分考古學系和人類學系的研究課程，她認為他們掩蓋這行業畢業即失業的事實，欺騙了學生。

她用犀利的眼神盯著我，指著薯條要我吃。

「到現在我已花六個小時讓你明白重點。你知道為什麼要花這麼久嗎？你可知道，為了找尋獨立戰爭艦隊，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間我們第一次做水底影像遙測。那時候整整花了二十年！人們說：阿巴斯博士，你為什麼還沒找到？你知道這事有多重要，又是多麼困難？這是一個繁雜的多場址研究。科技正在改善，這幫助很大，但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卻不花錢由志工完成。」

這位有遠見的人，夢想透過打工擦地板去實現這個浩大工程。

自己精心策劃的冒險

六個月後，我重返新港參加海洋考古學全日課程研習。為了預做準備，我研讀了阿巴斯

送我的三磅重航海教學資料，包括航海詞彙和縱帆船圖略、倫理守則、漁民爆裂物指南（新港仍會遇到二戰的漂流軍火），和一篇〈論科學廉實、主要證據及資料的控制與保護：不公開守則〉。雖然課程不容易，但學費只要五十美元，就可以和有考古學興趣的潛水員混一整天，聽阿巴斯講課，我知道她是講究教學效果的老師。她保證，我不用把頭埋到水裡就可以研究水下考古學。有地上的海洋遺址，還有大量的文物保存和分類工作。

課程在上午九點半開始，地點在美輪美奐的新港圖書館會議室。我準時抵達，潛水員勞爾就讀紐約海事學院（New York Maritime College，如夢似幻，座落窄頸大橋下方），我和他在會議室聊天。十點的時候，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的志工終於出現，推著載有兩大箱檔案的推車進來，並帶來壞消息：幾個小時前，她開車載阿巴斯去醫院就診，沿路她痛得大喊大叫。醫生診斷是腎結石。志工黛比·杜威爾（Debby Dwyer）把會議室外其他學生喊進來，然後給勞爾和我講義，道歉並宣布課程改期。杜威爾動身返回醫院，她同意讓我跟她去。

我們開車穿過新港的迂迴單行道，抵達急診室時，阿巴斯剛做完電腦斷層掃描，用輪椅推回來。她的白髮捲成髮束，看到我們的時候露出開心的表情。我只是想看看她還好嗎，但阿巴斯很高興有人陪伴，吃了止痛藥感覺好多了。她說：「止痛藥有效！」之後的一小時，阿巴斯靜候通知，而我們等待她的檢查報告。她告訴我，劈啪大響的破車已經報銷了，她現在搭巴士從布里斯托家裡到新港。通勤不是問題，但從巴士站到海軍基地羅德島海洋考古

學計劃辦公室兩英里卻很頭痛。杜威爾和其他志工合力讓阿巴斯移動方便，輪番載她去雜貨店。「她就像我第二個母親。」杜威爾說。後來一位志工，把破爛的水星汽車（MERCURY）以一美元賣給阿巴斯。

急診室護士詢問阿巴斯的疼痛指數。「好多了，六到七吧。」她愉快地說，因為護士準備再幫她打一針，於是請我們到外面。她告訴護士：「不需要，他們可以留下來。」阿巴斯正在講故事，是有關三明治伯爵伉儷造訪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辦公室的故事，她平靜地講著。這比起阿巴斯其他故事情節更複雜，也更有趣。

一般認為，是三明治伯爵（Earl of Sandwich）四世發明三明治。此人擔任英格蘭海軍大臣時，曾派遣詹姆斯·庫克前往世界各地。發現奮進號和新港的關連之後，阿巴斯開始追查這位伯爵的後裔。她開始與三明治伯爵十一世的兒子通信。兒子沒有頭銜，他擔任三明治伯爵快餐專營權的美國總裁。快餐公司網站上的標語寫著：與皇族伉儷一起用餐，酪梨培根和牛肉裸麥。並鼓吹大家加入上流社會。

阿巴斯從伯爵十一世的兒子得到消息，伯爵伉儷將前來美國參加連鎖店新開幕儀式，於是她寫信給伯爵：「給我一天時間。」在他們美國之旅的最後一天下午，三明治伯爵伉儷——他們廣為人知的名字是約翰和卡洛琳·蒙塔丘（John and Caroline Montagu）——現身新港海軍基地，參觀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辦公室。阿巴斯展示她從公共紀錄辦公室挖出來

的文件副本，說明庫克船長的奮進號、三明治助爵號和獨立戰爭之間的關係。她還分享一些從沉船採得的文物，在海裡四處漂流差點被認出或盜走的東西，其中包括古茶壺破片，阿巴斯開心的說：「他們對尋找奮進號有興趣。」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的博物館和遺跡保存設備，雖然八字還沒一撇，但她已經計劃要放進三明治伯爵餐廳，她說：「經營商店和餐館是博物館賺錢的方式，我們希望伯爵做我們的英國贊助人，我不知道是否有幫助，但至少算是勇於嘗試。」

結束參觀前，大雨已浸透新港，趕赴航班之前，蒙塔丘伉儷餓了，可是要帶伯爵伉儷去哪裡午餐呢？又是這種天氣？阿巴斯心中茫然，最後她開車帶他們去漢堡王買餐點，她透露：「他們把漢堡分成兩半，一起分享，顯然他們有些不耐煩。」她補充說：「最後我擁抱三明治伯爵，和他說再見。」

我問：「你載伯爵去漢堡王？」我們在急診室忘情大笑，這時候年輕醫師走進來，他曾經是潛水員，想聽聽水下考古學家述說的一切，於是阿巴斯邀請他到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修課。醫師寫下阿巴斯的處方，要求她約診追蹤病情，但阿巴斯不願意，最後醫師還是讓她出院。她硬說感覺好多了，吃午餐沒問題，於是我們去主教第四街餐車，讓她請我們吃三明治大餐。

後來阿巴斯寫信給我：「我在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辦公室二十多年沒有健康保險，辦

公室沒錢繳團體保單，也付不出足夠薪資讓我繳私人保單。美國薪資族的處境相當嚴峻，教育程度再好也沒有用，尤其像我這樣，從事薪資不敷生活開銷的行業。我們的課程也討論了這一行業的處境，怎樣取得資格、有什麼就業機會，要承擔哪些額外的非金錢成本（就像被認定為貧窮，才能到醫院大廳做愛心義賣的那種尷尬），但我仍然選擇留在羅德島，而不是去追求真正的工作。許多人以為選對了好工作，卻因為金融風暴，連退休金都保不住，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財富縮水，或被低薪年輕人取代。到底是執著熱情前進、以微薄收入維生的人比較糟糕？還是苦蹲在虛幻經濟中，一夕之間債台高築的人比較糟糕？」

阿巴斯強調，這是她的選擇，這是她自己精心策劃的冒險，從英格蘭迎向南太平洋，再從澳大利亞走到羅德島海域。

她認為，是婦女選民聯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的經歷帶給她果決和熱忱的特質。她是六〇年代青年，她想有所作為，但那是個大學生暴動和放火的年代。阿巴斯認為，加入聯盟是一種保持政治活躍而不進行破壞的方式。當她丈夫，一位新進美國公民，遠赴越南戰場「盡義務」時，阿巴斯在維吉尼亞州諾福克（Norfolk）投入聯盟地方分會的運作。她學習如何遊說政治家和運用法律，「大家嘲笑那些老太婆，像我現在這樣，但是她們教我如何在校園外求生存。當市長在市議會向你吼叫，教授在研究所教的都派不上用場。」她們還教她：「如果你要推翻法律，你必須在政治上很活躍。考古學家畢竟為數不多，對於想要改

變的事情，我們無須採取強硬、赤手空拳的方式。」她對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的雄心，更受到聯盟培養的公民責任心所影響。她相信，如果值得一戰，「好吧，那就束緊腰帶上戰場吧。」

回想某次造訪羅德島海洋考古學計劃辦公室，阿巴斯和我隔桌相視而坐，享用健怡可樂，她替我裝訂一份灰色文獻。我做筆記，小狗蒂娃在我們腳邊打盹。我在幻想中找樂子，想像我一輩子投入海洋考古，甘於貧窮、有隻救難犬相伴，生活在一個有帆船的社區。出於直覺，我問阿巴斯是否會讀謀殺奇案小說，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彼得·溫西爵爺（Lord Peter Wimsey）穿過這道門，我馬上就嫁他。」她給我一個神秘的多蘿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編案：英國人，創作以彼得·溫西爵爺為主角的一系列偵探小說）式的微笑。她當然喜歡美好的奇案，她現在不就把自己丟進一個水下奇案。

1 倫敦公共紀錄辦公室，現在稱為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2 根據庫克船長協會的網站，庫克並沒有被夏威夷原住民吃掉，只是用開水滾熟取出他的骨頭。

會說話的遺物



探險家俱樂部 ——古典時代和好萊塢的經典名作

這場考古學講座的聽眾大多年事已高。我看著他們紛至沓來，大多數人有雪白的頭髮、手杖和舒適的鞋子，他們被文物幻燈片和遺址話題所吸引，如飢似渴地聽講。這是老化常見的症頭，感覺自己正碰觸不可及的過去，渴求昔日文明的遺產。我們參加由紐約大學古典學系主辦的「古代世界記憶運作」研討會，在禮堂裡坐在我旁邊的人傾身向前集中注意力聽演講。他六十來歲，是退休作家，坐在較多年輕人的區域。他給我看研討會行程的註記，正打算趕場到哥倫比亞大學古地中海中心，去聽關於義大利龐貝城的演講。他問我，可以幫他占位子嗎？他估計午餐時間之前會回到紐約大學這場研討會，以前他也曾這樣做，悄悄溜進同一張椅子並打開他的筆記本。

「我有錯過講義嗎？」他想知道。盯著我給他的一份講義，「這份有書目。」他開心地說。他渴望聽到他之前錯過的瓊安·布雷頓·康那利 (Joan Breton Connelly) 的專題演講，

她是古典考古學家和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他聽我的描述詳盡，感到津津有味，肩膀無力的鬆垮下來。你不會想錯過古代世界講座的講者康那利。

康那利的《女祭司肖像：古希臘婦女與儀式》(Portrait of a Priestess: Women and Ritual in Ancient Greece)，既是學術著作卻又引人入勝，勇於探索青銅時代晚期到西元第五世紀古希臘婦女的角色。一般認為古希臘婦女在這時期的角色無足輕重，但事實並非如此，她們在宗教領域掌有大權，而宗教在生活中幾乎無所不在。這本書引發我對古典考古學的興趣。我翻出康那利在塞浦路斯外海聖島 (Yeronisos) 考古發掘的故事。一九九〇年以來，她持續在發掘一處阿波羅神廟，康那利相信這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的朝臣所建造。我找不到康那利的個人資料，在社群網的時代，雖然受到公眾注目，但她細心保護個人隱私的作風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維基百科條目甚至不提供她的生日。她把《女祭司肖像》一書獻給四位女性老師，謝辭中對「沒有她們，這本書無法完成」中「她們」的名字毫無提示。然而，這本書生動描寫龐大的學術網絡、祕藏檔案、奇趣勝地，以及她和莉莉·卡希 (Lilly Kahi) 共乘雪鐵龍汽車，奔馳在布拉豐 (Brauron) 和艾雷特里亞 (Eretria) 史詩般的景色中。古代遺跡的絲縷線索，脆弱如陶罐破片和雕刻碎屑，康那利從中梳理出希臘女祭司的歷史。或許望文生義很愚蠢，但我想像她住在一個平靜的神殿中。

紐約大學古典學系主任，以華麗詞藻介紹康那利：她曾就職布林莫爾學院 (Bryn

Mawr)、普林斯頓大學、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 (the Field Museum)，以及設有四個學院以上的英格蘭中部一所小型大學，與牛津大學。系主任也提到，她於一九九六年獲頒麥克阿瑟獎及其他榮譽。康那利面帶微笑走上講台，嬌小而美貌出眾，不僅優於晃進紐約享用免費咖啡、貝果和課程的那些不修邊幅的人，更勝出古典課程上擔任助理的大學生。其他講者還有秀髮似冕的法國佬，講話聽起來像糊塗探長克勞索 (Inspector Clouseau)，繫領結的教授和穿毛線衫套裝的女士，陸續向聽眾宣讀學術論文。同樣是宣讀論文，康那利卻多了一分幹練自信。

康那利的隨身電腦在螢幕上秀出一雙高跟鞋和一把鏟子的圖案，引來聽眾哄堂笑聲。與當天其他演講有所不同，康那利以一張空盪盪的禮堂照片輕鬆開場，她說：「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兩千七百多人每人花五百元加拿大幣，去聽托尼·布萊爾 (Tony Blair) 和克里斯托弗·希欽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辯論宗教是不是良善的力量，希欽斯宣稱：沒有帕德嫩神廟，我活不下去，任何文明人也活不下去……但我對消失的雅典娜崇拜沒有興趣，據我所知，它已無足掛念。」無足掛念？康那利不能苟同。她告訴聽眾，要注意雅典娜崇拜的時期，雅典娜崇拜對帕德嫩神廟和雅典來說很重要。接著，她講解帕德嫩山牆上的雕塑。有人認為，這排雕塑講的並不是君王把女兒獻祭給城邦。康那利以幻燈片顯現一張漂亮的帕德嫩神廟屹立在山丘上，背景是群星照亮的夜空，尤其是被稱為虎尾蘭 (Hyakinthides)

的星座，夏天時會高掛天空，尤其可以在帕台農神廟的東廊上空看見。有人說，它代表艾瑞克修斯 (Erechtheus) 的三個女兒，其中一位被處死，另兩個姊妹跳樓自殺。康那利講述這故事時，使用了帕德嫩神廟的中楣雕飾圖像。她要我們想像希臘姑娘，圍成圈圍跳舞紀念這些姊妹，而高處的古石柱閃著鬼魂微光。康那利強調，不該忽略宗教在此的意義。事實上，美麗如昔的帕德嫩神廟，若沒有宗教也只不過是個死寂的廢墟。

寶物的掠奪者

康那利的演講具有大師氣度，她可以屬於任何時代的學者，尤其她的考古資歷與其他特殊經歷。她是二〇〇八年《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 的紀錄片《印第安那瓊斯與終極探索》重要的訪談專家之一。該紀錄片後來改編成電影《法櫃奇兵》，由哈里遜·福特 (Harrison Ford) 飾演印第安那瓊斯。對於考古學家進入田野面對的風險，康那利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尤其是她領導的塞浦路斯外海的考古發掘。為了登上島嶼，她每天早上都要搭漁船與強烈的海流搏鬥，有一次漁船還卡在大岩礁之間。為了前往遺址，她還曾攀爬二十一公尺的懸崖。¹

比起電影裡的哈里遜·福特，康那利更為沉著、專業。如果遇到蛇，她即使會稍微顫

抖，但馬上會告訴你：產於塞浦路斯的蛇毒，二十五分鐘之內可讓人致命，若要送醫院也至少花半小時。有時她會激動地說：「文物買賣是僅次於毒品和武器的第三大非法交易，每年交易六、七十億美元……如果有人從地下挖起一枚硬幣，本來可以透過這枚硬幣追溯一棟消失的建築物，但你把它挖出來就破壞了歷史的一部分。你以為無關緊要，但麻煩可大了。」

康那利看不慣印第安那瓊斯可議的考古行徑，看不慣他總是把文物從考古的現場帶走。「我相信，如果印第安那瓊斯在二〇〇八年從事考古工作，他會是文化遺產保存的偉大支持者，而且他會站在第一線，加強執法以阻止文物非法交易。」她這樣說真是過於寬容。印第安那瓊斯的電影時空背景，刻意設定在三〇年代，讓考古學家以盜寶者形象出場，也就是《歐洲考古遺產保存公約》、《美洲原住民墓地保存暨歸還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法》，以及一九五四年《武裝衝突中之文化資產保護海牙公約》還沒訂定之前。這些規約都明訂：古代文物和寶藏應留在出土的地主國，已帶出境的文物應歸還。

如果印第安那瓊斯是現代考古學家，他會跪下來標示探坑、刷去塵土、穿著燈籠褲，用鏟子撿拾碎骨和破陶片，然後花幾個小時清洗這些碎片，並到實驗室進行分析。他不可能像電影裡那樣策馬奔馳、穿過考古坑、抓起女孩與黃金，在惡棍面前飛奔而過。印第安那瓊斯的工作是收購，不是科學，他是在奪取寶物。他替大學的博物館收集黃金、珠寶文物、約櫃或聖杯等天價珍品。正如電影《法櫃奇兵》刻畫的角色：考古學教授、專家，以及……該怎麼說呢？是稀有寶物的掠奪者。」

若印第安那瓊斯身處當代，他將被視為盜徒。

康那利為印第安那瓊斯的紀錄片做了什麼？原來，喬治·盧卡斯（George Lukas）是片商，也是她的朋友，康那利相信他會做好這件事。更重要的是，她相信他會讓打劫世界文化遺產要付出代價的信息傳達出去。她提倡考古學研究，也尊重印第安那瓊斯這個角色，同時欣賞這系列電影。這個角色常用來烘托嚴肅的學術作品，例如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在一篇論文〈為什麼印第安那瓊斯比後過程學派（post-processualist）更聰明〉。後過程學派已成為考古學家的難讀怪字，這學派強調考古學家的信念：任何科學工作都是主觀的。該論文寫道：「在電影《聖戰奇兵》的教室場景中，男主角對著崇拜他的學生講課，主題不外乎是考古學的本質，接著說明這門課九五%要在圖書館做功課。除了印第安那和他的助理在圖書館樓下涉入騙局的場景之外，電影中沒有其他情節支持這個說法。之後，教授拋出一句名言：考古學教的是實據，如果你要的是真理，請到隔壁的哲學系！」

我採訪過的考古學家都會提到印第安那瓊斯，通常帶著情感，有如提到一位冒失鬼老哥。不論在哪裡走路，考古學家都模仿他大搖大擺的步伐。格蘭特·吉爾摩告訴我：「這只是好玩，但真的搔到考古學家的內心深處，他們多多少少想成為印第安那瓊斯。」除了印度大頭巾、阿拉伯頭包和棒球帽，印帝（Indy）風格、舊巴巴的帽子，在考古學界到處可見。

考古學系化妝舞會變成印第安那瓊斯大會師，有位女研究生吐露：「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男生都有軟呢帽和鞭子。」

考古學家掀起一股自我振奮的風潮。骨科醫生有出過海報型男嗎？圖書編輯有嗎？有哪個搞口腔衛生的牙醫是很酷的呢？考古學家非常感謝印第安那瓊斯，因此美國考古學學會不僅任命哈里遜·福特為董事，也將第一個考古學班德列公共服務獎（Bandler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 to Archaeology）頒贈給他。福特提供的服務包括幫考古學做廣告，他就是考古業的代言人。頒獎前，美國考古學研究所執行董事承認，考古學受惠於他這個角色：「我數不清有多少考古學家對我說：要不是為看過這系列電影，否則我絕不會成為考古學家。」這一年是二〇〇八年，就在電影系列第四集《印第安那瓊斯：水晶骷髏王國》播映之前。加上水晶骷髏成為美國考古學研究所的《考古學》雜誌當期封面故事（是十九世紀的騙局，詳見該文所述），印帝在謝辭中不僅號召對電影的支持，也表達義重情長的謝意。透過影像直播，羞怯的哈里遜·福特獲頒獎項。有人說：「他是一個好人，他為考古學拍賣了他的鞭子。」

考古學家面對龐雜事情，做法都很務實。他們對這個角色引來的爭議沒有感覺嗎？他們欣然接受好萊塢推廣考古學，即使這個角色是憑空幻想出來的。他們沒有被蒙蔽，他們明白蹲在坑裡梳理古代垃圾碎屑，跟奪取閃亮文物、逃避納粹追殺的劇情天差地遠，跟蚊子雲撩動巨坑裡扭動的蛇，或長得像食人族的原住民也有一段距離。康那利知道，儘管電影有誇張的部分，但考古學家恰好和B級冒險片中的印第安那瓊斯做的事差不多：他們都以超越常人的行徑，追逐過往時代的微光；他們都不斷試煉意志、耐力和機智；他們都在馴化和格式化的生活之外，而是在奇風異俗、果敢與真實中生活。

把過去召喚到眼前

炎熱的夏日午後，康那利帶我密訪探險者俱樂部。俱樂部在曼哈頓的國際總部是棟奢華的建築物，也是冒險家生活紀念碑，夢幻地嵌入上東區一處平整街坊。幾個世代的登山客、潛水員、太空人、探險家，當然還有考古學家，在服務櫃台卸下裝備，穿過十九世紀的房屋隔間。俱樂部直到一九八一年才開始收女性會員。康那利於一九九〇年加入探險者俱樂部，在普林斯頓大學俱樂部分部收女性會員時成為三級會員。

「這間會員大廳本來是個巨大老舊、沾滿塵土、內裝擺設都是道地原件。」康那利邊說邊從吧台裡拿出酒杯，從保冷袋倒出低卡冰茶，「後來他們決定翻修，現在看到的是瑞夫·勞倫（Ralph Lauren）設計的探險家俱樂部吧台。」對我來說，俱樂部看起來很真實，獨角鯨的長角擱放在橫梁上，隔壁房間的壁爐搭配象牙架框飾，我從來沒有看過野生

獨角鯨。我們用完茶點，離開吧台爬上搖搖欲墜的木質台階。檔案、地圖室和紀念品陳列室，環繞中央樓梯的兩側，冒險家的照片像托爾·海爾達（Thor Heyerdahl）、巴茲·奧德林（Buzz Aldrin）、歐尼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倫侯·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老馬林·帕金斯（old Marlin Perkins）、荒野秀的吉姆·福勒（Jim Fowler）和西爾維亞·厄爾（Sylvia Earle），所有偉大的水底探險家都俯瞰著我們。康那利指出，理查·維澤（Richard Wiese）是ABC電視台冒險秀《就是要探險》（*Born to Explore*）的主持人。他探索世界各地，到北極滑雪、捕捉美洲虎、和侏儒同住，也到聖島參與過考古發掘。他曾公開表示，康那利是「我追隨過最好的探險隊長。」

我們依依不捨離開名人牆，往樓上走。康那利帶我到一個房間：「一九九〇年代，單身探險家常在星期天早晨來這裡見面，我們會一起做煎餅早餐，然後瞎混。這些傢伙真有趣！」接著我們來到優雅的宴會廳，走到寬敞露台。她說：「以前我每年都在這裡舉辦聖島考古發掘的募款活動，但後來他們開始收數千美元的場租。這類型的俱樂部都有同樣問題，靠他們服務的對象來供養是負擔不起的。隨著觀念和習俗改變，在牆上掛動物標本已經不合現代價值觀了……」時代已然變遷，但探險家仍然緊抱他們的紀念品陳列室和陳列內容。他們維持俱樂部「作為創辦人的聖殿，尤其是向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致敬。」康

那利每次回國都會擔心寶物消失或被換掉：「美洲虎、獅子和鯨魚鞭還在嗎？」

動物頭標本掛滿紀念品陳列室的牆壁，也掛在深長的窗台。獅子、山貓、瞪羚，這些是有關探險家的舊電影留下的小道具，她開玩笑說：「這就是所謂的親熱沙發。」但是鯨魚鞭跑哪去了？我們翻遍整個房間，以為這最奇怪的紀念品正像渡渡鳥那樣滅絕了，康那利找到了，就固定在窗口的木座上。鯨魚鞭堅硬如石，白蟻在尖細的頂端築巢，大約四英尺高。這是一個宏偉的標本，真想在自然史博物館看到這類東西，但他們幾乎不這麼做了。康那利站在鯨魚鞭旁邊，我用手機幫她拍照。我們站在鯨魚器官旁開心微笑，這是我們獵獲的紀念品。

下樓到象牙襯邊的壁爐旁，康那利掏出隨身電腦和文件，她打算教我地層學，協助我以圖像理解土石層化的過程。她還拿出塑膠材質的薑汁啤酒瓶，堅固、重量輕，用來灌滿夏日的氣泡白葡萄酒。她搭地鐵來到上城區的俱樂部，因為擔心玻璃酒瓶撞破，所以換了塑膠瓶。她把酒倒進杯子裡，一切細節，探險隊領隊都考慮到了。

康那利在俄亥俄州托萊多（Toledo）修道院接受養成教育，每週六與她心愛的愛爾蘭裔父親共度。上午他會帶她去藝術博物館上畫圖課，有時也會上騎馬課，接著參觀她父親的營造工地。他教她如何使用測量工具、跟工人講話、讓營造案順利運行。她的雙軌教育使她無論是在博物館或木料場都很自在。她講的希臘話帶有工人口音，是在尼米亞（Nemea）進

行發掘時學到的。她的老師多蘿西·伯爾·湯普森 (Dorothy Burr Thompson) 兼顧事業和家庭，而康那利未婚沒小孩，自己也感到意外。在湯普森七十四歲時他們相遇，康那利若有所思地說：「你覺得在這樣的年紀相遇，你還有多久的時間可以跟她相處？但他活到一百零一歲。二十七年來，我浸淫在她的智慧和經驗中。」在完成下一本關於帕德嫩神廟的書之後，他希望有一天寫出湯普森的故事。

服務生通知十分鐘後俱樂部要打烊了，但那時我們正談得起勁。康那利透露：「以前有些人會給服務生五十或一百元，要他別關門。他會肯的！」托爾·海爾達爾 (Thor Heyerdahl) 和埃德蒙·希拉里爵士 (Sir Edmund Hillary) 經營這些俱樂部時，她躬逢其盛。她告訴我，一九八〇年代她曾經獨自一人前往埃及、敘利亞、約旦、土耳其和科威特，住在尚未翻修的古老飯店，與這些房子的輝煌過去心靈交會。作為一名考古學家，康那利不只是鑒賞過往，在一個有象牙裝飾壁爐的房間裡，她用慧眼把過去召喚到我們眼前。

1 康那利也以專家身分，出現在歷史頻道《星際大戰：現代神話》(Star Wars: The Legacy Revealed)，以及Nova和公共電視(PBS)頻道的《帕德嫩神廟探秘》(Secrets of the Parthenon)。

重返田野班 ——跟土地說悄悄話

第一次聽康那利演講時，我想像自己彷彿在一個涼爽又井然有序的聖所。康那利住在紐約大學宿舍，一旦退休，房子就要還給學校，她說：「到時候他們會要我搬走。我是該找地方買房子了，但一直沒有行動。」她在學校還有辦公室，寬廣的窗子將華盛頓廣場拱門盡收眼底，這個結合會議與置物用途的空間，簡直是她在紐約市的封地。她心繫的是塞浦路斯西岸外海的聖島，像一張在地中海高高抬起的長桌，有三個足球場那麼長。二十三年來，康那利在紐約大學團隊的協助下，發掘一個又一個考古探溝。慢慢拼湊出引人入勝的故事：當年開發聖島是為了榮耀凱薩里昂 (Caesarian) —— 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 (Cleopatra VII) 和凱薩的兒子—— 克麗奧佩脫拉寄望這嫡系繼承人統一埃及和羅馬，東方與西方兩大帝國。

在紐約大學的會議室中，康那利替聖島打造一座神殿，由二十三張歷年發掘紀錄的照片巧妙組成一面牆，可以看到鋼琴突兀的放在峭壁旁，考古隊成員圍繞著它拍照，鏡頭中的聖

島在背後閃閃發亮。這些考古隊成員包括盛裝的學生，也有知名的考古學者或是著名人物，比如曬得黝黑、咧著嘴笑的比爾·莫瑞（Bill Murray），或是聽說考古很有趣的有錢人，願意用一萬美元捐款換取一個禮拜的考古田野體驗。

酌量捐了一筆錢後我加入發掘團隊，別人幾個月才能歷經的體驗，我立志要全部壓縮在這幾週內完成。康那利堅持造訪聖島上的人都必須會游泳，她打算要參與者沉入島外海水中，執行她最愛的考古計劃。我記得她還提到，成員必須爬上二十一公尺的峭壁。我要怎樣訓練自己能爬那麼高呢？除了游泳課，我還報名攀岩課，但是第二次我從練習牆摔下之後，教練就宣告放棄，把報名費退還給我。游泳課的情況好些，我至少成功的從游泳池這頭游到那頭。

前往塞普路斯的前一天，我收到康那利的電子郵件，為一年一度的發掘團隊派對，她決定用砂模蠟燭來裝飾山坡及庭園，但是在島上找不到裝蠟燭的紙袋，她請我盡可能幫忙帶些裝午餐的牛皮紙袋。我想辦法在行李中塞進一百個紙袋，在倫敦轉機的空檔，我拉著行李參觀大英博物館。在抵達賽普勒斯之前，這些牛皮紙袋已經在帕德嫩神廟埃爾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面前浸沐靈光。

聖島在聖喬治（Agios Georgios）小鎮不遠的海面上閃閃發亮，看起來離岸不過幾百碼，好似可以輕易游過。每天黎明時分，我們在小鎮港邊集合，登上尼美西斯號（Nemesis），船主范倫鐵諾是位俊俏的討海人。我們擠在甲板層，穿著鮮亮的救生衣緊挨在一起，康那利和兩個考古古作夥伴理查·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和保羅·克洛夫特（Paul Croft），以及一位研究生、十位大學生、一個本地雇工亞尼，再加上一個來亂的（我本人）。我們好像一群奇怪的橙色鳥被趕進地中海。擺在面前的究竟是和緩的海浪，只會讓體弱的人反胃，還是會碰到驚濤駭浪？我還是先別亂猜。

前往聖島的第一天，波浪並不平靜。漁船繞到島的南側，這看似很短的距離，卻花了將近半小時。我感覺自己臉色發青。康那利的研究生助理塔尼雅，教我一個好方法：視線固定在定點，隨著浪湧的節奏呼吸。接著我們換上小艇，耐心地等待上岸，漁船在水中上下擺動，范倫鐵諾拉著繩索協助登陸。整個過程又耗了一小時，非常磨人。范倫鐵諾叮著菸，一邊穩住小艇，一邊發號司令，克洛夫特、安德森和亞尼排成人鍊，帶著我們從搖晃的小艇跨過用輪胎跟木板搭成的簡易碼頭，踏進滿是巨石的岸邊。

我們安全上岸後，有經驗的成員排成另一組人鍊，接過范倫鐵諾傳遞的背包、裝備、裝袋早餐，以及水罐（島嶼上沒有淡水）。我們把救生衣堆放在一處峭壁腳下，成一列縱隊開始攀爬，踏上破碎崩垮的古老階梯——居然有階梯！——來到島嶼頂端，眼前隆起的平地有岩石和廢墟，海鷗在天上盤旋，大海環繞四周。到達峭壁頂端，入眼的是兩座以石頭做地基，有著開放的牆面，用木頭搭建的小屋。這些哈里菲（Khafis），公元六世紀以來就是為來

訪者準備的小屋，讓我們的營地既得到蔭蔽更增添景緻。海鷗在上頭迴旋，尖聲叫著，我們坐在較大哈里菲的石椅上，聽取我們的探溝發掘程序與工作指派。隔著海峽，看見聖喬治鎮上的教堂，在晨光下閃爍著拜占庭文化瑰麗的光芒。

聖島考古計劃展開之初的那兩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一年，康那利探索島上的植物系與動物系，評估島嶼的生態樣貌，盡量減少開挖以免破壞環境。「生態學家夥伴認為應該採用土色系的裝備與衣服，這樣才不會驚擾鳥類。」康那利說：「如果你有注意到，我們的鑿具只有土色跟海洋色，而不是紅色和橙色。」她回想之前在馬丘比丘，俯瞰著嘆為觀止的群山和遺址。「下雨的時候，忽然出現形形色色的塑膠雨衣。太討厭了！」康那利把生態學家提出的親鳥建議，整合到她對此地的願景，她說：「我們來得早，考古活動期也短，這樣不會干擾鳥類築巢。你看，哈里菲就不用醜陋的金屬浪板搭蓋，而是柴木覆蓋乾草的小屋。」

進入古典學系之前，康那利曾經是藝術史學系的一員，因此她主持發掘的同時，也重視藝術層面。她發下來的田野筆記本是由某位利馬索爾（Limasol）的小老頭用人工裝訂，手繪有已出土文物的插圖，她說：「有些考古隊會發給每人一台PDA，但島上沒有電源。我們使用探溝手冊，放在防水袋子裡晃前晃後。記述文字在左頁，探溝數量、日期、監督者姓名縮寫、天氣、所有工作人員姓名縮寫、照片欄位、探溝速寫、用紅筆寫下發掘物件。」她用古典的方法處理古典的發掘。為了能輕步行進，康那利穿的衣服都是土色系：米色亞麻襯衫，舒適的綠色鞋帶與帆布鞋。（為了不驚動鳥類，我們沒有人穿紅色或橙色。）她對每件事都兼顧美學原理。有一天，為了補強樓梯旁的水泥牆，亞尼補上很多水泥。這樣做雖然有效，但是在康那利眼中卻不夠好。第二天，亞尼在牆上重新塗上水泥，更為精細美觀。

做土地的私語人

聖島在五千八百年前首次有人類活動，之後遭棄置。公元前一世紀幾十年間的古希臘時代，聖島遭短暫占領，大量的財富傾注在這個島嶼，這是引起康那利興趣的歷史時段。有個精巧的水池用於集水，數棟用當地石灰岩砌成的建築。一個露天建造的圓形場地，填滿好幾噸費盡心力從海裡挖出的積泥。他們推測，這是獻給阿波羅的舞池。康那利的團隊發現為數不少的護身符，和許多小杯子、小型碗、過濾器 and 書寫板。他們揣想，聖島似乎是一個裝備完善的古代男塾，源於某人的巨額財富、野心，而且是象徵盛景的獻禮。

康那利說：「好的考古學填補了歷史空白，訴說失敗者的故事，把掉落在隙縫中的歷史撿拾出來。」她認為，這個遺址述說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和她的兒子托勒密十五世，稱號凱薩里昂，這兩位歷史上偉大的失敗者的故事。來往於埃及亞歷山卓和希臘羅得島之間的旅客，

眺望外海，就看見聖島。從埃及到君士坦丁堡的貿易航線，它是一個方便的停靠站，也非常靠近帕福斯（Paphos），傳說中維納斯女神的發源地，凱薩皇帝深信維納斯是他的祖先。這裡是為羅馬皇帝和埃及女王後代建造阿波羅神殿的理想地點。康那利和她的團隊發現，克麗奧佩脫拉和凱薩里昂聯合統治時期鑄造的銅錢，埃及文物也隨之出土。此外，聖島上的建築群是採用埃及的尺寸單位，年代也符合。她問：「除了埃及艷后還有誰具備這樣的實力與資源呢？」

公元前三十年，康那利稱為歷史發展的轉捩點：亞克興（Actium）戰役之後，克麗奧佩脫拉和馬克·安東尼（Marc Antony）死亡，財貨就不再流到聖島。公元前十五年，一場地震使島嶼只剩一片廢墟。在第四世紀，一連串的大地震襲擊使周邊懸崖崩塌。後來一支重要的基督教組織在島上成立，不久之後又再次淪為廢墟。一九八〇年，聖島一度成為賭場經營者的目標，但現在主管塞浦路斯文物、當時的古代文物部考古官員索佛克里斯·海吉瑟維斯（Sophocles Hadjisavvas），認為此地存在古代文明，於是和塞浦路斯當局阻止賭場在聖島開發。康那利曾和海吉瑟維斯在帕福斯附近一起參與考古發掘，她從他那裡得知聖島的訊息，也因此讓她找到可以堅持考古工作的地點。每年她必須對塞浦路斯的古代文物部提報實際進度，藉以更新她的工作許可證。

康那利為了聖島願意做任何事。她的發掘團隊一週工作六天，她還提供外部團體四個講座，包括歐聯，主題是考古遺址發掘與社區的生態合作。她每年舉辦派對感謝百來位當地居民，並招待眾多賓客，包括《探索生命》影集的主持人維澤和他的攝影團隊，還有她的姪子在內的四位高中生，當然也有我。她在人手短缺的情形下完成所有事，兩位研究生助理因為家庭因素被召回家。康那利剛剛慶祝她五十八歲生日，雖然歲月沒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跡。她保持運動員般的身材，但是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不會相信她擁有這麼旺盛的精神。每天，這位女士就像把自己拋出懸崖，咬著工具游過滔滔海浪，然後披上精美漂亮的套裝，在社交圈迷倒眾生。她睡得很少。睡覺？她的腎上腺素還在分泌呢。

第一天，當我跪在被指派的探溝旁，康那利湊近向我示範發掘的技術和方法，近到可以看到她臉上薄薄一層粉底，向著網絡攝像機點頭。「先挖過兩公分，然後回過頭再來。」她指揮著：「做法是，你每次都先移除最上面的沉積層，再看看。如果你看到一些藍綠色的，那可能是銅，經年氧化後的模樣。看到光彩色嗎？這可能是玻璃。我們在這裡已經發現為數不少的古代玻璃。」她望著我，確認我有跟上：「如果我看到新的斷面，你的麻煩就大了。挖出來的陶片邊緣應該是很髒的。」她的話被以為找到硬幣的大學生打斷，但康那利明白那只是碎裂的海床基石，她跟學生說明：「尺寸的確符合，但是重量不對。有疑問的時候，儘管問。」她說完便送他回到自己的探溝。

「我們每年回填大部分的坑。」她告訴我，他們小心翼翼把挖起來的土重新覆蓋回去，

是為了保護挖開的牆根和其他遺跡。「到了田野班季末的時候，這些土壤都會被替換。我心裡總有個想法：我看過你，毛毛的藍色土壤！我看過你，紫色土壤！」我正在想毛茸茸的藍色土是什麼模樣，這時康那利卻像在念詩句：「考古學家應做土地私語人。」

我和我的學生合作對這塊乾裂土地研究，我們用手當鎬鬆開表土，然後拿起小鏟輕剝泥土，放亮眼盯著可能發現的任何東西，陶片碎屑、閃耀的玻璃、土蝸牛（我們也替某個科學家收集土蝸牛）。每個探溝有數個塑膠袋，用來分類大家的發現。跟著無袖上衣的隊友比起來，他們在地中海烈日下工作很起勁，而我卻臉色脹紅，頭髮散亂，是動作最慢的人。當天下午，康那利檢查我挖出的成果。「這是陶片，是屋瓦的一部分，」她告訴我：「這是銅石並用時代（Chalcolithic）的碎片。我的學生稱之為銅石並用時代的餅乾。太棒了！」其他挖到的都是石頭。

每天下午，我們重覆登船、上岸的動作，轉到聖島對岸峭壁上的庫房，這是個別緻的總部，是個大倉庫和數個辦公室，前庭搭建爬著葡萄藤的棚架。這裡用來清洗和登錄文物，供應豐盛的午餐，康那利講解陶器的知識，或是訪客分享他的論文研究。學生到地中海小游一番，或是在傍晚的熱氣下跑步，雖然康那利感到憂心：「弄到脫水的話要三天才能恢復！」

晚上八點，我們聚集在離庫房半英里的一間餐廳露台上，吃薯條和塞普路斯菜，有含豬肉片的，也有番茄醬義大利麵（很受歡迎的菜色），還有糊狀的生菜沙拉。抱怨食物會惹毛

康那利，這就是塞浦路斯的食物，她在塞浦路斯的時候……吃這些食物已經超過二十年了。不過醫生要她進行低碳水化合物飲食，於是她的盤子只有簡單的烤雞肉和蒸過的新鮮蔬菜，有人指著她的盤子說：「我可以吃這個嗎？」她會擺出不耐煩的表情。她想要談論的是發掘工作、是塞浦路斯、是歐盟，她想要談論兩天後保羅的生日要怎麼慶祝，她也會談論靈魂，只要不是為了菜色傷腦筋的話題，不管是她的菜還是我們的菜。

一天晚上，我用餐巾裹住一塊麵包，放入包包中。早上我們出發的時候，商店都還沒有開門營業，而我的營養棒已經吃完了。「你偷藏麵包喔？」康那利問道。人賊俱獲！我笑著對她說：「我現在不吃麵包，晚點才吃。」結果吃麵包的時機也錯過了。（雖然我希望可以獨自用餐，結果每天晚上我都被康那利邀請去跟團隊共進晚餐。）我因為藏了一塊麵包而感到懊悔。作家常挨餓，考古學家更常餓肚子。捉襟見肘讓他們常處於飢餓狀態。現在是講求快速的年代，但考古學家的動作實在太慢了。我常常看到勤奮的考古學家對自己有多麼寒酸，卻願意耗費很多時間在工作。例如，可口可樂希臘裝瓶公司贊助聖島考古團隊汽水和瓶裝水，有一次他們到了餐廳才發現忘記帶當晚的飲料，康那利只好派人回去拿。她跟餐廳商量不含飲料的晚餐價格，「這裡省兩歐元，那邊省五歐元，我們的預算實在很緊繃，還花錢在飲料上的話，就太揮霍了。」

康那利慶祝同事保羅生日的方式很有創意，她跟餐廳訂購邦特模蛋糕（Bundt Cake），

並指示廚師在裡面塞滿榛果巧克力醬。精巧烘培的蛋糕，放在緊貼著蛋糕的塑膠容器，在黎明之前送達，大家輪流傳遞，通過兩艘船，越過巨石，走上搖搖欲墜的階梯，點綴在上面的不是蠟燭，而是雞尾酒小旗標，早餐後在歡樂聲中切開蛋糕。

克洛夫特是劍橋大學派來的考古學家，他粗壯、頭戴阿拉伯頭巾，穿著拉斯維加斯的T恤，在康那利眼中，他是凡事做到圓滿的人。我問他，喜歡拉斯維加斯嗎？他嚇一跳。我指著他的T恤，他拉拉衣服說：「你說這個嗎？這是在二手店買的。」我當然知道，這個在塞普路斯一無所有的男人，不可能在拉斯維加斯鬼混。若是挖出一面牆，他就會說：「現在我們有責任保護它。」接著，他會把泥土和稻草混一混，小心翼翼的抹上這面牆。他不但修復古階梯，還搭建臨時的登岸平台。他們所做的事，都是依循近年來多數考古學家的信念，每個掘坑會有一部分完封不動，留給將來願意承繼他們的工作，而且帶來更卓越的知識、更進步的工具，甚至有更豐厚經費的人。

華麗的廢墟

什麼原因讓這個古典的考古發掘，與加勒比海甘蔗園的發掘不同？原因之一是，康那利在指導我們發掘時會像提到老朋友那樣，聊起阿波羅、埃及艷后和荷馬。上船駛離島嶼的

時候，范倫鐵諾會帶學生唱滑稽的希臘歌，聽起來像「Emenamelenepagotoi」（我的名字叫做冰淇淋）。當我們擠在船尾的時候，康那利的研究生助教塔尼雅，跟我們說斯巴達國王梅聶勞斯（Menelaus）拖著海倫的頭髮的故事。我們聽得很著迷。有人問：「你有沒有把它寫下來？」塔尼雅承認，她以這個為主題寫了一篇論文，標題是〈美女變擄女〉（From Beauty to Booby），大家聽後一陣笑鬧。主修戲劇的佩琪說：「我可以教你們舞台上怎麼拖人頭髮。」當我們下船脫下救生衣，她拉著身邊一名年輕女子示範。「看到了嗎？我握著頭髮，然後你抓我的衣領，然後我會轉身尖叫：不，不要！」

為了籌備派對，週六下午的庫房非常熱鬧，十位身型健美、曬成黃褐色的紐約大學學生，忙著掛上戶外燈並裝飾灌木叢，把我帶來的牛皮紙午餐袋搭配蠟燭和沙子，變成一盞盞燈籠。學生為這五個禮拜支付可觀的費用²，就如其他田野班的學生一樣，流汗和受苦、搬運泥桶、用舊牙刷清理破陶片，都是預料的事。但這些學生也被要求，為塞普路斯當地社區舉辦派對，並參與演出。他們在庭院中裝飾灌木叢、掛上燈、點亮紙燈籠，然後練習地方民俗舞蹈和當地的希臘歌曲。但我們的老師無法抗拒平靜的大海和陽光燦爛的日子，想要抓住機會再到聖島考古。老師突然的提議，打斷了派對的準備工作，學員都希望留下來，與當地人一同慶祝塞普路斯的過去和現在。不久，上百人很快就來參加派對了，但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環顧四周，看到還沒有清掃過的庭院，便隨手抓起掃帚掃地。沒有什麼比投入康那利

的團隊更能讓我快樂，而掃地就是我能做的。

康那利指揮著說：「我們現在排一下拍照位置。」我們成群結隊來到擺放鋼琴的平台。這是過去殖民時代設置的平台，然而我們跟殖民民主義不一樣，我們進行考古計劃並舉辦派對。康那利站在相機腳架旁指揮大家站好位置，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同學被指派擔任受傷的戰士，手撐著頭躺平在最前面。塔尼雅坐在躺椅上，康那利的同事保羅·克洛夫特和理查德·安德森站在鋼琴旁邊，康那利的侄子和負責教大家舞步的十二歲本地少年安德烈亞斯，則蹲在板凳旁邊。我和兩個探溝隊友站在一起，聖島就在我的左肩方向。等會兒我們穿上派對禮服，就要回到排定的位置正式拍照。

大家分散到兩棟租來的宿舍開始打扮，接著回去完成合影。康那利教我們如何在二十分鐘之內，從髒兮兮的挖坑裡出來迅速完成梳洗換裝，最後在派對上閃亮出場。她欣喜若狂地說：「極端！我喜歡走極端。」我們脫掉靴子換上高跟鞋，她又說：「我最討厭之味的折衷心態！」

建築師安德森因工作造成永久性曬傷，他博學多聞，任何話題都可以暢所欲言，特別是拜占庭式的教堂、牆壁、遺跡，他已經換上輕鬆活潑的格子外套，看似天生就為了接待川流不息的客人；塞浦路斯的有錢居民，美國大使和他的家人、男爵夫人貝蒂·布思羅德（Betty Boothroyd，英國下議院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議長）、漁夫范倫鐵諾、按摩師，與一位能從咖

啡渣解讀未來的當地老婦，還有留著鬍渣、曬得黝黑的美國廣播電視公司（ABC）攝影記者，與一些僧侶。康那利穿著淺桃色絲綢洋裝，踏著令人眩暈的高跟鞋，周旋在庭院各處歡迎來賓。一切都在柔和的夜空中顯得炫麗，藤架上方看到海面閃爍的補龍蝦燈，背後是聖島，那華麗的廢墟。

我跟一位長著鬍子、身穿黑色長袍的僧侶聊天，他教我怎麼用手拿火烤哈魯米（haloumi）起司。康那利走過來，說：「你們這些僧侶最棒！」學生們的改變讓人印象深刻，不再是骯髒的發掘者而是乾淨又親切的美國東道主，臉上掛著微笑，笑聲貫穿他們高亢的民俗舞蹈。稍後康那利與一位客人跳舞，熟練地旋轉著高跟鞋腳跟，揮起手臂，彈著手指。我記得她說過在某個寒夜，自己曾穿著義大利皮靴，摔倒在紐約上東區的結冰上，扭傷了腳踝。那一年，她努力做物理治療：「我不想變成一癱一拐的聖島老太太！」

我在庫房後面換上球鞋離開，走在午夜黑暗的道路，靠著小手電筒輔助，回到住處，聽說派對持續好幾個小時。接下來的星期天，我們大部分人都放假休息，但康那利和她的侄子花了一整天，與布思羅德和一些當地名人乘船在海上巡遊，而我與塔妮雅去地中海游泳。

我的考古隊友是聰明的學生，大方有雅量，也是漫長而炎熱中工作的好同伴。他們喜歡玩猜謎遊戲，起頭的人心裡先想著一個大家都認識的人名，其他人提出各樣問題：若X是某種體格，那麼是什麼體格？接著再問，如果X是某種椅子、某種音樂風格、某種考古工

具等等問題。他們的文字遊戲逗樂了我。如果提出的問題是奶酪，有人回答他是假奶酪；如果問題是咖啡，回答是即溶咖啡。他們立刻猜到所指的是那一個人。但是他們被另一個題目難住了，有人問：「如果他是喬治·馬歇爾·彼得斯（George Marshall Peters）的成就，那麼他的成就是什麼呢？」大家都笑起來，我以為他們指的是一位探險家，其實不是。看來彼得斯當學生時曾經參與考古發掘，其成就已成昨日傳奇。他無所不能，不管是發現重要文物，還是用出色的插畫來圖解文物，他甚至裝飾發掘休息屋。

不到一小時，我們休息吃早餐，康那利有如聽到猜謎遊戲般，也提到彼得斯，一下子打住學生們的笑聲。她說：彼得斯多年前捐給發掘隊的小霧笛，今天被人偷走了。小霧笛是用來通知在聖島的我們休息、日課結束，或臨時急事。

我們可不是玩玩而已

我們在聖島並非與世隔絕。每天下午，我們會聽到遊覽船停靠在附近。《把我的愛都留給你》的歌聲清晰可聞，有時候還會看到仿古海盜船徐徐駛來。還有在發掘點的另一邊出現岩石堆疊，拼出俄文的「我愛你」字樣，明顯是現代的入侵。聖島是塞浦路斯的文化古蹟，並沒有立法限制人們靠近。但是，這也是塊脆弱的土地，就算趁著派對順便舉辦聖島之旅也

理所當然，我們不敢冒進，尤其擔心岩石堆成的登陸碼頭無法負荷。長遠而言，康那利想要恢復阿波羅的圓形舞池，讓安德烈亞斯和當地男孩可以在這裡表演跳舞。雖然這只是一個夢想，卻是遙遠而不確定的未來最幸福的可能。現在，失蹤的霧笛是島上發掘歷史上的第一宗竊案。

康那利坐在范倫鐵諾的小艇上，沉思塞浦路斯的改變：混凝土建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住宅區，以及笨重的發電機持續供應電力給美麗海岸沿線的小吃店，她說：「這次我到雅典的新衛城博物館舉辦演說，主題是建立夥伴關係的生態考古學：塞浦路斯聖島的經驗教訓。我在演說開頭，陳述如何以研究花卉物種和鳥類的數量開始，並展示當時用直升機空拍整個區域，多達一千九百九十二張空照圖。每個人看到尾聲都發出驚嘆聲。我向聽眾表示：不過我今年重返這裡，當我指出這些可怕的發展時，聽眾倒吸一口氣。這實在令人震驚。在一年內，這裡的特色被破壞了。糟糕的事物在一年內滲透蔓延，一切都被摧毀了。」

我站在探溝槽，傾倒獨輪車裡幾桶泥土，一對夫婦穿著夾腳拖鞋和浴袍出現在階梯上，並走入考古區。康那利匆匆走下去，跟他們談了一陣子，然後他們徘徊在採石場邊緣，那是一個巨大的洞窟，隔開發掘坑和位於東邊懸崖的哈里菲，那裡有海鷗築巢，還有我們躲起來上廁所的地方（考古學家猜測，那裡是聖島早期人們開採石灰石，叫做「Erat」的泥灰岩白黏土的地方。）他們要幹嘛？女人站在上面，而她的朋友爬了下來，一會兒他們走下階梯，

在船引擎嘎嘎作響的發動聲中離開。他們離開後，康那利問道：「什麼是地理寶藏？」我試圖就我知道的來解釋：地理寶藏是某個網站經營的尋寶遊戲，藏匿物和線索藏在現實世界中，參加者要用GPS找到它們。康那利說，確實有個裝有線索的塑膠容器藏在的採石場底下，那就是這對夫妻要找的。她想要把它從聖島移除。我擔心，如果它的坐標被列在網站上，人們還會來這裡尋寶，無論採石場底下到底有沒有這東西。我答應康那利，我會找到那個網站並發送抗議信息。我並不反對這項運動，在我看來這是個探索世界的好方法，但地理寶藏不應該放在考古場址。（幾星期後，藏寶網站回應我，並把座標移除了。）

康那利厭惡這項運動。她討厭假探險家、做作的冒險、虛擬的遊戲，她說：「有這麼多真正的探險，真正的投入，有這麼多工作要做！這些人不過是在玩弄探險。」她的團隊和地理寶藏隊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她熱血沸騰的說：「我們可不是玩玩而已！」

康那利觀察我們的發掘技巧時，我正在土坑中和她侄子並肩工作。我們都得到她的讚許，雖然我不是用考古的典型蹲姿，而是坐在兒童發泡浮具上讓膝蓋好過些。我把自己包起來隔絕環境，用沾濕的大方巾圍著嘴巴和鼻子，以免吸入揚起的塵土。首先，我有節奏地用鶴嘴鎬削出探溝裡屬於我的區域（兩公分寬的隘口），然後用小平鏟刮過，再把碎屑掃起來進一步檢查。我鑿著凸起來的部分，找出它的輪廓，並保持表面和邊緣完整。她告訴過我們：「這是你的工作區，也是你的研究室。請保持清潔！」她的侄子正帥氣地幹活，刷著他

發現的雙耳罐的頂部。康那利轉向我，看到一件陶器有新裂痕，毫無疑問是我的工具造成的。當時我真想躲進採石場，羞恥的蜷縮起來。

我問康那利，她的團隊幾年前發現的女性骨骸，她喜形於色地告訴我們：「那是個女人沒錯，在現今阿波羅舞池不遠的地方發現。年代大約是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紀，聖島到現在都沒有挖到那個時代的文物，所以聖島在那個時代還是一個廢墟。她面朝東方埋葬，顯然是位基督徒。她的飲食反映優渥背景——主要是蛋白質——她雙手置於腰間，看似抱著什麼東西。她五十幾歲的年齡在那個的年代算是非常高齡。她是早期的基督教聖女或隱士？有可能。公元四世紀之前，教會並沒有限制女性擔任長老、執事和祭司。她的肩膀被束得高高的，你像是為什麼呢？」我想不到為什麼，連我的想像力也被考倒了。

「是因為裹屍布。」康那利說出答案。這時她指著阿波羅舞池，部分的牆壁顯露出歷史遺跡的特殊美感，然後低下頭看著她的侄子，「當我死了，我想被埋葬在她被發現的地方。」她說：「如果這太難達成的話，也許我的心臟可以被埋葬在這裡。」我無法看清她被帆布帽遮住的臉，而她身後有一道光，她稱為側光，在探溝周邊投下影跡。

不久之後，我再提起她想要在聖島的感人想法，康那利又化身伶俐的科學家，自嘲那短暫浪漫的衝動。塞浦路斯的文物部當然會有意見，更不用說這個國家的法律不可能允許。她是當地村莊的榮譽市民，但並未有任何特權，幫她安排的親人大概會惹上麻煩吧？說真

的，我也不用太當真！

有一天，我伴隨來訪聖島的高中生進行導覽，康那利領他們來到阿波羅舞池以及朝聖者葬身地，她躺下來擺出那女人入殮時的姿勢。她的眼睛閉上，肩膀彷彿被裹住般聳了起來，一動也不動的靜靜躺在那裡。學生們和我愣在那裡驚訝看著她，海鷗在頭上盤旋呼嘯尖叫著。她的話語再度迴盪在我耳邊：「我們可不是玩玩而已！」

康那利對聖島歷代宗教非常敏銳，她曾論定，女性在古希臘宗教中的影響力。在與身型魁偉、蓄黑鬍、有深邃知識的東正教神父尼爾菲多斯（Neophytos），幾回冗長且充滿哲學思辨的對話中，她撫慰了我的靈性。「可能因為我是天主教徒，東正教教會以及他們對靈魂的見解太令我著迷，」她說：「我知道在島上的一些朋友對教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每年的考古行程中，她都規劃一天神職人員的感恩日。因為當地教區的協助，連結聖島與太陽神阿波羅的古文件，才得以出土讓後人看見。為了慶祝二〇〇〇年的除夕，康那利決定要到一個超過千年歷史的地方。「當時我並不确定要怎麼安排，但我覺得，一五九九年已經蓋好的聖尼爾菲多斯（St. Neophytos）修道院，是最接近我理想的選擇。她飛到塞浦路斯這座嵌在帕福斯山壁上的修道院，與十位僧侶以及他們的院長共度除夕。她參與儀式、頌歌、談論靈性的生活，然後從陽台上觀看煙火，共飲法國香檳。「我們一起看電影《星際大戰》，看到尤達大師教誨的片段，神父尼爾菲多斯向我們說明，尤達的話其實源於第四世紀埃及沙

漠神父的教誨！」

我被她描述的情節深深吸引，我可以想像這一位探險家、朝聖之路的行者，在約翰甘迺迪機場的離境廳等候著。我也好奇，當她的島嶼墮罩在新年的薄霧中，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發掘季結束後，我返回紐約才發現塞浦路斯那段時光，讓我有資格加入聖島之友俱樂部。康那利與我相約在紐約大學附近，她穿著低跟步行靴，戴著抗噪耳機阻擋這城市的喧囂。我們大聲笑著，閒聊考古和出版物的話題。從發掘隊回到城市的學生，不但每個都變成成熟的大人，也明顯長高了。怎麼會這樣呢？也許是在塞浦路斯時，我們總是蹲俯在探溝中。

我與康那利到俄亥俄州參加文化遺產研討會，去聽她另一系列講座，是有關非法獲取文物的國際貿易，如何危害社區、文化和人類的知識庫。她愉快的語氣帶著些微狂妄，既吸引人又具說服力。例如，放置在大英博物館的埃爾金大理石作品，和它們在雅典衛城的原雕刻主體是分離的，在康那利眼裡，簡直荒謬至極。她說：「現在的情形是，海神波塞登（Poseidon）的肩膀在倫敦，但是他的六塊肌卻在雅典。」聽眾對她報以激賞的笑聲。她在投影螢幕上秀出一張衛城的夜間照片，看起來如同一個小島漂浮在雅典上方，一片光芒在紫色的海上閃爍。我猛然意會，似乎看過同樣的情景。那是一張我在日出前拍攝、聖島自地中海

升起的照片。我想到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不是印第安那瓊斯的冒險系列，而是更神祕的《第三類接觸》。在電影中，人們被他們夢裡看見的奇特地景吸引，他們不斷描繪和打造這個景象直到找到它。那是一個有平坦頂端的巨大結構，一個升起的平台，是遭到時空區隔的文化相逢的地點。

1 這時考古隊的電腦和資料庫，都放在岸上的聖喬治鎮。

2 大部分的田野班課程都可以讓學生計入學分，收費主要是學費。這個案例中，紐約大學的學分費是五千元，食宿費是兩千元。

3 東正教會擁有塞浦路斯的廣大地產，包括考古隊庫房的土地，地上建物則屬於塞浦路斯古文物部所有。

考古學與戰爭



遺體

誰的歷史？

美國最重要的考古遺址，很可能就在紐約菲什基爾（Fishkill），位於九號國道旁，破落商業區的一處林地。比爾·桑迪（Bill Sandy）這麼說。他是老練的契約考古學家（contract archaeologist），他親手挖過這個遺址。桑迪本來要親自帶我去看這地方並指出墓地，但他被布朗克斯的緊急工作絆住了，所以我獨自開車前往紐約市往北約六十英里的菲什基爾。我把車停在瑪雅餐館後面的碎石地，跨過支線公路去看地主所說的交叉路空地（the Crossroads lot）。桑迪宣稱，這裡每吋都是最重要的國家遺址。我沒看到什麼標記或探溝，環生樹木之下有齊腰的草叢，大約十英畝雜木叢生的地方。在餐館和赫氏超級加油站（Hess superstation）之間，就在九號國道荒廢商城對面，重要的考古遺址偽裝成林地。兩個標示板面路而立，一個是「請勿穿越」的標誌，另一個是被樹葉部分遮住的「禁丟垃圾」。

二〇〇七年為了土地開發評估，桑迪在這空地發現七座墳墓。根據墓地尺寸、遺骨狀態、棺木鏽釘上的殘留物，他的結論是，遺體屬於獨立戰爭時期的士兵。桑迪確定這是老菲什基爾供應站（Fishkill Supply Depot）的墓地位置，但遺址所在地已被業主買來準備開發商場。

有誰聽過菲什基爾供應站？你去找歷史書看看，讀後會讓你皺眉頭。雖然這地方是補給大陸軍團（Continental Army）最大的供應中心，是宿舍、部隊集結待命區，也是在七年半內徵召兩千或更多部隊的集結地，幾乎與獨立戰爭同一時期。喬治·華盛頓曾在這裡負責監督其祕密運作、指揮營房建設、調遣部隊、軍糧補給、菲什基爾的軍用物資進出，並與將領溝通有關站區安全、士兵接種天花疫苗，並絞殺叛徒的地方。戰鬥雖然在這地區進行，英國也焚毀大陸村（Continental Village）附近營地，但菲什基爾供應站並未被破壞。這是戰爭期間的機密，而且至今仍然或多或少保持祕密。

我從邊緣看到的大部分土地，是七十英畝軍事重鎮的一部分。這裡距離哈德遜河，大約五英里，曾經是一個幾乎沒有樹木的制高點，現在則是樹林和商業區混在一起。我站在九號國道雜草叢生的地方往北看，瑪雅餐館在我背後，往赫氏超級加油站（有飛船三明治（Blimpie）、納桑熱狗（Nathan's）、和教父披薩（Godfather's Pizza）的店面）望去，就在八十四號州際公路坡道前，可以看到獨立戰爭供應站範圍內碩果僅存的建築：范·威克故居（Van Wyck Homestead）的草坪。這棟前華盛頓統帥總部，現在是優雅的博物館。跨過九號

國道，達卻斯商城（Dutchess Mall）的廢墟位於對面。只有麥當勞和家得寶（Home Depot）還在營業。周遭有七〇年代的笨重建築和塗鴉窗戶，再來就是一整片坑坑疤疤的柏油地面和碎石。所有歷史供應站範圍的建物：軍械庫、軍營、閱兵場、馬廄、鐵匠鋪、監獄、醫院都消失了，現在只剩統帥總部猶存。

黑人墳場

我站在林地邊緣，思忖著出土遺體將會引起的麻煩。

墓地的發現不完全是意外。雖然華盛頓的菲什基爾供應站在地圖上並未標註，但想必有個墓地存在。戰爭期間，疾病在此蔓延，一七七七年天花疫情在營區肆虐。別處來的大陸軍團傷病士兵在柏油鎮（Terrytown）北邊上船，在華盛頓指揮下從那裡載到菲什基爾醫院。居民記載，在路上看到屍體疊起來跟木材堆一樣高。當地的歷史學家知道，立在林地路旁黑色大理石陣亡者紀念碑已有上百年。然而，因為受到太多超速車輛的擦撞，大理石碑只好遷到范·威克故居的前院。汽車和摩托車呼嘯而過，我沿著九號國道往北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看到了這個巨大黑色的墓碑。美國獨立戰爭婦女會梅琳葛分會（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elzingah Chapter）於一八九七年立下碑文：「一七七六到八三年，感念眾勇

士，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為國捐軀，長眠於相鄰之地。」

我把「相鄰之地」這段話，從原來的語境中分離，想像它隨著煙霧往北飄去。

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考古學家已在找尋這些遺體。雖然他們沒有發現遺體，只發現兵營和眾多文物的遺跡，他們的努力導致站區被列入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官方認證屬於考古敏感範圍，但這僅是榮光，而非保護命令。因此，當瑪雅餐館和范·威克故居之間土地的地主決定開發商業用途，菲什基爾鎮和紐約州歷史保護局要求他們雇用考古隊，以確認申請建造不會擾亂脆弱而重要的歷史。但調查沒有結果，桑迪解釋：「考古學家挖了一個五十呎見方的坑，這確實是一九九〇年代考古學家會做的事，他沒有發現任何東西。」總結報告認為「沒有獨立戰爭活動的證據……我們有信心指出，沒有必要額外勘察，也不建議進一步作為。」²評估結果同意建設赫斯加油站，並許可在交叉路空地蓋商城。但在地主著手開發前，居民請願說服鎮長再做一次努力，確實了解開發案是否會影響遺跡。

如果地主馬上動工，桑迪和他的團隊就不必在二〇〇七年的萬聖節繃緊神經。桑迪所屬的公司，和一九九〇年代挖了探坑卻沒有任何發現的文化資源管理是同一家公司。但這一次，配有特殊刀片的反鏟挖土機派上用場：「這是考古學家用來去掉表土的做法，我們希望可以刮得乾淨俐落。」他估計，如果有墳墓會面向道路排列，因此「當我做這種調查時，會

與街路呈四十五度角來開挖。」

桑迪身材高大、五十多歲、鬍鬚蓬鬆，我的考古學老師說他是傑出又古怪，回顧往事時會盯著自己的手。我知道故事的結尾會提到遺體，我繼續追問。「早上八點我們準備工作，但若不砍掉幾棵樹，挖土機根本開不進去，只好等施工人員抵達現場用鏈鋸把樹鋸掉。」他記得，有人從教父披薩店走出來搭訕，說要請他們吃點心。這些已是陳年舊事，但桑迪還是很開心。

終於在那個萬聖節下午大約三點，反鏟挖土機開進樹林，開始小心翼翼地在地面表層切出五、六十英尺長的探溝。「我們馬上發現兩座墳墓，其中之一比我看過的墳墓還要像墳墓。」桑迪說：「你若曾看過成堆的墳墓就會知道。」兩個深色方塊躺在反鏟挖土機下面。著急的地主往他們走來，也有一些好事者在附近徘徊。桑迪回憶：「我不得不請地主離開，我在工作時不能與任何人討論遺址的情況。」但桑迪了解，他無法繼續完成這個探溝。「地主對我說，他不願意離開，但我必須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所以我拿起鐵鍬開始挖，多挖開一英寸。地主一邊盯著我，一邊跟我老闊講手機，她大喊：你知道，挖土機一天要花四百塊錢嗎？」桑迪無視於眼前的壓力。當他在田野現場，除了遺跡沒有什麼是重要的。「你猜後來怎麼了？我發現另一座墳墓，接著又一座一座出土。」最後出土七座墳墓，或稱為八座深色大方塊，在在都顯示是成人的墳墓。

地主要求立刻停工，是否繼續會另行通知。桑迪和同事想到將要舉行的地方選舉與這件事有關。經歷多年的修法經驗，以及替各州形形色色的地主做土地評估經驗，他的結論是：所有地產都與政治角力有關。他和其他契約考古學家只是「租來的平鏟。」桑迪如是說。他們收工打包到別處工作，直到地主叫他們回來完成評估。

契約考古學家也稱為遵從法規或搶救（compliance or salvage）考古學家，他們的工作很棘手。他們由地主和開發商聘請，但他們必須對遺址和考古資料負責任。根據他們判斷，若營造案會傷害考古資料，就應該修改或廢除計劃，或考古人員必須改變成緊急作業模式，儘可能加以記錄和搶救。他們從事的是減緩的工作。二〇一〇年，考古學家在曼哈頓下城垃圾填地工程中，驚訝發現一艘十八世紀的木造船。在工程停機空檔，減緩、爭取時間，搶救暴露空氣中而開始氧化瓦解的大塊木料，火速送到實驗室進行保存和研究。

當開發建案即將展開，任何考古發現都會令人憂喜參半，人類遺體成為考古學家最不想發現的東西。³正如桑迪在菲什基爾供應站找到墳墓後的筆記中寫道：「我經歷過一些墓地案件……往往惹人爭議。這些案件在眾目睽睽之下，足以毀掉一個成功的考古公司，也造成考古專業人士及（或）公司之間相互敵對的關係。」

桑迪的經驗來自他老朋友和同事艾德·瑞渠（Ed Rutsch）的相輔相成，瑞渠是個廣受同事和客戶愛戴的契約考古學家。桑迪記得瑞渠說過：「今天你愛我，但當我找到屍體時你會

恨死我。」

一九九一年，瑞渠被一位長期客戶挑上，專為聯邦機構工作的一家工程公司，對位於曼哈頓下城地產開發案進行樣本調查。在一些古地圖中，這裡曾被標誌為黑人墳場（Negroes Burial Ground）。瑞渠感覺將會在那裡發現墳場，於是寫了一個施工前的土地探測計劃，但業主並未給他時間執行。包括比爾·桑迪在內的團隊發現遺體數量遠超出原本瑞渠的估計，他於是堅持以空手發掘。他所揭露的非裔公墓顯示：十七和十八世紀奴隸和自由人都獲得尊嚴埋葬。瑞渠稱之為美國黑人的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紀念碑。他的工程師雇主和聯邦總務署（GSA）施壓要他加快減緩過程，接著停止給付他開出的帳單。考古學家置身於聯邦總務署和施工人員分歧的處境，便馬上成為新聞焦點。疑慮的市民前來抗議，尤其是非裔美國人，他們盯著白人發掘黑人的墳墓。瑞渠和他的團隊被換下來，改由一個與哈佛大學合作、更大的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執行工作。不久，國會監督委員會要求停止開挖。「我們被耍了！」桑迪憤怒地說。⁴即使日後讀到建築工人從非裔公墓挖出屍體的文章，他依然感到怒火中燒。

桑迪的獨門功夫是，使用植物考古學的微菌群（microflora, paleoethnobotany）幫他進行考古作業。他的眼睛對極微小的發現格外銳利，他的一位同事告訴我，桑迪走進田野，伸入手入草地就能挖出一個海百合珠（海洋化石製成的美洲原住民珠，每件一英寸長）。桑迪在非裔公墓要評估較小的文物，例如種子、魚鱗、昆蟲器部、碎骨，他從墓地土壤取樣，並在細節上用水強力沖刷泥沙。他寫出非裔公墓的初步漂浮物報告，並堅持官方估計的四百二十八具遺體數量太少。他認為一定有更多的墳墓，因為他篩出太多小嬰兒的牙齒。

在遺址現場你不能有情緒

這也是二〇〇七年桑迪能夠測定菲什基爾供應站軍墓位置的另一個原因：殖民時期的家族墓裡滿是嬰兒和兒童。發掘出七個墳墓，七個都是成人的機率有多少？「百分之一。」他平淡地說。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地方選舉後一星期，「交叉路」空地地主放行，桑迪得以返回遺址，發掘那深黑色方塊，並檢驗其內含物。他請驗屍官待命，然後在菲什基爾空地上集合他的同事。他跪在落葉堆裡，頭戴橙色水手織帽。他鎖定初挖之後露出最明顯的墳墓。刮挖區表面有許多典型棺木用的釘子，好像有些卡紙般的木片黏附在釘子上。我們跪下來看，這是典型的老遺址。如果墳墓持續保持潮濕，或持續保持乾燥都是好事，兩種情況都有利於保存。但是，如果墳墓乾濕交替，就毫無價值了。這些全無價值，遺骨狀態非常不好。掀出腿和臂骨和一部分頭蓋骨之後，我們決定不再繼續發掘。

桑迪說：「考古學家不喜歡撤退，我反覆考慮千遍。一些受尊重的專業人士問我，難道不回去找找軍服鈕扣。我覺得，如果不停止作業，我們真的會毀掉這座墳墓。我有如聽到遺址發出『我很重要』的鳴聲。距離美國獨立戰爭婦女會所立的紀念碑有七十五碼。鈕扣起不了什麼作用。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更多證明。」

他和同事以美國國旗重新安葬遺骨，包括那時代的旗子也放在一起。「雖然那些小伙子大多數可能從未看過的旗子。」桑迪說：「闔上遺址前，我們進行自己的儀式，心中表達我們的敬意，我們寫了些東西放進塑膠袋。留給我的學生後輩吧，他們之中未來可能有人會送入機器人取得DNA樣本。未來十年，他們將會採取的東西足以讓我們自嘆弗如……」他平靜地坐著，一個身材高大、滿臉鬍鬚，穿著法蘭絨和牛仔褲的男人。

「這一定讓你情緒起伏。」我最後說。

「不，不。在遺址現場，你不能有情緒。」他強調：「你只是在做工作。事情會怎麼發展不是你該考慮的。當然，在非裔公墓，我們可以告訴人們，我們認為：這裡有很大一片，值得拯救。但在工作上，我們只是要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什麼？並把它寫下來。情緒起伏的事就讓國家歷史保護人員去擔心吧。之後回顧非裔公墓就想到：居然沒有碑文。這些墳墓居然連個碑文也沒有。」

遺址要保密以避免劫奪，但遺址公開有利保存欣賞，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考古學常要面對的事。在菲什基爾供應站列入《國家史蹟名錄》近四十年後，我從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登錄影印本封面讀到這句警語：本資產位置屬保密資訊。內頁裡各點遺跡的方位被刪除、經緯度被塗黑。沒關係，我還是看得見塗黑標記底下的字。我加入在役考古學團體所學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公開討論特定考古遺址的具體位置，也不去討論其他可能損害遺址保全的訊息。但怎麼保存、欣賞，你根本不知道的東西呢？

當桑迪受聘於文化資源管理公司時，他不能與局外人討論墳墓的發掘。一旦他和州政府將交叉路空地的報告提出後，他不再受到保密規範。他說：「工作會讓你一點一滴的改變，你持續前進，除非你分心。」他並非退役軍人，但他叔叔在二戰期間於格陵蘭海上遭魚雷襲擊陣亡，讓他的童年蒙上陰影。菲什基爾戰士當時的犧牲，才成就他現在擁有的自由和身分。他認為：「我虧欠這些殉亡者。」

《職業考古學家名錄》(The Register of Professional Archaeologists)的行為守則，要求其成員應盡以下義務：「主動支援考古資源基地的保護……以負責的態度向公眾呈現考古學及研究成果。」先前的請願促成墳墓的發現，桑迪接到來自當地請願組織的電話，他描述自己的發現，並同意與請願團體會談。他獲准帶他們到現場。我問：「地主肯讓你這樣做？」桑迪提到地主之一多明尼柯·布拉柯利(Domenico Broccoli)：「當然。他和每個人一樣愛這個國家。」於是桑迪展開那個遺址的朝聖之旅，由新成立的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贊助。

「紀念活動讓我不能置身事外。」他說：「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做的事。」他開始對屍體埋葬地感興趣的人做導覽，正如他所說的，他在菲什基爾分心了。

二〇一一年九月的獨立戰爭週末紀念活動，我看見桑迪坐在范·威克故居院子裡折疊桌旁。童子軍、鐵匠，幾個穿著殖民時期服裝的婦女炸著蘋果餡餅，戴三角帽的戰役扮演人騎馬來搭話的時候，桑迪正與好奇駐足的人們交談。從紀念碑出發，他一天導覽墓地三次。說明重點之後，桑迪陪腳勁夠的人走下九號國道的路肩，他帶著考古測量桿（用黑色膠帶每英尺做標記），狀似手持木棒的摩西。三名童子軍在小路站定，以便我們可以從加油站安全穿越。

秋天的樹林裡，數十名熱情聽眾成群圍著桑迪，他深深吸一口氣，然後開始用他的紐澤西口音講先確定墳墓位置的過程，講運氣不好錯過屍體的考古學家，講他的團隊的重要歷史發現。桑迪把他的情緒藏在花白鬍子和全罩式太陽眼鏡裡面，棒球帽拉低蓋著他蓬鬆的頭髮。他講話時身子扭到一邊，揮動呈杯狀的手以示強調，看似要從空中把他要講的話舀出來。「我們用反鏟挖土機挖掉大約一英尺、一英尺半的泥土。撥開褐色的表層，看見黃色泥土。然後，我們開始看到遺跡，全部都呈現成人棺木的大小形狀……」

桑迪眼睛望著地面，一條幾碼長的窪痕仍然清晰可見，那是他挖出的探溝痕跡。除了來往車聲穿過樹林，空地上安靜無聲。聽眾站在茂盛的草地上，聽得津津有味。

他說：「當代的考古學家保持懷疑的態度，我們不相信任何東西。你跟我說，你祖父講

給你聽的三個故事，我會很感興趣，但我不會輕信。我們要的是實地證明，到遺址尋找我們立論的證明依據。」

桑迪和他的團隊獲得墓地的實地證明，他們聯合菲什基爾鎮及州史保護辦公室（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提交報告，而地主另行聘請文化資源管理公司提出另一種意見。該公司的考古學家使用穿地雷達，不僅驗證桑迪的結果，更發現數百個墳墓。桑迪告訴我們，這不僅只是墓地，這也是美國最大的獨立戰爭戰士的公墓。

桑迪能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談話，話語中能傳遞他正在做重要事情的感動力，他正為美國史上第一場戰爭中第一批陣亡者發言。他為大陸軍團證言，不是為那些住好穿好、史有記載、遺體有教堂墓地歸宿的將領，而是為強徵入伍一年或九個月、行軍到菲什基爾，在那裡輪哨換班、席地而睡，有一餐沒一餐的普通國民兵。那些日子裡木材短缺，當地居民抱怨士兵拆毀他們的圍籬，燃燒木板取暖。他提到，衣物短缺的戰士居住的裸體軍營，並引述以色列·普特南少將（Major General Israel Putnam）寫給喬治·華盛頓的一封信：軍團「被賦予任務，但軍團裡連一張毯子也沒有，鞋子和襯衫幾乎短缺……數百人被放走，只因為必要服裝的短缺……」

桑迪稱站區為獨立戰爭的蓋茲堡。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個地方？人群裡一位高中生問到，連他的老師也不知道，但他打算告訴他們，這樣他們就可以建立網絡以傳播這個消息。

桑迪表示同意：「這是不得不的做法，正因為人們不知道，如果他們都知道，那麼今天我們也就無須為了兩百三十五年前為國捐軀的戰士，站在這片無名墓地。」

在他帶領小組返回范·威克故居和獨立戰爭陣亡者紀念碑之前，桑迪試著回答大家的問題，但有一個問題難倒他：為什麼墓地未受到保護？地主的標價是六百萬美元，聯邦政府沒有經費買這個遺址嗎？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美國戰場保護計劃」保護南北戰爭的戰場，但不保護獨立戰爭的戰場。而且，不管怎麼說，這裡並非戰場。桑迪搖搖頭：「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幾年來致力修法將五千萬美元預算倍增為一億美元，以搶救獨立戰爭和八一二戰役的重要遺址。」但我們在第一批戰士長眠之地，發現遺體後多年還繼續待價而沽，他覺得這是不對的。在加拿大多數省份，於私人土地發現遺跡或考古文物時，文物屬於公眾，但在美國，是由地主擁有。

在非什基爾，吸引桑迪的活動他都會參加。秋季導覽數個月後，他獲悉全美花圈獻祭（Wreaths Across America）活動：每年十二月第二個星期六中午，全國各地志工到軍人公墓獻祭花圈。這是提醒人們虧欠獨立戰爭戰士的機會，桑迪夥同非什基爾歷史學會和非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在十二月安排紀念活動，吸引大約四十位人士參與，其中包括紐約第五軍團幾位戰役扮演人。美國獨立戰爭婦女會在范·威克故居前的紀念碑集合，我也加入桑迪他們的隊伍，帶著花圈沿九號國道的路肩前進。

我們聚集在空地一會兒，聽當地政治人物簡短講話。一位郡代表說：「感謝大家的光臨，今天是一個非常隆重的日子。我希望明年再度為戰士齊聚一堂時，到時我們該做的工作都已妥善展開。」完美而簡潔的演說。

一個穿戴殖民時期帽子和披風的婦女敬獻花圈，退伍軍人魚貫跟隨：一共七個花圈獻給二〇〇七年發現的七個戰士。戰役扮演人沿著冰凍的土地上探溝痕跡，四散躺臥扮演遺體。他們穿著棕色和藍色的長袍大衣、布滿結彩裝飾鈕扣、戴三角帽，而穿毛褲的那位戴著紅色針織帽，上面繡著粗曠的「自由」字眼。他們的步槍擱在地上，雙手交叉放在槍上，低著頭擺出火槍悼禮的姿勢。幾碼外，一名士兵雙手叉腰站著，看似要擋開九號國道呼嘯而過的摩托車。

這時剛好是伊拉克戰爭軍人遺體損毀之事，水落石出之後沒多久。空軍承認，無人認領和無法辨認的屍塊被焚毀，傾倒垃圾掩埋場。跨越世紀，對死者的不敬令人感到可恥。

第五軍團的軍官下令上膛開火，第一回合禮炮在我們頭上齊鳴。更多回火槍試射然後發射，在冬季森林裡溫馨撫觸。上一次這種重要又悲傷的感受，是我跟在棺材後面走著的時候。

兩年後，我在紐澤西州北部有機大蒜農場找到桑迪，他在那裡經營每週四天的夏季田野班。他坐在舊輪胎上，曬傷的雙手捧著自製三明治。學生來自他兼職講師的薩克斯郡社區學

院 (Sussex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他們在抬頭可見的山丘上發掘探坑，尋找四、五千年前的矛頭和石片。他有八年沒有醫療保險，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但他很難撥出時間看醫生。他已經好幾個月都沒休息了。

他告訴我，有一頭幼熊在田野工作區走動，還從他們身邊走過。我真不敢相信。後來桑迪介紹我認識他的學生，包括一位八十多歲的阿婆。她正在實現返回學校學習考古學的夢想。

我好奇他住什麼地方。他說：「鄉間小屋，離這裡大約四十分鐘，你想看看嗎？」學生離開那天，我們走到各自的車子旁，我說：「如果我跟丟了怎麼辦？」他笑著說：「這裡是鄉下，你不會跟丟的。」

我跟著他的車穿越黑色污泥，和連綿起伏的綠色山丘好幾英里。他是對的，大晴天裡這部後車廂載著篩子和鏟子的老舊敞篷小貨車，我怎麼可能會跟丟。到他家之前，我們繞了一段路。他從車窗伸出手指著方向。開進小教堂停車場，我在他車旁倒車停妥。他指著漂亮的白色教堂和罕見的八角樓，說：「你一定要看看這個。南北戰爭期間，信徒分成兩派，北方支持者在教堂聚會，南方支持者在八角樓聚會。」他站在那裡驚嘆。這時有人喊道：「比爾！比爾！」馬路對面一處墓園，一位清瘦、飽經風霜的男子坐在割草拖拉機上揮動帽子。「他是蘭迪。」桑迪說：「來吧，你一定要認識蘭迪。他是歷史學家，在附近做地面探蒐。這

是他的家傳遺產，他不希望消失了。」我們漫步到馬路對面，與這位照顧墓地、供奉死者的是他的家傳遺產，他不希望消失了。」我們漫步到馬路對面，與這位照顧墓地、供奉死者的是他的家傳遺產，他不希望消失了。」我們漫步到馬路對面，與這位照顧墓地、供奉死者的是他的家傳遺產，他不希望消失了。」

男子話家常。

到他家之前，我們兩次停下來看歷史遺址，紐約郡道上的舊蔬果供應站。雖然桑迪和鄰鎮社區保護者長期往來，但他還是像在過單身漢的生活，論文和書籍高高疊在屋內各處。有電視但沒收訊，他的書包括從過世朋友那兒接收來的各種藏書。好幾箱明信片塞滿客廳角落，大約有三萬七千張，根據主題歸檔並編號。他的兒時玩偶，名叫麥斯紅髮男孩，在櫃子上看著我。桑迪繼承他父親一九三六年的奧茲摩比 (Oldsmobile) 敞篷車，這是他珍愛的財產，跟一大堆奧茲摩比古董宣傳資料和修理手冊一起鎖在穀倉裡，他也把賣車當作副業。他小心翼翼走過老敞篷車，我則從牡丹花旁跳上車，我們開著古董車到鄉間四處晃。每呼吸一次，他就說出地方歷史的另一片段。

茱蒂·沃芙 (Judy Wolf) 穿著殖民時期的服裝、圍裙，戴著四季皆宜的繫帶軟帽，我沒看過她穿現代服裝。她是個固執的歷史研究者，幫助辨識一些埋在菲什基爾的戰士。她每個月和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的會長蘭斯·阿什沃斯 (Lance Ashworth) 整理獨立戰爭名冊檔案。沃芙試圖通過檔案、電子資料庫、撫恤金名單，和醫生期刊來驗證士兵的死亡數。福吉谷 (Valley Forge) 軍事檔案已經整理完成，但菲什基爾尚未完成，沃芙必須擴大尋找部隊相關記錄。美國陸軍軍需博物館 (U.S. Army Quartermaster Museum) 專門研究供應和物流，應

該是所有相關訊息的主要來源，但館內的檔案管理員卻表示，他從來沒有聽過菲什基爾供應站，沃芙感到驚訝。

菲什基爾供應站的知識和幽靈居民，賦予沃芙提出主張：「在我驗證菲什基爾的死者時，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們在一起，這些傢伙變成我的家人。我以母性和保護心態對待這些戰士。說實話，好幾次我覺得他們在幫我。他們希望自己被找到。」

二〇一四年初，沃芙發現在菲什基爾死亡，並埋葬在墓地的八十四名獨立戰爭戰士，令人大為吃驚。據推測，其中有位加拿大護士，還有亞伯拉罕·高德文（Abraham Godwin）船長，埋在他兒子亨利墓地附近。在菲什基爾生病致死的字眼，出現在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的網站上，在獲救的名單區，以感懷的跑馬燈方式呈現⁷。網頁以黑白顏色紀念死者，「將會繼續保持無彩色，直到有一天我們可以宣布，完全取回戰士的墓地並加以保存。」

即使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持續研究個別士兵，並舉辦虔敬的儀式來榮耀他們，但墓地依然困在商業土地的爭議中。郡務紀錄顯示，牽涉編號GLD3、LJC交叉路空地地主的陳情和訴訟。一九九八到二〇一二年之間，有扣押和判決、租賃和抵押、大規模的開發計劃，拖欠稅款和涉及降價為五百萬美元的土地，經過郡方估定為四十萬美元。第二家文化資源管理公司證實墳墓存在後，紐約州歷史建築保存辦公室建議，墓地周邊若未經過大範圍重劃就應該禁建。河流和濕地已經限制土地的開發，就像數以百萬的美國人，地主布拉柯利擁有一

塊價值遠低於他期望的房地產。現在他想賣掉，但除了遺址保護團體之外，還有誰想要這塊土地？

二〇一三年陣亡將士紀念日前幾週，重型設備出現在空地上，亮橙色警示燈圍起墓地。每隔幾英尺，圍籬被「私有財產，請勿侵入」的標示穿破。新聞稿宣布，第三家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完成調查，確定該墓地的邊界。新聞稿中包含以下這段挑釁的文字：「新聞報導中提到埋葬此地，純屬推測。雖然某些歷史檔案顯示，菲什基爾供應站有人住院和死亡，這不足以說明他們就埋葬在該區域，或者說，他們的遺體不會在埋下後被移走改葬別處。現在不能肯定所發現的幾座墳墓，是屬於美國士兵、英國雇傭兵，還是先前不知名的小家族墓地證物。」

聲明的最後提醒，遺址是私有財產，不向公眾開放。

桑迪寫信給我提到記者會：「只不過是一場錯亂。」他告訴我，不用擔心那些警示燈圍籬。幾位朋友見過地主布拉柯利，布拉柯利告訴他們，他也渴望保護墓區，他保證，他們還是可以在現場舉行陣亡將士紀念日儀式，「我們之間正在慢慢溝通。」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的會長蘭斯·阿什沃思（Lance Ashworth）說：「他必需賣掉土地，而我們是唯一想買的人。只是過程中會有很多怨懟和痛苦。」不會有身懷數百萬美元的白馬騎士現身營救他。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在范·威克故居放小費籬，在網站接受捐款、申請補助、會見土地信託基金，和遺址保護基金的代表人，他們希望這些作為將會達成遺址保存的目標。

陣亡將士紀念日前夕，許多阻隔膠帶和標誌已被拆掉。人群也逐漸增加，無疑是被現場的推土機和措詞激烈的新聞稿所刺激。二十六名全副武裝的男子：戰役扮演人，有一位坐在馬背上，和幾位隨營人員，穿著殖民時期服裝帶領七十人走下阿爾巴尼驛道（Albany Post Road），包括一些身穿當代軍服和三位確定是死在菲什基爾的獨立戰爭戰士的後人。戰役扮演人和政治人物輪番以莊嚴的聲調高唱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在檔案中發現的名字：阿伯納·希爾（Abner Hill）、吉夫特·佛里曼（Gift Freeman）、老約夏·格瑞福（Josiah Graves, Sr.）……考古學家低頭站著。當火槍齊射入林時，馬背上的人拉緊韁繩。

1 哈德遜河當時被稱為北川。
2 一九九八年七月，溫室顧問公司（Greenhouse Consultants Inc.）發展考古調查階段，紐約達卻斯公司為了巴塔利亞蘭扎建築群（Battogialanza Architectural Group, P. C.）編寫而成。

3 我第一次訪談的考古學家告訴我：「你聽過NAGPRA嗎？」美國原住民墓地保護與遣返法案（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是遲來的正義，制止考古學家和博物館收集和展示神聖遺跡，尤其是部落遺骸。她問：「你聽說過肯納威克人（Kennewick Man）嗎？對所有涉入者來說，這是噩夢。」在華盛頓州發現的九千年前的遺骸，經歷九年後由科學家和美國原住民提請監管。聯邦法院最終裁定，肯納威克人不是美國原住民，儘管考古學家因此能研究這具已知最古老的骨骸，卻贏得得不償失的勝利。骨骸目前由美國陸軍工兵團保管，在伯克自然史與文化博物館（Burk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Culture）已經看不到，但不曾放棄主張的科學家 and 美洲原住民持續努力爭取。

4 「GSA」的發掘帳戶可參考：<http://www.gsa.gov/portal/ext/html/site/hb/category/25431/actionParameter/exploreByBuilding/buildingId/1084>。帳戶在紐約保存檔案計劃中，顯示在網站：<http://www.nypap.org/content/african-burial-ground>。該帳戶的狀態是：「雖然HCI（瑞渠公司）發現一份一七五五年的地圖，在市政府以北的兩個街區顯示有非裔公墓，但考古學家推測，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發展可能早已摧毀遺跡。」這結論不是瑞渠寫的。

5 瑪拉·法羅（Mara Farrell）是參與初期工作，以保護遺址的當地組織者。

6 根據加拿大公園管理局，除了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之外各省都是如此。

7 菲什基爾供應站之友會的網站：<http://www.fishkillsupplydepot.org>

8 二〇一三年五月六日，Snook-9地產公司的格雷·蘭（Greg Lane）發布的新聞稿。

見證人 —— 傷害的證據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艾琳·考沃 (Erin Coward) 在夏威夷，事件發生六小時後醒來。攻擊事件像是只發生在電視裡，對她來說似乎不是真的。當她回到華盛頓特區自家附近，哥哥開車送她到五角大樓，去了解究竟飛機撞擊地點在什麼位置。「九一一」發生五年多以後，她收到紐約市總法醫局的通知：世貿中心復原團隊徵求考古學家，需具備人類遺體處理經驗。考沃跳起來，這是一份工作，契約考古學家總是需要工作，除此之外，她說：「我要真實體驗，這讓我與那些人連接起來。」

考沃有迷人的濃密紅髮，石板藍的兩眼直視，她來到布魯克林的改建倉庫報到。她在那裡換上防護衣、戴護目鏡、穿靴子，厚厚的橡膠手套緊束在她的衣袖上。她將要篩檢雙塔區附近六呎厚的表土，乃至來自下水道的碎屑，這些物質是有毒的。她的健康狀況必須定期監測。考沃和她的團隊奉命尋找器物，小到四分之一英寸的骨頭與牙齒。考沃說，嬰兒牙

齒在外行人眼裡，會以為只是小石子。一整天，成堆的碎屑透過輸送帶運到她面前。「我們檢視一些骯髒的東西，有衛生棉條、死老鼠。臭死了。」她回憶說：「有人發現一截剛斷的手指，我們只好打電話報警。相信我，你絕不會想看紐約下水道那些東西。」但這是工作，「我受雇去查看別人的垃圾。」

她從輸送帶上採集傷害的證據。她發現身分證、孩子的手錶——粉紅色的錶帶仍然緊緊繫。她發現有小熊圖案的嬰兒T恤，衣緣燒毀。她說：「令人難受，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那天，我打電話問朋友：我能過去抱抱你的孩子嗎？」

就像其他考古雇工，考沃試著避免讓這個嚴酷的行業打倒。逆來順受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她持續做了一年，她說：「每天要站八小時，所以他們允許我們聽Pod，抬頭看到有人跳舞很開心。我們還活著。」

考古學家的參與，本來不在「九一一」善後救援和復原計劃中。考古學家理查·古德 (Richard Gould) 指出，恐怖攻擊之後幾個星期，他在曼哈頓下城走動，看見巷弄之間的人體遺骸和廢棄物混在一起，被丟在垃圾車和防火通道上。他和其他人自願提供服務，但當局告知他們已經派出強力沖水車清理。古德召集考古學家索菲亞·波狄卡利 (Sophia Perdikaris)，以及受過法醫復原訓練的幾個探員組織一支考古隊，他說服法醫局讓他們在世貿遺址「歸零地」(Ground Zero) 外的一處停車場進行發掘。他們發現了人骨。

到了二〇〇六年仍然有人體遺骸出土，施工時起出大量人骨和私人物品。不久之後，考沃就收到法醫徵求考古學家的訊息。

清理毀滅性塵汗五年後，考沃和我在曼哈頓下城散步。新塔升起，鋼鐵工人在上層樓安裝建材。我們拿到紀念遺址的門票，在雙塔基腳的倒映池附近閒晃。倒映池的名字聽起來令人平靜，黑色大理石四邊刻有死者名字，只見水流轟隆轟隆注入海綿狀的坑穴。

雖然看起來很年輕，但考沃已近四十歲了，已在陸軍待了五年。她一再重讀艾茵·蘭德 (Ayn Rand) 的書，不是《泉源》(Fountainhead) 那一本，而是《頌歌》(Anthem)：「在軍中，個人的信息非常重要，你可知道？」

雖然還沒拿到碩士學位，但考沃已經有八年文化資源管理的工作經驗。當我們逛到遺址的時候，她告訴我：「文化資源管理是工作倦怠症最嚴重的領域。工作不穩定，四處飄泊。你會想成家，但做不到。這星期在維吉尼亞州，下星期在南加州，不然就是外調蘇丹。」她還沒有結婚，「我得找個人，體諒我一年有六個月不在家。」考沃刻意在不同的地方任職，首先是在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和紐約市，她說：「東岸是重要的殖民考古地區。」她也待過夏威夷和美國西南部。在亞利桑那州沙漠有她的歡樂時光，那裡的消遣很簡單，晚上都是圍坐營火喝著便宜的啤酒。

這種工作的耗損率很高，她說：「我知道，至少有十幾位考古學家脫隊，他們大多進入醫療領域，因為他們需要錢和更穩定的工作。我認識的考古學家常常換工作，這讓我驚恐萬分。那些有碩士以上學位又有二十年經驗的人，跟我這個剛起步的學士薪資差不多。他們二十來歲就從事文化資源管理工作，現在他們都六十多歲了，全部財產只有一部車。」

大部分的文化資源管理工作都是依法辦事，因此文書工作占據很多時間，考沃說：「我會對想成為考古學家的人說，去挖挖看吧，看看自己可否承受那些文書工作。什麼都要記錄：記錄一天的開始、記錄一天結束時、月底的總結記錄，然後還要寫一篇沒有考古發現的報告。」但她坦然面對不確定性，她說：「你不能決定能證明什麼。」那麼考古學家究竟可以完成什麼呢？她會回答：「去證明我們可以合理說出來的事物，有其真實根據。」

考沃將她的工作歸結為一個詞：專家。專家就是世界貿易中心復原小組持續在找的人。考沃對業餘考古學家毫不留情，她做了鬼臉說：「別亂搞呀！」她說：「業餘考古學家從坑裡拖出一只陶罐，一副在跟凶案警探說話的樣子：別擔心，我幫你蒐證。」

法醫訓練班

我坐在CSI 犯罪現場小組的座車裡，漫遊紐澤西松林沙地插著紅色旗標的小路，偵查毒癮犯棄屍服務生女友的地方。我們的司機阿曼達，是來自紐澤西州肯頓鎮 (Camden)

的犯罪現場分析師。他兩次前往伊拉克，有兩個小孩。擠在車後兒童安全椅旁的是羅娜，她是蘇格蘭毒物學博士候選人。她的部分金髮蓋在較深色的頭髮上，兩隻手鐲上有骷髏圖案。另一位是亞歷士，來自英國布雷德佛大學（Bradford University），是人骨學和古病理學碩士，這表示他很懂骨頭，尤其是老年病骨。三人都是二十來歲，目光銳利各有本領。妙齡女郎和法醫學有什麼關係呢？由凱西·萊克斯（Kathy Reichs）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識骨尋蹤》（*Bones*），劇中綽號骨姑的女主角唐普倫絲·貝倫（Temperance “Bones” Brennan），是她預言還是開啟了這個趨勢呢？

那天早上，汽車導航把阿曼達帶到一、兩英里外的泥土路，她因此遲到了。我們幾個人約在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松林地田野站碰面，我們一起上的課是：強化證據復原的法醫考古學（Forensic Archaeology to Maximize Evidence Recovery）。我們收到警方有關失蹤女服務生的報告，上頭附有地圖標示她的住處、工作過的酒吧，以及她男友工作的垃圾場。阿曼達指出，導航帶她走的泥土防火道是女服務生住處和垃圾場之間的可能通道，她說：「那是埋棄屍體的好地方。」我們從早上的教案說明得知，凶手若是被害者的熟人，就近埋藏的可能性更高，屍體若不是埋在後院新鋪的地底，就可能在凶手從家中到工作地點必經的路線。我們知道，要先找出路邊某個地標，可能在遮蔽或障礙物後面，凶手方便再度找到屍體並持續監視的地方。我們的指導老師金百莉·蘇·莫蘭（Kimberlee Sue Moran）指出，雖有例外，但犯罪行為大多會採行可預期的模式。

我們擬訂計劃後，搭上阿曼達的車開到泥土路。路上遇到另一個法醫考古隊，兩個二十出頭的女孩、一名年輕男性人類學家，和一個三十多歲的重案組探員，他們忙著在松林裡插旗標。亞歷士好奇問：「他們找到什麼了嗎？」我們沿著防火道發現兩處可以靠邊停車的地方。其中一處似乎有希望發現屍體，另一個地點是在有天然冠毛植物構成的屏障。二〇一四年濕冷的春天，大部分的林地上長出青苔，但成堆冠毛植物後面的區域並未長青苔。顏色較深，似乎是被更深一層的翻土所覆蓋，腳下感覺像是踩在海綿上。阿曼達說：「有一條繩子！」羅娜在繩子旁插上旗標，然後我們繼續四處巡走，又發現另一個看起來也很有希望的地點。

莫蘭的性格開朗、嫵媚動人、三十五歲，考古學真是年輕有毅力之人的領域，莫蘭強調，法醫考古學就是考古學，只是以更嚴格的標準執行。你發掘並系統地將文物分別裝袋，你在每個環節測繪、記摘要並拍照。你還要防範汙染，跟著警方的程序走，記錄物證並持續每一個過程，以確保你的方法可以在法庭上站得住腳。莫蘭在課堂上開宗明義說：「讓我們分享案例！」她的兩名助理向我們講述碰過屍體的故事，以及他們蒐證時面對的挑戰。我學到一些難以忘懷的東西，譬如人的膝蓋骨看起來像石頭，骨頭燃燒時會收縮扭曲。莫蘭的助手安妮·哈札（Ani Hazza）雖然只有二十來歲，但已經處理過一百多個案例。她回想，有一

位女士殺了丈夫，焚屍後將骨頭棄置在垃圾桶。哈札的團隊必須逐層翻垃圾桶，但那個空間狹小，每次只能一個人從事。哈札說：「我們還發現一隻貓，真開心！」她說完，大家都不敢碰桌上的甜甜圈了。

還好我參與的不是美國五屍農場。瑪麗·羅奇 (Marry Roach) 在《死屍》(Stiff) 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有人將自己的遺體捐給科學研究，加以埋葬後再發掘出來，然後由執法人員和考古學家進行研究。不同的是，我所在的是寬闊、陰森的紐澤西州松林地，就如約翰·麥克菲 (John McPhee) 所寫的：「從黑幫的角度來看，棄屍在松林沙地要比棄屍哈德遜河好。州警對我說：若有人想要犯下凶殺案，他只要帶把鏟子開車到那裡。沒有會發現屍體。我常想，裡面一定有很多屍體。」紐澤西州法律規定，法醫不能以培訓為目的發掘人屍體，所以我們正在尋找的虛擬女服務生受害者，其實是一頭四百磅的豬，由莫蘭的團隊一年前埋下。由於溫度和其他條件不同，屍體化為枯骨需要一至三年，但莫蘭說：「幾個月前我們檢查的時候，屍體血肉依然安在。」

遺憾的是幾個月過後，莫蘭的團隊沒有人能明確指出豬屍的埋葬地點。莫蘭和她的助手哈札和艾力克·楊 (Eric Young)，從田野站附屬建物後方帶我們走出來，領著我們穿過森林小徑。我們向上爬坡約一英里，抵達靠近交通繁忙的柏油路，離防火道較遠的地點。接近大水池空地明顯被動過手腳，呈現矩形中間凹陷，這表示埋入的屍體已經崩解、肚腸破裂。

莫蘭指給我們看，鏟子切入土地的平整直邊，她說：「大自然環境裡是找不到直線的。」我認為，我們錯在高估凶手想毀屍滅跡的動機。他不過是有勇無謀、驚慌失措的罪犯，也許他沒有想到可以在防火道旁找到比高速公路更好的滅跡地點。但是我很好奇，我們發現的這個點究竟埋了什麼？我們只在那裡停留兩天，沒有時間調查松林地其他地方，裡面可能有凶殺案的受害者。第二天，我們就必須把豬屍挖出來。

第二天早上我獨自一人走進林地，因為田野站只有一處洗手間，我排最後，當我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走了，但我不擔心。雖然前往現場必須徒步爬坡，但很容易到達，而且是在那麼大的水池附近，有明顯地標。我嘗試的第一條小路是死路，我不得不原路返回。我走向另一條小徑，但感覺不對。不管我轉往哪條路，沙地和松林看起來大同小異，小徑似乎越走越多條。松林地面積超過一萬英畝，覆蓋地圖上一大片色塊。也許你還記得《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電視影集，有兩名歹徒保利和克里斯多夫，決定將他們殺害的俄羅斯人遺體丟棄在松林地。他們開車到遼闊、茂密林木的荒野，打開後車廂，但俄羅斯人沒死，還拿起鏟子攻擊兩名歹徒，開走車子。後來兩名歹徒在林地晃蕩，一邊哆嗦一邊鬥嘴。我現在能體會那種感覺。

最後我回到田野站，兩個駐站科學家把我帶往正確的路徑。我遇到莫蘭，她正在找我。接著，莫蘭和我到達埋豬地點，其他人已經用標示犯罪現場的黃色膠帶，把埋屍點圍出寬大

的區域。我穿上白色防護衣，套頭套腳以免汙染證據，最後戴上兩層乳膠手套，裝備完成後加入團隊。我們看起來像是一群太空人，分散在布滿小松果和枯葉的沙地。首先，我們拍照並測量現場，接著在膠帶圍圈區裡拉開距離排成一列，由南到北緩慢前行，八人並排穿越現場，繞行樹木、水池和埋屍點。我們在尋找彈殼或其他可能的證據，用旗標插探樹葉並鬆開泥土，標示看似有人遺留下來的東西。然後我們散開，從西往東橫越現場，接著研究每個旗標並加以測繪。莫蘭問：「這個為什麼要做標記？」刑警指著隱蔽在棕色草皮的彈殼回答：「這是在找的彈殼。」

這個發掘工作很艱苦。我們測量、拍照，並記錄每個過程，用土壤對照表比對土壤顏色，弄成一個寬四英尺長八英尺的矩形區域，分為四個象限，用釘子標示四個角，在釘子之間拉起細繩，標示開挖區的周長。最後，當我們小心翼翼用平鏟翻開覆蓋的泥土時，我們發現腐爛豬隻的蹄、腳趾和帶毛的脂肪塊，我們也挖到水瓶、啤酒罐和菸頭，這些很可能都是有力證據。莫蘭說：「菸頭是採集DNA的好東西，歹徒喜歡抽菸。」

還好這是春寒料峭的時節，我們的防護衣底下已汗涔涔，想像若是在華氏九十度高溫，昆蟲肆虐的時候來做這些會有多困難。嗡嗡蚊蟲折磨我們。挖深坑穴，伸手入埋屍中心點，緩緩挖出汙泥需要身體支撐，弄得我肋骨疼痛，莫蘭笑著對我說：「試著去挖上頭那區塊，或去挖陡坡！」

莫蘭二十歲的時候從布林莫爾學院 (Bryn Mawr College) 畢業，找到文化資源管理公司田野人員的工作。她說：「這是艱苦、耗體力的工作，天天如此。」工作安全並非她的考慮，因此她在危險的遺址遭到鉛汙染並不意外。二〇〇〇年時她時薪九·五美元，待遇很差，但有鼓舞人心之處。若有人問她職業，她會志得意滿地答說：「我是考古學家。」

「有蛆！」阿曼達喊道。莫蘭遞來小罐子和標籤，讓她裝那個白色的蛆蟲。莫蘭說：「我很意外，沒發現更多蛆。有時候移開墓地上的土層，會看見整窩扭動的蛆蟲。」蛆蟲或各種蒼蠅的幼蟲，會在暖熱的土中孵生。莫蘭說明如何有系統且細微地觀察蛆蟲，如同蒐證的法醫處理物件一樣，以重構現場當時的實況，協助刑案水落石出。例如，辨識蛆蟲所屬的種類，再經比對氣溫和埋屍條件，可用來估計死亡時間，莫蘭說：「這是死亡時間相對準確的指標之一。」她喜歡透過大自然了解死亡時間，以及用科學方法還原屍體爛解的過程，她說：「我家後院埋了四十五隻老鼠，就是用來做研究。」

下午約三點，我們挖了一呎深，手伸進裡面時肚子抵著坑口，五個穿白色防護衣的掘墓者與坑口呈放射狀，像一顆顆的星星。我把豬屍上的泥土刮下，刷進畚箕，將畚箕貼著我的肚子，轉身倒進桶裡，由其他人進行篩檢。挖出的屍體臭味飄揚，像是一個強大的回力波。我和犯罪現場的夥伴，勉強去聞那個腐臭味，並試著加以描述。腐質體的惡臭宛如陰溝裡的穢物或汗水，而且味道濃稠，黏在我的頭髮和衣服上。那天晚上回到家裡，我家的小狗被那

個味道搞得瘋狂。

莫蘭的助手楊，大概五十歲，就站在我身邊，是這群人裡年紀最大的。他禿頭且滿面鬍鬚，警職退休後回到學校取得兩個考古學位。我們認真地向他描述那種惡臭，逗得他呵呵笑。他問：「你覺得很臭？」然後談起他擔任警探時的種種，其中有個飲彈自盡者從來不洗澡。他告訴我們，之所以選擇法醫工作是因為總得有人做。他對西元前三千年的中美洲考古情有獨鍾，有機會就去墨西哥和瓜地馬拉參與發掘。下週他和莫蘭會去奧斯汀，參加美國考古學會的年會。

莫蘭擁有英國研究生學位，她在英國推動蒐證法醫學的應用。她承認，部分是受到福爾摩斯的鼓舞：「他真正預見許多蒐證法醫學的應用與發展。」她也倡導犯罪現場分析的標準作業程序。過去七年，她協助舉辦美國考古學會的蒐證法醫學年度委員會。最近她根據自己的實驗發表一篇論文，讓執法和蒐證的法醫有機會進行「爆炸後調查」。這個實驗是將動物遺體塞滿一輛巴士，建構每個遺體的身分，並配上如手機和珠寶等個人物品。最後一步是模擬早上上班時段，巴士遭受恐怖襲擊而被炸毀。²參與這項工作的專業人士必須對爆炸做出反應，確保事故範圍不被破壞，並處置現場。他們必須收集證據，從破碎的物件中檢查可以導向作案者的信息。他們也必須設法收集和正確識別，每個動物及其隨身物品，這是他們面對遺物時的職責所在。莫蘭對成果很滿意，模擬實驗的每一個動物（六十一件物品中有五十

八件是由她親手放置），都得以還原並確認身分。

我看著龐大、部分腐爛的豬（女服務生的替身），並想著處理藍色牛仔褲或T恤破片，會有多麼困難。這些發掘夥伴，多數人曾處理過人類遺體，每天報告工作內容並準備面對更多困難。我深深吸一口氣，對他們的毅力表達敬意。

接近傍晚，莫蘭懊惱時間有限，無法將屍體從埋葬點移出。有時候，屍體下面可能透露線索，譬如凶器或腳印，她說：「如果凶手事前就挖好坑，即使掉落坑內的枯葉也會是線索，這是預謀的跡象。」挖到一半的豬屍要再度埋掉，留著讓另一班學員來尋找。楊、莫蘭和其他學員抽了很多菸，然後把菸頭和一些飲料罐、水瓶扔進坑裡，讓之後的蒐證法醫學員傷腦筋的犯罪證據。我們用篩過的泥土把坑填平、搗實，帶著鐵鍬、犯罪現場標示膠帶和蒐證袋，穿過松林徒步返回。

業餘者

替紐約市法醫局檢查世貿雙塔附近殘骸的工作後，艾琳·考沃決定從事法醫人類學工作。申請期間，她待在華盛頓特區和母親同住，有一天下午我們約好在國會大廈附近碰面。考沃和她的母親來飯店接我，帶我參觀考古博物館。她的母親說：「我們從沒聽說過這地

方，但艾琳打電話安排了私人參觀。」她的母親開車載我們繞行華盛頓郊區，我們聊到她女兒的考古事業，她的母親對我說：「她跟你說過在沙漠中找到貝殼的事嗎？」

童年的考沃，睡前希望聽到的故事是《貝奧武夫》(Beowulf)，現在她閱讀傳記、旅遊隨筆、英國小說，以及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布萊森 (Bill Bryson) 的書，她提到布萊森的《萬物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我打算當一個懷疑論者，布萊森說：我要打垮你！然而他對演化的討論出人意料。」

車子駛到山丘上的帕利塞德區 (Palisades)，波多馬克河上方古老河階地，有許多漂亮房子的住宅區。若沒有導航，我們可能找不到帕利塞德史前博物館 (Palisades Museum of Prehistory)。我們遲到了，考沃緊張地咬著指甲，她的母親開車上坡下坡，路上兩旁都是漂亮房屋，我們全都眯眼盯著門牌號碼。沒有路標、沒有指示牌，因為這個博物館本來就不是營利單位。最後終於找到了，它位於一片大空地的角落，有葡萄架和外屋，還有兒童玩具四處亂扔的庭院。主人道格·杜平 (Doug Dupin) 是一位年輕父親、滑板玩家，他引領我們進屋。我們走過草坪到外屋，一間精緻的會所，空間足夠四人使用，他說：「這件事我已經做好幾年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來訪。」他在挖一個酒窖，試圖揭露真實的歷史：舊藥瓶、南北戰爭時期的子彈、破陶片，以及美洲原住民的槍頭。我和考沃的母親欣賞樹皮風味的粗麻布牆壁，以及他製作並銷售的海報，上頭有美洲印第安人菸斗、波多馬克帕利塞德石器槍頭，考沃則觀看架設印第安槍頭的展示櫃。

當附近足球場開挖時，杜平挽救該區古文物的決心更加深化。他看著推土機翻起泥土，出現各種古文物。他提醒曾為哥倫比亞特區工作的考古學家，但他無法要求停工，於是他和幾個鄰居開始在晚上從事表層收集，找到了槍頭和陶器。他將發現的文物張貼在考古學通信群組，結果只換來當地歷史保護局的斥責，他說：「我會很高興讓專業人士接手，但如果他不打算做，我就要插手。」杜平注意到，開發商在帕利塞德破土動工之前的調查和減緩作為相當有限，於是他決定逕行干預，收集文物並加以編目後公開展示。他買了一些展示櫃，把他的住所改為博物館並架設網站，更踏進當地專業人士留下的穴溝。他也記錄地方政府違背歷史保護法的行為，並建立所發現的或已被消除的歷史紀錄。

他感受到一股驅動力，要與這個遺址與曾經居住於此的人做連結，以及與下一代人做連結。杜平說：「這條河裡都是魚，你會了解，為什麼原住民喜歡這裡。我帶三個兒子探索懸崖上的洞穴，發現了石刻畫和箭頭。」考沃與他談到在西南地區的工作，對美洲原住民歷史的熱愛是他們的共同點。兩人都因為美洲原住民文化歷史保存，缺乏財力支持而感到沮喪。他們兩人都同意，近年金援集中在殖民遺址和非裔美國人的計劃，超過萬年的美洲原住民的考古經費，卻像乞丐般向人要錢。

遇到杜平之後，考沃坦言：「我必須重新檢討，我對業餘考古學家的看法。」如果他們

像杜平一樣負責任，她不介意他們訓練志工。想想看：「教大眾如何正確處理意外發現的文物，這對專業人士來說是一大幫助。」她決定讓杜平參與她的行列。

杜平的兒子放學回家之前，我們起身前往考沃和母親在弗吉尼亞州安納代爾 (Annandale) 的家，我們料理鬼頭刀魚，考沃則談起在夏威夷大島的工作。她回想起，隨處都可以發現比溝 (piko) 孔的石刻畫。比溝孔是微小的玄武岩圓孔，當地原住民將部分嬰兒臍帶埋入以祈求好運。

考沃的母親對於女兒能發現世界級的東西感到驕傲，但當考沃收起盤子走入廚房的時候，考沃的母親向我靠過來，低聲問：「她有跟你說過發現兒童 T 恤的事嗎？」

1 法醫考古復原 (FAR, Forensic Archaeological Recovery) 是因應世貿中心恐怖襲擊而組成。屬非營利的志願組織，在火災、空難和颶風之後，派遣法醫考古學家到現場。

2 莫蘭說，如果沒有同事艾爾·史都華 (Al Stewart) 協助，她不可能完成這個模擬實驗，光是取得用來爆破的巴士就很困難。

危險世界考古學

歷史性的結盟

「將領們，坐下！」飯店的會議室傳出吼聲，當時我在美國考古學會年會會場徘徊許久，想要找個有趣的議場坐下來。我看著張貼在會議室外的告示牌：「危險世界中的文化遺產保護」。我喜歡危險世界的意象。沒錯，我走進一個麻煩的世界，一個考古學遇見軍隊的世界，一個縮寫字衍生更多縮寫字的世界。「這個會議名稱是「CHAMP」，英文意指將領 (champion)，也是田野 (field) 的法文，這是美國考古學會暨軍事小組的文化遺產工作 (Cultural Heritage by AIA/Military Panel) 的縮寫²，一個複雜但管用的名稱，也許只有這樣才好名正言順，對我們這群分屬兩個領域、約五十人同時下指令：「將領們，我們開始吧！」

這些人是誰呢？我環顧四周，計算有多少人穿西裝、打領帶、盤腿而坐，軍方占優勢，他們有陸海空三軍，還有中央司令部³，更不用說來自國家警衛隊的多位成員，還有一位之前我沒料到會在考古學研討會遇見的人，這個人自稱是美國陸軍軍法總署署長 (U.S. Army

Judge Advocate General) 的戰事法特別助理。軍人們禮貌自我介紹，臉上帶著冷酷的優越感，還有來自多個國家的數十位考古系研究生和教授，一位3D影像檔案學家，美國考古學會前任主席和我，大家互相自我介紹。

發生什麼事嗎？考古學家和軍隊合作，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免於坦克、炸彈、槍擊、軍靴，和考古文物竊盜者的威脅。經最高指揮部的准許，考古學家著手替美軍士兵裝配夠用的文化資訊來執行任務，讓他們在進行戰鬥時避免破壞世界各地的考古寶物。

戰士和考古學家早已並肩工作過。《二戰史蹟捍衛者》(The Monuments Men and Women of World War II) 在戰後廣為人知，並藉此索回納粹掠奪的歐洲藝術資產。但合作僅止於此。到了二〇〇三年，發生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慘遭掠奪，這事件讓軍方蒙羞也嚴重傷害考古學。新聞報導：事件發生時，美軍在一旁袖手旁觀；有些報導則說，部隊在博物館開火並替掠奪者打開大門。⁴ 國防部長唐納·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 加劇了損害，他毫不理會這些值得關注的掠奪事件，只是任憑事情發生。

這事件帶來的衝擊和後患，促成美國國會簽署「一九五四條款」，也就是「武裝衝突事件中之文化資產保護海牙公約」(簡稱海牙公約)。再度促成憂心忡忡的考古學家，和軍方會商聯手出擊的可能性。雖然很難想像，為了保存人類文化認同，這兩種謹慎、甚至偏執的職業成員可以有共同的熱切渴望，攜手合作為了文化機構和文物免遭傷害而努力。據我了

解，「CHAMP」的幕後推手，為了建立兩個群體間的信任並促進共同利益已經努力超過十年，但他們所接觸的部分對象從來沒參加過考古學會議。

在被告知籌組「CHAMP」的理由後，我們分成好幾個工作小組。一身豹紋裹身洋裝、黑色皮靴，負責籌設文化遺產訊息小組的女士吸引了我。她是柯琳(柯莉)·韋格納[Corine (Cori) Wegener]，退役的美國陸軍少校預官以及博物館館長，曾在民事旅(Civil Affairs) 擔任軍官，掠奪事件後派駐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她是藍盾，美國委員會的創始人——不是保險公司藍盾，而是國際非營利組織美國分支機構，在世界各地致力於戰時文化資產的保護，可以說是文化紅十字會。她現在四十多歲，統籌圍坐這張桌子的小組成員，任務是把重要的考古學信息交到戰略人員的手上。啊，訊息？我好像在情報單位！我坐在外圈的椅子上，衛星、竊聽者，還有什麼比考古學家搶救文明瑰寶的念頭更引人入勝呢？

韋格納向我們簡報藍盾如何因應二〇一一年前的利比亞衝突。利比亞內戰爆發後，聯合國安理會核定當地為禁飛區，一位美國藍盾的同事打電話對她說：「你在做什麼？我們該採取行動了！」韋格納於是打電話給待過利比亞的考古學家蘇珊·肯恩(Susan Kane)，兩人開始聯繫她們的聯絡人。任務是整理出利比亞重要考古學遺址、博物館和圖書館的非攻擊清單，然後交到決定最終轟炸地點的人手上。韋格納一邊整理清單一邊說：「海牙公約制定後，各國都應該為自己國家這麼做。」但很少國家做得到，「有些遺址清楚明白。」比如說

利比亞的五個世界遺產，她說：「世界遺產之外的選項就令人為難了，就像要從自己的小孩當中挑出最愛的。我二十四小時內就要清單，你必須做選擇，這就是為什麼你會想要提早進行。」肯恩找來曾在伊拉克工作過的英國考古學家，他也曾與英國國防部合作。一旦清單整理好也檢查過座標，考古學家接著就將這些文化遺址加以歸類和分級。

整理清單是一回事，清單要送到哪是更棘手的問題，韋格納率直指出：「軍方不是單一號令的體系。」她交給上級軍事聯絡人，包括現在這桌人裡兩個坐在她旁邊的男人，也交給其他國家的藍盾同事，再轉交給他們的軍事聯絡人。

韋格納的聯絡人之一是理查·傑克遜（Richard Jackson），這個人的名片頭銜很長：美國陸軍軍法官特別助理……後面還一串字。他指出，文化遺址的非攻擊清單已經是軍事計劃的一部分：「所有分部透過戰場情報準備，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我們所定義的戰場包括文化地景在內，而且有共同的目標設定準則：公共基礎建設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因此醫院和學校列在非攻擊清單上，教堂、清真寺和受保護的文化資產場址也是軍事禁地。「只有極高層的同意才能推翻這份清單。」傑克遜補充：「除非部隊遭受來自這些地點的火力襲擊，否則將領無權加以攻擊。」當非攻擊清單付諸運用，就會有效運作。「垃圾訊息導出無效指令，反之，如果目標資訊準確，就會有好成效。」他提到脆弱的建築文物烏爾省的金字塔廟（Ziggurat of Ur），第一次波灣戰爭時，就座落伊拉克機場旁邊。年代上溯兩千三百年的金字

塔廟，一直在非攻擊清單上，儘管「薩達姆（Saddam）刻意將飛機停放在那裡，我們也沒有瞄準它，因為將造成建築文物的損傷。」

盜竊者的清單

可以想見的是，考古學家的利比亞非攻擊清單，勢必比軍方設定的範圍更廣，考古學家的清單包括在該國各地工作過的考古專業人員的敏銳訊息。清單在北約（NATO）對利比亞首波轟炸之前約二十四小時交出。清單有交給對的人嗎？清單有導致文物的遭遇不同嗎？國際藍盾特遣團視察攻擊區後，提出報告指出文化遺址並無顯著損壞，即使有，也不是轟炸造成的。目前為止一切都完好。北約的報告提到，考古學家的非攻擊清單也許可以成為未來行動的參考模式。說到此，韋格納停下來看看桌子四周，來自美國國防情報局、穿西裝的提摩西·梅蘭生（Timothy Melancon）清清嗓子說：「在利比亞之所以達成任務，是因為轟炸時我們斟酌了這份清單。」

彷彿石破天驚，意義明確不會弄錯，自從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潰敗以來，考古學家一直在做的努力終於在這裡找到歸宿。他們成功地把軍方推上合作平台，他們改變轟炸的彈道。梅蘭生傾身向前說：「遺址沒有損壞。」他證實：「這並非偶然。」他承認，就是他的團隊最

後將訊息傳送給正在瞄準目標的戰士，他說：「是的，我就是那個關鍵的聯絡人。我的任務是關注那些我們不想炸掉的東西，我們持續將世界各地非攻擊的文物新增到資料庫。」

這是梅蘭生和韋格納第一次見面。就像這裡的其他人，他們都太專業以致不便互相擊掌歡呼，但圍坐桌子隨時可見彼此會心微笑。

「我們一直在找你，終於找到你了。」韋格納對梅蘭生說。

「這裡有記者嗎？」穿制服的男士問到，他是美國空軍文化資源聯絡人。我到底算是做哪一行的，恐怕還有疑義，但我抬起肩膀舉起手，接下來如何是好呢？這個人只想確定我搞懂狀況：「你明白這裡發生的事嗎？」這些人把我帶到世界衝突的後台，在首度合作的場景下調整他們的台詞和角色。他們促成改變。穿西裝的男人對我點點頭：歡迎見證人。在考古學家參與之前，美國國防部的資料庫也許有三十個利比亞文化遺址有待保護。考古學家參與以後，變成兩百四十二個。歷經七個月的轟炸，這些文化遺址全都倖免於難。

其他考古學家試著分享，如何避免攻擊炸毀文化遺產的知識。後來我才知道，早在第一次波灣戰爭，芝加哥東方學院的教授就曾經聯繫國防部，傳送攻擊行動應該迴避的考古文物目標訊息，但他找錯對口，他的提醒無人理會。直搗軍事官僚機構決策中心，始終是個艱難挑戰。

不過，要說服考古學家參與彙編大量敏感資料可不簡單。某些考古學家基於道德因素

不想和軍方沾上關係，即使他們的努力可以協助遏止文物破壞，他們也不想幫助那些戰爭發動者。也有些考古學家因為實務的理由，反對這樣的合作。考古學家在這個合作領域，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文物盜竊。在戰區，文物劫奪經常因提供資金而助長衝突。況且在這個洩密的世代，考古學家會希望他們所知的遺址列在政府控管名單上嗎？這就像你在脆弱的古董上放了標旗，以便搬運工人對這些有價值的古物格外小心。遇到好人時，他們確實特別留意，要是不幸遇到壞人，那就完蛋了。你可知道，這是盜竊者的最佳清單，你幫他做好分級，方便他從最有價值的先下手。

來自空軍的男士，向圍坐桌子的我們承認這些資料的敏感性，他說：「我們謹慎且保守，但有信心控制局面。」韋格納認為利比亞的成功經驗，有助於他們的努力，她說：「我們確實具備有用的網絡，但需要時間來建立信任。」

在戰爭和衝突中堅持分擔文化責任的觀念持續增長。韋格納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到處有人死亡、無家可歸且承受苦難時，妳還能擔心文化遺產嗎？」她告訴Smithsonian.com網站，當有人第一百萬次這樣問她的時候，她才意識到：「只有美國人會這樣問，在考古工作現場沒有人這樣問我。」

我的小組花不到一分半鐘就嘗到成功的滋味，接著迎向下一個挑戰。梅蘭生說：「列車已經開動。一旦有任何國家受到關注，我們就要把文化遺產的資料找出來。」小組一致認為

馬利 (Mai) 可能是下一個熱點。韋格納說：「讓我們提出運作方式的建議草案。現在我們和提摩西關係良好，如果新人來來去去，還奢談什麼文化？」她希望未來的戰爭衝突發生時，運作管道是暢通的，她說：「我們想說的是：來吧，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這時，會議室裡的其他人正與他們的同行協調，要替士兵開發考古學教具。正如一位考古學家所言：「我們不想在阿兵哥要登機時才跟他們說：順帶提醒一下，記住不要損壞文化遺產喔！」有些教具別出心裁，例如以伊拉克、埃及和阿富汗為主題的幾副撲克牌——通常有五十二張牌，附有考古實務說明、聞名的文化遺址和知名文物的說明，撲克牌背面可以拼成各國最具特色的遺址地圖。這東西是誰設計的呀？我要找出答案。

我無端捲入這場專業籌劃，到世界各地最危險的地方拯救考古遺產，這裡是令人震撼的運籌核心。我見證了重要的歷史時刻：考古學家將他們的專業知識貢獻給軍方，經過多年的耐心討論，終於得到軍方接受和認可。我和來自非營利組織的年輕女性交談，她的工作是把瀕危的考古遺址做成巨細靡遺的大型3D圖像。⁷我得到承諾，會收到一副撲克牌。我還拿到滿手的名片，韋格納是唯一在遞出名片時帶著猶豫的，她的名片我不禁多看兩眼，名片上的照片是一具義大利盔甲，狀似堅不可摧。這位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位美國史蹟、藝術與檔案管理官和媒體有過不愉快經歷，至今還為了巴格達博物館遭掠奪的誇張報導火光不已。報導說：「十七萬件文物遭竊」，韋格納指出，實際上只有一萬五千件。報導又說：「美國

人為掠奪者敞開大門」，韋格納指出，他們沒有做這樣的事。還有報導：「掠奪者打斷雕像的腦袋」，韋格納表示只有一次例外，那些雕像出土時就已經是斷頭的。她憤怒地寄電子郵件給《紐約時報》，糾正他們的新聞報導，甚至在十幾年後，報紙資料庫仍稱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幾乎遭到掠奪者掏空。其實，展廳之所以是空的，是因為工作人員把容易被搬走的珍品藏起來了。韋格納也不欣賞記者攀上亞述帝國的展覽文物，只為了取得更好的報導制高點。

韋格納往下走到飯店走廊，黑色方框眼鏡後面皺著眉頭，擔憂著海地、埃及和敘利亞的文化遺產。她離開不久，我和勞莉·拉許 (Laurie Rush) 同步走出大門，就是她發明文化遺產撲克牌，她還創造許多用來訓練士兵和考古學家的創意教具。她在某個軍事要塞掌理文化保護，我想看看她所執行的嚴格考古計劃。

1 這些縮寫中「IMCuRWG」是指國際軍事文化資源工作群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ultural Resources Working Group)；另一個縮寫「CCHAG」，是指文化遺產行動小組作戰司令部 (COCOM 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Group)，其中「COCOM」則是作戰 (Combatant) 和司令部 (COMand) 的縮寫。

- 2 二〇一四年「CHAMP」移除內含的縮寫，變成考古學暨軍事小組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 by Archaeology and Military Panel）。與此相應的是美國考古學公會（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的「MARS」，即軍事考古學資源管理（Military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Stewardship）。兩者的參與者重疊。
- 3 海軍方面也很關心；海軍上校包丹諾（Bogdanos）是《誰偷走了巴格達》（*Thieves of Baghdad*）的作者，這本書追查伊拉克國家博物館被攻擊後的古物下落，包丹諾是小組成員，但未能出席本次會議。
- 4 海軍上校包丹諾除了帶領特種部隊調查這些掠奪事件，他在《誰偷走了巴格達》一書中重建當時發生的事，駁斥新聞報導。博物館列在非攻擊清單上，但他指出，當伊拉克衛隊將之作為架設機關槍的據點，它就失去受保護的狀態。他宣稱，湯米·法蘭克斯（Tommy Franks）將軍展現了令人欽佩的自制，沒有在博物館成為槍炮掩體後下令摧毀。
- 5 海牙公約之後設計了藍盾符號，菱形色塊上方有倒三角形色塊的深藍色圖形，用於標註世界各地的重要文化遺址。
- 6 這位教授是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麥奎爾·吉布森（McGuire Gibson）。
- 7 嘉美·珀修（Jamie Pursuit）是「CyArk」的合夥人並擔任開發經理，「CyArk」是非營利組織，對瀕危的文化遺址進行雷射掃描。可參考他們的網站：www.cyark.org。

避開標靶 ——任務與尊重

我見到勞莉·拉許的時候，她為了建立美軍對文化遺產的尊重，已經打拚近八年。二〇〇四年夏天，汽車收音機播出一則新聞，是促成她採取行動的濫觴：「我開車前往鼓堡（Fort Drum）上班的路上，那天早上傳出攻擊巴比倫的新聞。」拉許說的是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播出的新聞：「美軍基地重創巴比倫古神廟」。在部隊裡工作的民間考古學家拉許乍聽愕然。在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大浩劫一年後，美軍受命保護巴比倫，但他們現在卻把基地建在廢墟上，把古神廟夷平用來做直升機停機坪，考古學家約翰·羅素（John Russell）是聯軍在伊拉克的文化顧問，他告訴聽眾：造成「比我們所知的更大、更多的傷害。」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蕾妮·蒙田（Renee Montagne）問羅素，損害是否可以復原。羅素壓抑情緒，以和緩語氣說：「你無法修復受損的考古遺址。當你鏟進考古遺址，你就摧毀過去的一些證據……所有的傷害都是永久的。」他相信，類似的破壞也發生在伊拉克之外的地方，例如吉

爾庫克(Kirk)的空軍基地，那裡的考古遺址已經被掠奪一空，推起沙包。

拉許是鼓堡的文化資源管理人，鼓堡位在紐約州北部，靠近加拿大邊境，拉許在那裡管理二十五平方英里的考古和歷史資產。她由美國國防部聘雇，她描述國防部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積極的文化資源計劃機構之一。」她指出，國防部「分支機構下登記在冊服役的考古學家數量龐大，他們發現成千上萬的考古遺址，保存數以千計的遺址，並成就北美大陸和夏威夷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鼓堡的網站宣稱，文化資源保護是國防部主要任務。比起其他機構，國防部在文化遺產保護的花費更多。其預算中數十億美元用於環境管理，其中包括文化保護。這是替軍隊工作的考古學家的驕傲，正如同他們的考古學家夥伴在國家公園管理處聯邦分支機構一樣。但重創巴比倫讓大家都嚇一跳，連我也不例外。究竟國防部裡有沒有考古學家呢？

國防部在美國的紀錄特別令拉許和她的團隊感到驕傲，他們為鼓堡帶來勳章和美譽。「當我開始為國防部工作時，我以為可能會被迫當計劃的橡皮圖章而不考慮考古學的真誠。」拉許寫道：「我所經歷的剛好相反。」事實上，她在意的和大多數考古學家不同，她要的是熱情的支持。「我老闆說：這太令人興奮，或我老婆是美國原住民，或我們一起在家裡看《探索頻道》。」拉許說。當她提議廢棄神聖美洲原住民遺址的炮兵靶場，他們同意了。她的工作給予考古學家優厚地位：她夫復何求。

因此，她和同事們處境特別尷尬：「當摧毀巴比倫的新聞登上全球媒體，難以想像還有什麼專業人士會比美國軍事考古學家更感到沮喪。」

士兵們並非故意去招惹四、五千年歷史的廢墟，這事困擾著拉許。檢查損害的考古學家指出：只要對伊拉克土墩可見度做最少程度的遮蔽，結果就會有所不同。最少程度、最簡單的歷史和保存課程，就足以拯救巴比倫廢墟免於無可挽回的損害。她深信教育程度較好的部隊不會犯這種錯。拉許決心承擔起這個責任：「必須教育派遣前線的士兵。我跟自己說，我具備解決這問題的所需技能。」

「向來，美國軍事用地上的考古學資產禁止軍人進入。」拉許寫道：也許當局保護過頭了，「如果你在國內不讓士兵接近文化資產，你就不能指望他們知道如何占領海外文化遺址而不造成文物傷害。」

早上美軍因為巴比倫一事遭到媒體痛批，拉許驅車進入鼓堡陸軍要塞後門，奔向文化資源大樓。她對美索不達米亞所知有限，所以在她集合工作人員之前，下令提供士兵的文化訓練之前，她Google了伊拉克的考古學。「我發現一個網站，讀到有關通靈廟塔，我看到網頁底部說：通靈廟塔平台非常適合不明飛行物著陸。噢不！這是由某個水晶骷髏單位贊助的網站！」拉許笑了。她驚奇的笑，往往是為了處理軍事哨所面對的棘手問題。

拉許部分吸引力來自她的外型：個子雖小但健壯、輕鬆自在、素顏，剪齊的金髮和笑

容把她的臉切分為兩個愉悅的部分。她的白襯衫漿脆、卡其褲寬鬆、鞋舒適。「我是做事厚實的人。」拉許說。她傳給我刊登在鼓堡基地報紙《山嶽人》(Mountaineer)令人稱羨她的成就和獲頒獎項的個人簡介時(最近獲得的是學術界的羅馬獎(Rome Prize)資格獎)，她開玩笑自己是個自大狂，但她的自嘲和對同事的讚美證明並非如此。她強調，鼓堡因信任而把指揮權交付給她。「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兩個老闆。」她說。當拉許跟老闆之一的退役上校說，她想對現役士兵做文化培訓。「他看著我說：巴爾幹地區會變得不一樣。」他跟基地裡的其他人說：「為了鼓堡，她需要的任何東西優先於我們的需要。」

鼓堡之外的考古學家、保存主義者和軍方人員都跟拉許得到同樣的結論：考古學知識對軍隊來說是至關重要。但他們往往是孤立的，沒有組織起來。軍方撲朔迷離的官僚體制阻礙許多考古學家交流專業意見。要掌握考古學並不容易，它是個廣泛而複雜的行業，跟鑽研美洲新世界的考古學家比起來，古代世界考古學家(研究伊拉克、東方和中東地區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典羅馬和希臘)往往要參加各種不同的研討會並閱讀不同的期刊。美洲考古學堅持設置在人類學部門，研究人類(跟歐洲不同，考古學屬歷史學一個分支)而拉許是美洲考古學養成、引以為榮的學者，她的訓練彌合文化鴻溝。

拉許第一步先申請國防部遺產計劃補助，設計一副撲克牌教導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基本考古學。然後她利用鼓堡的考古遺址進行文化資產培訓。當我參觀她的基地時，她連結層面深廣的考古學同業和軍方；而我越是讀更多這類問題的文章，就越常會碰到勞莉·拉許這個名字。

鼓堡的文化資源部總部設在一棟軍米色建築的樓上，寬敞的儲藏室裡用整排黃色金屬櫃隔開，鐵灰色文件櫃和地圖櫃排成一列。拉許打開櫃子拿出石製拋射箭頭和彈珠，這是她多年來的工作重點。指著工作台多鋸齒石片排成的圓圈，她說：「這是看起來像被大卡車碾過的印第安磨石。」有時候事情凌亂難搞，坦克還會滾動而過。過去八年來的緊急國際行動把拉許帶到伊拉克、阿富汗、約旦、土耳其、奧地利、英國和義大利，但大本營位於這個庫房，這是她和其他兩名全職考古學家的辦公室，附帶樓下分類和清理文物的工作室。作為文化資源部的負責人，拉許負責所有住過鼓堡這塊土地上的人類文化遺跡，從一萬年前的美國原住民，到二十世紀的農民和生鐵工人，再到目前的士兵群體。自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她在基地的全職工作之後，她和團隊已經發現包括一處神聖美國原住民遺址，和史前冰川湖的水線遺跡。發掘遺址並非任務，團隊的目標是找出對搭建軍事建物的安全地點，而不是追尋考古學，這些發現令人印象深刻。

拉許說：「一九九八年，沒有人在鼓堡周圍發現什麼，雖然我們確實發現溝谷旁的舊工具，有人在那裡捕獲獵物嗎？」她對冰川湖和水線有想法，並召集地圖專家到基地。她問全球信息系統(GIS)的人，他們能否指出溝谷所在。「那是神奇的時刻，我看到有著山影的

地圖，彷彿太陽正要下山。你看到一堆又一堆的遺址，就在支流流進湖裡的地方。」尋找史前冰川湖水線，易洛魁族 (Iroquois) 在這地區的歷史增加了一個前所未聞的文化層。「鼓堡的造船歷史已有上萬年！」拉許說。

團隊也從儲存櫃中獲得新發現。拉許說，保管員在十九世紀農莊蒐藏物品中東翻西翻，找到了法國槍石。「這不該是出現在農莊的物品！」他告訴拉許。「沒錯。」她推敲說：「我們開始發現貿易珠子、印第安集合藝術和十七世紀的雪松柱，這些物品讓我們認識到，眼前是個非常不同的遺址。」從事早期基地考古學的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將這個特殊遺址的物品標記為十九世紀農莊。拉許說：「事實上，其主要構成部分竟是十七世紀的毛皮貿易和耶穌會的遺址，這對很多人來說更有趣。實際上也非常重要，它成為紐約邊界唯一的遺址。」

拉許不假思索地包容文化資源管理公司所犯的錯誤：「這多半取決於主要研究者的個人興趣。那個團隊主要研究者感興趣的是水泥穀倉在這個國家何時首度出現。」水泥穀倉！她笑了，彷彿在說：我知道，考古學家是奇怪的。然後她告訴我，她和團隊犯的一個錯誤。她說，沿著水線遺跡發現的造船證據，一度吸引一位對古代海路感興趣的考古學家前來。「我們為他打開碎石袋：我們不知所以搶救下來的石屑，他從中尋找孔道薄片 (channel flake)。這些很重要！這位考古學家是多麼嚴厲。他好像看著我說：你這個笨女人，你沒有資格在這裡工作。連孔道薄片都無法分辨……」

我們都笑了，雖然我必須承認，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孔道薄片。拉許寬容的眼神看著我並解釋，如果你了解箇中奧妙，這會是一個更好的故事。凹型古印第安箭頭在中間有個孔道或凹槽，為了形成凹槽，必須削除一片石頭。她說：「這片石頭就是孔道薄片。重點是，這位男士在碎石袋中發現真正重要的東西，但並未挖苦我們或打擊士氣，而是一副這太刺激的表情，然後耐心地說：須要我跟你們講解特徵嗎？就這樣變成一段神奇的學習經驗。我們有個口號，知錯之時最該興奮。因為這意味我們發現了新事物，並且進入學習模式。」

拉許在康乃狄克州完成預科生養成，但決定前往美國中西部的的大學，因為她聽說那裡的人不錯。說真的，那是她的優先選擇。她在布盧明頓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 遇到了她的丈夫傑克，在他取得芝加哥大學醫學學位，而她獲得西北大學的碩士和博士之後，夫妻倆搬到北鎮 (North County) 安大略湖千島群島地區，夫婦在那裡以低度醫藥地區的執業服務清償學貸。他們建立自己的家庭，很快有了五個小孩，拉許開始在當地工程公司和古董船博物館找考古工作。拉許醫師認為《北國風雲》(Northern Exposure) 是為他們量身訂做的休閒娛樂，那是九〇年代早期的電視連續劇，描寫一位剛出道的醫生到阿拉斯加任職，他們戲稱為「傑克和勞莉秀」而且「我們保證，他們肯定是監聽我們家的對話來編寫劇本。」每年冬季大風呼嘯過安大略湖，並穿過附近的阿第倫達克山脈 (Adirondack Mountains)，十月起就霜雪霏霏。我在五月中旬到鼓堡拜訪拉許，在參觀

基地的時候淒冷的雨斜飄而下，我應該戴上溫暖的手套才是。「阿拉斯加的理查森堡（Fort Richardson）可能比鼓堡更冷，但這裡下的雪較多。」拉許說。

鼓堡的極端氣候造就了第十山地師（the Tenth Mountain Division），是美國陸軍首度訓練滑雪士兵的場所，這些士兵在二戰中征戰、從納粹手中奪取義大利山區要塞。他們「開展了這個國家的滑雪產業。」拉許說。氣候挑戰著人類和裝備。暴風雨造成技術災難之後，第十山地師的野戰電腦以「堅固耐用」的Tud重新裝配，直接將電子訊號傳送到實驗室。不僅降雨降雪量是個問題，夏天殺蟲劑弄得到處黏糊糊。「這裡有很多蟲嗎？」我問。拉許以大笑回答我。

田野工作造成的身體不適，一開始讓拉許對考古學感到氣餒。跟我遇到的其他考古專業者不一樣，她曾想過替代的職涯；她的學位其實是公衛博士。但千島群島沒有公共衛生職缺，但這地區的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在徵求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從業人員。她調整期望，不斷實作，重回田野。

拉許、她的兩名成員和我都穿上亮橘色反光背心，冒著雨前去第十山地師的所在。基地通道構成路網，用伊拉克自由軍事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和持久自由軍事行動（Enduring Freedom）等名稱命名，在米色和棕色背景中襯以帶狀常綠樹，其間有組合辦公室切隔。我們開車經過裝有水管和肥皂液的巨型開放攤架，那是用來清洗坦克車的地方。

第一站我們來到靶場區的互動地圖室，安全人員盯著場上進行訓練的部隊。實彈射擊是危險的，我們穿著橘色獵人背心，因此不致於被當靶打，但地圖上射程內的亮點讓我感到不安。拉許的同事統籌管理基地的田野工作，就算知道她有未爆彈拆除小組熟練，也沒讓我比較平靜。地圖室外的陳列櫃展示了在鼓堡發現的一些武器裝備，有上世紀的炸彈、手榴彈和火箭彈，更有光滑、有倒鉤的槍頭、矛頭和箭鏃的現代化博物館櫥櫃。

鼓堡有超過六百個歷史遺址和兩百多個史前遺址，但拉許想帶我看幾處阿富汗村莊的摹本，以訓練為目的、用橡膠和再生建材建造。矮牆圍起「避開標靶」區，一座模擬清真寺和穆斯林的假墓地，士兵和空戰射手可藉此進行作戰訓練，做到盡可能降低對神聖遺址的傷害。另個場址的特徵是低矮、平頂的收容所，由幾個戴頭巾的大鬍子假人占領，附有噴雕泡棉做成的彩繪汽車。拉許說，每個場址的成本低於兩千五百美元，是政府刷信用卡最高金額上限。馬賽克塔是她的最愛，是伊拉克烏魯克（Uruk）一處遺址的摹本，用紙筒（sonotubes）做成（便宜但堅固耐用的紙管，通常用來灌入水泥），材料從基地建材補給中撿拾而來。

鼓堡的假遺址看起來像是卡通漫畫，但這代表軍隊的初步嘗試，讓士兵有明確準則既可以有效作戰又能夠謹慎占領遺址。拉許說：「我們一直缺乏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我們會說：伙伴們，要多加小心。但我們從未告知他們如何做。」鼓堡的場址現在複製到其他基

地，拉許和她的團隊受託指導其他軍事考古學家建構考古遺跡的摹本。

考古學充滿即興應變，但是通常是指把車拉出溝渠，或想出怎麼發掘難以接近的地點，而不是摹塑遺址。但鼓堡裡所有人的優先任務是部隊支援，拉許既有實用主義者聲望又願意配合命令工作，做起事來很靈巧，她是個任務取向的考古學家。她回想先前對即將前往伊拉克的士兵發表關於文化敏感性的演講，有士兵問說：「他們從墓地向我們開槍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可以回擊嗎？我說：當然呀！另一名士兵說：你是我可敬的考古學家。」²

我們開車經過歷史村落勒雷維爾（Leraysville），看到現在供視察官員和軍事慶典使用的老宅和僕人住所，以及史德靈維爾（Sterlingville）鄉村警哨，都是二戰期間徵用取得的。居民移置後，空村在一九九〇年代列入《國家歷史地點名錄》。文化資源公司指導勒雷大廈（LeRay Mansion）的修繕（甚至建議志工如何在節日時循古裝點），並接管史德靈維爾老宅和搖搖欲墜的基地管理和保存工作。拉許和她的團隊帶領住過史德靈維爾的居民和後代為他們導覽，其間意外聽到有人對此地禁止士兵進入感到不滿。他們質疑，若士兵不能在這裡受訓，那麼他們讓出自己的家園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反應引發文化資源公司人員的點子：用史德靈維爾真實的考古遺址來協助即將派遣的部隊。他們清理表層植被，然後著手穩固遺址，以便使用時不會造成損害，拉許稱之為「強化遺址」。他們用沙包強化搖搖欲墜的牆壁，用強韌但透水的土工布或回收坦克履帶來覆蓋基地開口，然後再鋪蓋乾淨沙子和泥土。成果是強化了遺址的脆弱環節，但仍看得出來是真實的遺址，士兵可在其中演練戰鬥教案，卻能避免傷害考古遺跡。在史德靈維爾早先居民的祝福下以及指揮官的謝忱中，第一個美國考古遺址正式開放給派遣海外的士兵做訓練之用，這已經是伊拉克的巴比倫神廟慘遭破壞兩年之後。

拉許持續接觸年輕士兵並教會他們以尊重為武裝：她的前陸軍指揮官之一，目前統率軍校生，已將她的文化遺產課案納入學程，成為軍校生後備軍官訓練隊（ROTC）訓練的一部分。

因為拉許載著我們繞基地走了一段很長的距離，我們必須再進營門。她遞上她的考古隊軍證和我的駕照給哨所士兵。「陌生人？」他看著我說。毫無疑問，我今天從一開始就是陌生人，試著在這個大基地裡找路，看見所有的路名都附帶「自由」的字眼，遵照「炸彈處右轉」的指示牌（有個塗裝過的大炸彈在拉許辦公室那條路上的拐角處）。但要是我找路的能耐並未增進，若是拉許不打算在多蟲的夏天邀我回來與這些發掘狂一起做苦工呢，我只得對警衛承認：「是的，我是陌生人。」

我們把車停在松樹、樺樹混合林旁邊的沙地，並穿過一叢松樹到一塊空地。空氣中飽含水氣，薄霧籠罩著遺址，讓人感到靜謐、獨立於基地之外，這裡像是一處人們聚在一起誦唱的場所，而不是大動干戈的地方。為了追蹤看起來像小紅帽的英國大兵地衣（British soldier

lichen)等原生植物，拉許的夥伴之一走丟了。另一個夥伴勘察地面活像一個勤奮的考古學家，發現一個頭上有裂縫的小瓷娃娃。

拉許站在那兒查看沙地遺址。幾年前她曾派調查隊到這裡，了解到這是個敏感區；有最近被坦克碾過的痕跡，但也散落著數千年的石器殘骸。拉許記得測量師之一打了電話給她：「我想我正站在石頭圍起的圈圍之中。」立石的排列可能代表一個神聖聚會所。

考古鑑定過程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拉許的團隊花了好幾年的時間調查這個遺址。「這遺址有超過四百個火坑，但沒有陶器！這麼龐大的跡象顯示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這不是日常生活的場所。」後來，文化資源公司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的結果，發現這區大部分火坑可溯及公元三七五年，並諮詢了考古天文學領域（天文學文化史）先驅者之一。這個田野現場有超過五百顆大於十英寸的石頭，並且配對擺置，拉許說：「這些石頭構成了遺址的重要部分。其中一部分依照易洛魁（Iroquois）陰曆中點的天狼星位置而排列。」

考古學家終於搞清楚石頭按照星星的位置排列後，他們邀請當地易洛魁原住民莫霍克族人（Mohawk families）來聚會。那個晚上孩子們跳著舞，之後他們露營聚會直到第二天清晨黎明。拉許想起那天默禱禱詞：神啊，請求您讓太陽在這裡升起。太陽果然升起：黎明之際，雲層移罩之前，燦爛的太陽照耀了「整整十分鐘。」她說。那位考古天文學家安東尼·阿維尼（Anthony Aveni）告訴拉許，其他巨石可能順著晝夜平分點排列，一年之中

太陽直射赤道的兩天。阿維尼說對了嗎？「是的。」拉許確認：「我在那兒和豪豬一起等待日出。」

後來遺址開放美洲原住民進出，但美軍士兵和員工仍禁止進入，而文化資源團隊及其訪客是例外。「一旦軍方決定實施保護，我們的工作就完成了。」拉許說：「這讓團隊感到挫折。考古學家喜歡發掘，不情願只是把東西留在原地。對他們來說，事情才剛開始。」但對於易洛魁民族，包括莫霍克族「這正好合他們的意思。」拉許喜歡談論美洲原住民參訪基地的話題，聊到紐約的易洛魁部落精神領袖塔多達荷（Tadodaho），前來向他們已忘掉名字的星星致意，那時有個長者拿木棒在沙灘上畫星座，然後戳孔代表昴宿星團（Pleiades）最後抹平所有痕跡。這真是非常戲劇化，或充滿詩意的時刻。

易洛魁人自稱住長屋的人（Haudenosaunee），拉許認為能和他們結緣讓她在工作上受惠良多。「自從替美軍工作後，我們學到很多關於易洛魁人的事。」無論是發表考古教學撲克牌的演講，或是遊說將考古學家納入國際戰爭演習計劃，她都推崇從其他文化中學習考古學的好處，把美軍和易洛魁族的互動關係描述為模範。拉許不是把美洲原住民當作利害關係人或族裔社群，而是當作美軍的「主人家」；當易洛魁族酋長、族母與塔多達荷參觀基地時，他們獲得國家元首級的接待。

國家元首？以前不是這樣的。在歐胡島馬夸（Makua）軍事保留地與夏威夷原住民之

間，打了那場代價昂貴的官司之後，九〇年代末期國防部決定試用新方針。國防部諮詢全國各地部落首領，詢問他們希望如何被對待。結果在一九九八年十月提出政策，正式形成政府對政府的新模式，主要解決方案是國防部諮詢美洲先民所有相關事務，並保證以禮相待。

拉許的創新領導貢獻，先後多次榮獲陸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和其他古學家的嘉許，表揚項目列舉了與易洛魁人的互動工作，她丈夫聳聳肩說：「我真不懂，你不過是對他們以禮相待。他們就頒獎給你？」

「沒錯，這是重點所在！」她跟她丈夫說。

伊拉克和阿富汗文物撲克牌是成功的傑作，這副優雅的黑色紙牌用來玩單人牌戲、撲克或戰鬥卡都很好，此外更印有豐富考古圖象。每副紙牌呈現詩人所喜愛的內在邏輯：每種花色代表文化的不同面向：紅磚代表文物、黑桃代表發掘和遺址，紅心代表贏得人心，梅花代表文物保護。每張紙牌包含不同的訊息，從最基本的訊息（例如，如果你發現古文物或考古遺跡，請停止發掘）到啟示性的訊息（例如坎兒井（Karez），阿富汗古代的灌溉系統水道，看起來像蟻丘空拍圖）。這副牌也可以鋪排成拼圖，把每張牌背面拼起來，可構成更大的考古學圖像。這副牌本身就是一件文物，設計者放進許多自覺、創意和趣味痕跡展露無遺。

拉許在她高中同學會中找到發想這副撲克牌的第一個夥伴。她與羅傑·巫里西（Roger Ulrich）再敘青春期的友誼，他現在是考古學家，在達特茅斯（Dartmouth）學院教授古代典籍，是古代世界專家，他幫拉許取得古典考古學專家的協助。針對這副牌的內容，這些專家對巫里西和拉許提出建議；巫里西的學生核對資訊、研究照片，並確認遺址和文物圖像的出版權，而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軍用土地環境管理中心贊助設計和印製。不久之後就發行了三副紙牌，一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文化遺產為主題，一副專以阿富汗為主題，另一副則供每兩年舉行協同作戰演習的美國和埃及軍隊使用。

拉許從部隊聽到對撲克牌和遺址摹本訓練的唯一抱怨是，怎麼現在才有這些？撲克牌的報導出現在《考古學》雜誌和《今日美國》，有關軍事和文化遺產的正面報導。拉許感到振奮。撲克牌送到沙漠營帳裡士兵的手上，他們可以學習地區文化遺產活用和有趣的知識，同時研習附有顯白文字說明的地標圖像：「這遺址存活了十七（或二十三、三十五）個世紀。它和其他遺址會比你存活更久嗎？」但撲克牌就像名片一樣，對於那些受制於考古學界和軍方官僚體制的人同樣有價值，撲克牌引導他們走向開放且直接的行動管道。從鼓堡和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管理中心的文化資源工作團隊中，人們可以找到致力遺產保護和減少軍事損害的專業者網絡，有關兩個單位的簡介連同撲克牌的新聞報導印在每一副撲克牌上。拉許說：「有趣的是，有多少軍方人員經由大眾傳媒得知這個計劃。」這些撲克牌大放光彩。

儘管贏得軍事領導和部隊認可，拉許卻受到一些考古學家批評，說她只為軍方工作。在二〇〇八年都柏林世界考古大會上，她主持的小組討論與軍方合作的好處時因有人抗議而

需要警方保護：另有線上聊天室的貼文說要干擾她的討論會，所以大會期間一名愛爾蘭警員隨同在拉許和同場講者身旁。「一位警員說：夫人，我們必需和你預演疏散計劃。」拉許回憶說：「我必須跟你說，你只管讓講者準時抵達，問題就解決了！」也許不必要，她補了一句：「這不是怯懦的人能做的工作。」

回應批評，拉許寫了一篇名為：〈戰神變成智慧女神：考古學、軍事與學院論述的思考〉的文章，辯護美國軍方保護文化遺產的努力，並懇求合理和尊嚴的對話，呼籲大家心平氣和，並牢記這是性命攸關的事。在她十七歲的大孩子突然去世一年後，拉許開始在鼓堡全職工作，而且因為不足外人道的個人因素，讓她奮力不懈幫助士兵珍惜人類文化的殘屑斷片。她看著年輕男女上戰場，她想協助他們獲得尊重。當有怨言：「我們該擔心的是人，而不是陶片、墳墓和廢墟。」對她而言這是沒有意義的爭論。別忘了，陶片、墳墓和廢墟是人的產物。

拉許歡迎論辯。她承認：「身處軍事環境中，即便是最有經驗、最具分析力的人類學家也會不自覺地被同化。我們持續挑戰並評估努力將達成的效果，同僚的協助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她無法容忍因為拒絕與打仗的人合作所導致的知識退縮。她說：「有伊拉克人死在檢查哨，因為我們的士兵伸出手掌向上表示：停下來，但對伊拉克人來說，伸出手掌向上的意思是歡迎你。此時此刻作為人類學家，如果你有知識可以救人，怎麼能不分享呢？」

拉許無意要求意見不同的考古學家閉嘴，她無意讓讀者噤聲。她覺得每個人在文化圓桌上都應該有個座位。比如說，電視實境秀專訪尋寶者，他使用金屬探測器，遭到考古學家譴責，但拉許把尋寶者當作文物保存的潛在盟友。她說：「立法完全不按照我們的意思走，考古學家們都很火大。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形象，憤怒的考古學家。我想說：你是熱愛古文物的人嗎？難道我們不能想辦法引導這種熱情？我們正在錯失大好機會。我們仍然有潛力，但我覺得有些同僚看輕了我們受雇做這些事的意義，這其實是超乎想像的特權。我們的工作是其他人夢寐以求的。偶爾我置身在雞尾酒會，身邊聚集著博士，常都會說：哦，我一直想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害我捏自己好幾下。」

拉許涉入爭議、棘手的專業問題，但心中仍然充滿希望，並且渴望廣結善緣，甚至去和尋寶者交朋友。

造訪鼓堡那個晚上，我和拉許與她丈夫在薩基港（Sackets Harbor）的酒吧一起晚餐，她的先生滑稽幽默，是位醫生，他們女兒凱特和她新婚夫婿作陪。我們看著港邊落日，這裡是一八一二年多次戰役的場景。餐桌上擺著各種手工精釀啤酒。向晚的光線從觀景窗漫射進來，穿過桌上的飲料杯折射，轉化成不同的寶石色調的光線：琥珀色、紅寶石色、金色。拉許說，她本來在公眾場所或將軍面前說話很容易怯場。為了克服焦慮，她練習冰上舞蹈並參加比賽。她說，一旦你在人群面前出過醜，你跟任何人說話就沒問題了。

凱特取笑母親跟另一個訪問者互動經驗。那時有學生約訪，拉許邀她到鼓堡。凱特引述學生寫的那篇報導：「你再怎樣也不會去注意這個女人。她既普通又矮小。」拉許自己先笑了出來。

我之前做研究時，前輩建議我至少追隨一位為政府工作的考古學家。我說我正在訪談一位為陸軍工作的考古學家勞莉·拉許。這位前輩說：「我喜歡她！」然後補了一句：「不過沒那麼要緊啦。」

但在這種情況下，受歡迎很重要。她友善和投入的態度有助於跨越文化鴻溝，更打破考古學專業的區隔。且想想：善意可以轉化成有力的武器，就像拉許所做的。

1 拉許的研究團隊還在十七世紀貿易站的下層發現八千年歷史的火爐。

2 阿富汗文物撲克牌都印上「ROE 優先！」的口號（ROE 代表「交戰守則」(rules of engagement)，這表明士兵有權捍衛自己的生命。)

垃圾堆中的寶貝



一整桶考古學家 ——如果考古學家想要拯救世界

清晨五點半的祕魯，位於貧民區、街道狹窄、野狗成群的庫斯科（Cusco）郊區，我在波羅伊（Poroy）乾淨迷人的火車站、閃閃發亮迪士尼風格的車站大廳聽到：「我聽說過你寫的論文。」是的，我也聽過你的論文！」（各種語言、各種腔調，這個時候初級英語或西班牙語也夠用了。）自從「世界遺產」這個偉大計劃開始實施至今已四十餘年，四天之中來自六大洲的考古學家討論如何管理世界遺產的遺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古學文化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ICAHM）的會議得出結論，我們該怎麼做呢？現在正是處理的時候了：我們決定實地考察考古遺址中最重要的馬丘比丘。攀登印加古道要花四天時間，沒有參與者辦得到，因此他們選擇搭乘三個半小時觀景車頂（Vistadome）火車到馬丘比丘山麓的阿瓜斯卡連提斯（Agua Calientes），這雖然不比海蘭·賓漢（Hiram Bingham）的車廂豪華頂級，但可免於背包客列車的驚心膽顫。這是我的夢想，搭上塞滿考古學家的列車，在百變風景和真

實世界的夢幻王國映入眼簾的同時，討論考古學、文化認同、文物遣返和其他熱門主題。

這麼多的考古學知識和經驗聚齊在這令人愉悅的車站大廳，包括快意昂然的伊麗莎白·慈祥的威廉爺爺、英國佬約翰，以及維索·阿派丁（Veysef Apaydin）這位年輕英俊、戴著一對銀耳環的博士生，昨晚我們搭乘出租車前往庫斯科上方的廢墟時，他卻騎著租來的馬。夢妮克矮小美麗、極簡髮型，針對無人能造訪的巴勒斯坦遺址發表激昂的演講。來自德國的尼爾和另一位以譏諷取樂的澳洲人，還有佐藤和他同事根岸洋。根岸洋特別喜歡塞滿考古學家的列車這個想法，他認為這可以是一篇有趣文章的開頭，或者是一篇克里斯蒂推理風格的奇案？但顯然我們之中沒有殺人凶手。事實上，我們是不能再溫和的一群。例如，威廉姆斯教授，他是國際考古遺產管理委員會共同主席，即使是在這個時候還是保持足夠的活力，他和根岸洋爭論，試圖討論出適合我們這群人的名稱。一推車考古學家？一垃圾車考古學家？一田野的考古學家？踩在火車站消毒過的地板上，我們表決：「一整桶考古學家」聽起來似乎才對。但在這桶考古學家被運送之前，是散亂的：前往馬丘比丘的車頂觀景列車已經根據訂票先後劃好座位。考古學家混在遊客之間散落各節列車，無所區別。只有阿什頓·辛那邁（Ashon Sinamai）跟我坐在同一列車，我和他之間被來自加拿大、健談的一家人隔開，快被當地居民拋棄的辛巴威世界遺產，正是辛那邁工作的地方。辛那邁閉上雙眼，我打開書閱讀。

列車服務員像空姊般伺候我們，端出裝飾過度的小點心。車窗外風景從栽培綠色作物的土地、大羊駝農場、如畫的壯麗山巒風景，轉換成鋸齒狀沙漠般的峽谷，再轉換成巨大、生意盎然的叢林地帶，這時候《老鷹之歌》顫音排笛的音樂從火車音箱播放出來。列車側面和車頂的巨大窗戶一塵不染，當列車經過環山道路從高地往下開進印加聖谷，更容易觀察岩層和多肉植物。

我隨身帶著麥克·雅各布斯 (Michael Jacobs) 寫的《安第斯山脈》，這本書描寫十九世紀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漢堡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和植物學家艾梅·彭普蘭 (Aimé Bonpland) 的南美遠征：他們「幾乎無法承受這麼多新現象：氣候、自然資源豐富、植物的異樣……螃蟹可以是天藍色和黃色，這裡的種種挑戰著你的感官，他們完全被一切刺激到感官中毒。」這是一本有趣的旅行隨身書，在阿瓜斯卡連提斯前往目的地時，我們轉乘的公車疾馳上山，剛讀過雅各布斯描述公車翻落山谷的車禍段落，越發記憶猶新。

我們將要抵達最具代表性的考古發現之一，和龐貝古城、佩特拉古城、吳哥窟、巨石陣和埃及大金字塔齊名，但期待中混雜著心驚膽顫。我們遇到一部飛奔下山的巴士，司機急踩剎車，巴士緩緩向沒有護欄的崖邊移動，靠近外車輪下方看見驚險壯闊的視野。然後兩部巴士會車，兩車接近的程度讓人想到印加石牆，巨大石塊不知為何能夠如此緊密靠在一起，連信用卡都插不進縫裡。如果這輛載滿考古學家的巴士翻落山谷，掉進烏魯班巴河，世界遺產

會落到什麼下場呢？會車時花了半小時，足夠好好想像結果會怎樣。

也許是因為恐懼不安，巴特利變得多話。上山時，她沿路聊著俄亥俄州的土墩，辛辛那提她家附近大部分仍未加以研究的考古遺址。多年來，辛辛那提大學連一個俄亥俄考古遺址專家也沒有。她不明白為何沒有更多人在乎這些土墩？聽後我心中生起愧疚感。「因為那只是泥土！」上山的路上我吞著這句話不敢說出來。我想起「貧窮角」，默默告訴自己要快點找時間前往那些巨大的土墩朝聖。但這不只是我的偏見：在考古學中，石造遺物總是勝過土造遺物。終於，我們整車人、整排巴士，爬到一處石塊雕成的遺址。

有些考古學家在研討會上提到關於「看不見的考古遺址」的問題，重要遺址外觀卑微、深埋土底、隱藏在觀光客視線之外，這些遺址很難獲得援助。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德國人弗列德里希·盧斯 (Friedrich Luth)，是歐洲考古學家協會會長，他提到歐洲大陸棚，兩萬年前高於海平面，目前大部分沿著北海和波羅的海海岸線淹沒在海底，是龐大的舊石器遺址區。科學家正在努力嘗試測繪和保護這個龐大的文化資源，但因為觀光客完全看不見，它可能永遠不會獲得世界遺產的保護。數百萬雙鞋子踩過馬丘比丘和佩特拉古城，這些門票收入支撐著考古學，也有助於遺址成為文物保存工作。

我們從旋轉門入口登上步道，然後聚集在一處梯田俯瞰馬丘比丘，來自五大洲的考古學家站在第六階梯田上，來到壯麗的文明頂峰。就算你對這裡一無所知，也會感到驚羨不已。

除草、將石塊放回原處、把梯田的綠草養護得像高爾夫球場一樣，感覺就快要長出馬鈴薯和大豆，再多的修飾也不會破壞這城邦極不可思議的壯麗燦爛。毫無疑問，遺址被整理過。看看美國探險家賓漢發現馬丘比丘時候的老照片（當地家族還住在裡面的遺址），就知道費了多少功夫斬除叢生的雜草、夷平蔓生不羈的叢林。

我們往下看馬丘比丘的儀典廣場，以漂亮的石牆迷宮、堆疊的梯田和崖面搭建，形成天然的盆狀地形，三兩頭羊駝漫步的廣場，簡直可以打羽毛球和槌球。一位歐洲考古學家苦笑著，轉身對負責督管英國歷史建築和古蹟的約翰·史考菲（John Schofield）說：「看起來是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在管理這裡。」他們笑了，附近的夥伴也笑了。史考菲指出一個關鍵區別，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遺址會擠滿夾著自助導覽器的遊客。看著這絢麗的遺址，他欽佩地說：「這裡沒有個人語音導覽設備！」

即便有火車和巴士代步，我們都已經快喘不過氣了。印加人怎麼有辦法住在這裡，更別說把石塊拖拉上來建造馬丘比丘呢？我們盡可能走近梯田邊緣，沒有護欄，隨時可能失足掉落山谷。「你想印加人就在這裡扶養小孩嗎？」有人猜想著說：「他們要怎麼避免小孩跌落山谷呢？」

這地方擠滿人，都是白髮和持手杖的人，有一個還坐在輪椅上，像抬擔架一樣從這階梯田抬到那階梯田。馬丘比丘經常被人們列入遺願清單裡的目的地，而且是窮盡畢生努力工作的那些人。從遺址上方岩台伸頭往下看，身處八千英尺高空的我心跳加快。走下廣場之前，我們看到兩個男子抬著擔架往上一階的梯田走去，然後匆忙帶走一名受傷、用繫帶捆著的遊客。「祝你好運啊，旅人。」就像一群猴子睜眼看著老虎抓走牠們的同類，我們眨眨眼然後回到誘人的風景。

我們人太多了，所以分成兩組，一組一位導遊。我和英國佬、日本人、非洲人和美國人一組。照例我們的導遊是本地人，祕魯的印加後裔。我的祖先是建造、營運費什基爾供應站，最後贏得革命戰爭的天才，我的祖先也是把長毛象和水牛的骨脂熬煮出來的天才。但我們的導遊米蓋爾，他的祖先是建造馬丘比丘的天才，當他用一種富音樂性的聲音詳述五百年前神奇的印加文化成就時，他注視著我們。他的祖先不只把大量巨石以出人意表的垂直距離拖拉上山（並未使用輪具），用高超的技巧和藝能加以雕琢，並在這偏遠遺址中置入精巧設計，至今我們仍得以從中學習，也就是他們依年度時序讓一年中的某些時候，陽光或月光能夠照進聖地。對於眯著眼想望紐約夜空籠罩光害的天文愛好者來說，這幾乎無法想像，但導遊每到一站就告訴我們一些天文學的新鮮事：這個石牆上的小窗口，只有在冬至的時候會有日光照進來，那個建物是個觀測站。米蓋爾陸續展示古代祕魯人的數學和天體學專長簡直巧奪天工。他們也是藝術家，在中心區的一處梯田我看到一件優雅、鋸齒狀的石雕，遺址四處可見和諧共鳴。白天和黑夜、夏季和冬季、人工建物與大自然相調合。

考古學家成一列縱隊，沿著一層梯田移動，然後往下繞進主廣場層，進入馬丘比丘的碗狀地形中，所有目光打量著這個建築。米蓋爾用手勢指向我們剛經過的石造建物，以及各式各樣的住所和儲藏室，當他帶我們穿過入口時，辛那邁、約翰·史考菲、根岸洋和巴特利往下竄過門梁去探索，驚嘆著窗框、門框架和壁龕，猛拍照片。導遊謹慎避免進入密室，但考古學家樂於在狹小的空間中扭動。我跟著其中一人進了衣櫃大小的房間。「你認為米蓋爾有幽閉恐懼症嗎？」他說。

你當然可以從照片去辨識誰是考古學家。觀光客在山麓、梯田、石造建物和日晷前面照相。考古學家等人們離開後拍他們要的照片，他們想拍的是露台、石牆、門梁、人造文物、人們的一切。

我覺得考古學家就像在遺址附近閒晃的羊駝，在酷熱的氣溫下走動幾個小時不吃東西也不喝水。進了馬丘比丘大門就沒有零食或飲料，洗手間在入口後面，使用費要價一索爾。這些考古學雇工很有耐力，最後他們一致認為：即便來來去去的遊客太多，這是個可愛的考古遺址。一位考古學家俯身往坡下看，長滿了藤蔓和樹木，馬丘比丘整地、測畫和導覽的部分才剛開始。這座山側面的上上下下，有更多的遺址等著被發掘。導遊告訴我們，考古團隊現在正在進行揭開這個隱藏城邦其他部分的工作。馬丘比丘遺址將會擴增，目前獲准進入遺址、攀行印加古道有人數限制。聯合國以其委員會和顧問團的形式，如教科文組織考古學文

化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將施壓祕魯限制踏入遺址的人數。但是，正如我們在會議上了解的，祕魯當局考慮遊客不斷湧入，正在構思新的入口大門和遊客中心、擴大鐵路服務，也許未來還要在附近興建機場。

這時候，勇猛的阿派丁已經爬過瓦納比丘（Huayna Picchu）的瘋狂峰頂，冒著生命危險攀上印加祭師頂峰，他比旅遊團中其他多數考古學家年輕一到兩個世代。幾個小時後，他趕上我們，滿身雄性激素的汗騷味，肱二頭肌鼓鼓的，然後他又跑掉。當我們搭公車下山，這次環抱著山靠著內線走，維索花了九十分鐘走下賓漢一世紀前走過的古老驢梯古道，我的一位同伴說：「對他來說，我們都是老人了。」

旅途中，導遊米蓋爾自豪地提到偉大的祕魯考古學家露絲·薛迪·索利斯（Ruth Shady Solis），是她發現美洲最古老城市卡拉爾（Caral），靠近利馬北方幾小時車程的祕魯海岸。在峰頂聽到索利斯的同胞對她的誇讚是多麼棒的事，當我下山時想著她。是索利斯而不是馬丘比丘吸引我到祕魯。請別誤會，我很高興看到馬丘比丘，但索利斯是我造訪此地的理由。

我喜歡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在碎石斷骨之間奮鬥並捍衛自己的觀點和詮釋的考古學家。我喜歡有獨創性的人，索利斯就是其中之一。還是個年輕考古學家時，她搜尋祕魯空拍照片，發現一些從蘇培河谷（Supe Valley）冒出、外觀古怪的遺跡。在照片的導引下，她冒險進入利馬北邊幾小時車程的祕魯沙漠。根據《考古學》雜誌一篇動人的文章：「忍受著無法

想像的貧困和法紀廢弛，索利斯試著展開工作。」包括遭到蒙面劫匪開槍射擊。白天進行發掘，晚上去上學。她開始在利馬的國立聖馬洛科斯大學（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任教，並動員學生和附近基地的阿兵哥協助她發掘大土丘、揭露底下的金字塔。她有一股動力，十五年間讓海濱到卡拉爾的大部分道路鋪平，她成功保護卡拉爾免於遭受公然劫奪，最後她的努力終於促成卡拉爾獲得認可並指定為世界遺產。她另一個值得肯定的做法是把遺址的原名：大奇帕希加洛（Chupacigarro Grande，東邊的部分）改為卡拉爾。

索利斯的唯一失策是：為了完成遺址碳年代測定、計算卡拉爾年代的昂貴工程，她請了美國考古學家，強納森·哈斯和維尼弗列德·克里默的夫婦團隊（Jonathan Haas and Winifred Creamer）來協助。在《發現》科學雜誌一篇題為〈卡拉爾古城大論戰〉，講述哈斯對於索利斯有關合作好處的態度：「哈斯是來自美國本土的共同作者，他可以確保她的研究計劃能夠獲得美國的補助，想從貧困的祕魯取得分毫非常困難。」美國人從卡拉爾取得遺跡樣本送進實驗室，測定出令人驚訝的公元前二六二七年的古老年代。然後他們三人共同署名，將結果刊登在《科學》雜誌。這則新聞轟動一時：意即卡拉爾古城跟埃及金字塔一樣古老！哈斯和克里默被譽為發現者，受到廣泛引述，尤其是英語世界的媒體報導。雖然夫妻倆後來嘗試告知媒體，他們不過是後來才參加這項研究，但索利斯勃然大怒，她拒絕再與他們合作。

然而哈斯和克里默並未離開，卡拉爾附近放眼望去是遍布河谷的土墩，他們渴望前去挖

掘。儘管他們聲譽受損，也遭到重要考古學家譴責，但他們獲得更多資金，從索利斯的大學聘請她的助教和其他學生，也帶來一大團隊美國學生，在卡拉爾北方展開他們自己的考古發掘。

兩年來，我一直關注不屈不撓的索利斯，雖然她並沒有興趣理會我，無論如何我抓住了這次會議的機會，希望聽到她演講。會議首日上午，我帶著期待在前排座位。如此我可以看到她鮮明、活力的本尊，閃閃發亮的祕魯耳環和項鍊，用西班牙語解說她的考古發現，雖然我只能聽懂十分之一。本次會議的主辦人海蓮·西弗曼（Helaine Silverman），以英語和西班牙語歡迎我們前來庫斯科，宣布會議開始及注意事項，開頭就提到這個消息：「唉，非常遺憾，由於工作壓力緊迫，索利斯取消出席本次會議。」

我買了入場券。我為了她而來。考古學家當中，她的艱鉅歷程已成為宏偉史詩，甚至是令人詠嘆的歌劇，他的成就改寫了人類歷史，她堅守考古坑。我咬咬頰肉，吞下口水。已經數不清有多少考古學家從我的追隨中逃開，他們的舉止像活在另一個時代，他們是難以捉摸的一群。即使是在梯田岩台上偶然碰見、聊一聊的考古學家，也會像《綠野仙蹤》裡的善良魔女葛琳達，在閃露微光後不知不覺蒸發到稀薄空氣中。

索利斯缺席這場極重要、有兩百位各國考古學家出席的大會真是太可惜了。她錯過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簡報，她讓想來聽她演講的聽眾失望，失望中參雜著對她的崇敬之情。

我認為宣布索利斯缺席的西弗曼是個能言善道的女主人。講英語時，她全神投入且活潑，這位來自伊利諾伊香檳大學充滿活力的考古學教授，為了紀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四十週年，她是舉辦研討活動的背後推手。講西班牙語時，西弗曼變得風趣，肢體充滿生命力，雙手優雅擺動，臉部充滿表情。白天，她戴著眼鏡和出色的鞋子，安排考古學家上下講台，每人十五分鐘，這樣才夠時間聽到每個人發言：許許多多遺址的報告，來自海拔高低不同的地點、有的遺址簡陋有的壯觀、有的不受理睬有的蓬勃開展。到了晚上，西弗曼換上隱形眼鏡並且略施脂粉，編織的披肩上身，帶我們到她最愛去的地方，在俯瞰庫斯科陡峭山上壯麗的舊修道院喝飲料，室內以古老的壁毯和巴洛克風格的油畫裝飾。在這裡點一份昂貴的皮斯科酸酒，然後坐在皮椅上小口啜飲幾小時，沉醉在精心修復、祕魯歷史的片段樂趣中。肚子餓了，我們跟著西弗曼，通過狹窄的街道和蜿蜒小路來到簡陋巧妙的小店，花幾索爾享用一頓藜麥湯盛宴。我們學到如何用考古學家的預算吃一頓好料理。我看她雙手像蜂鳥般翩翩舞動，對著服務生講話點菜。

這雙手深深挖進祕魯地層，尤其是納斯卡（Nazca）文化，一千兩百年前到兩千年前住在祕魯南部沙漠的一個神祕民族。（甚至連他們名字的拼寫也神祕，有些學者採用納日卡（Nazca）、有的採用納斯卡；我按照西弗曼的用法，文化上稱為納斯卡、地點和線紋稱為納日卡）。²納斯卡人留下艷麗的紡織品，以及繪有生物的陶器，例如頭部呈扇形的神祕虎鯨，

以及醃存的人頭，雙脣以仙人掌的刺刺穿、封緊，前額和顛底打洞用線繩串掛。納斯卡人還留下刻畫在沙漠地上的巨大線紋，飛機俯瞰清楚可見。考古學家稱為地符（geoglyphs）的納日卡線，是在地面上拿掉頂層紅色礫石，並在底下的灰土層刻畫形狀。數以百萬計的讀者透過埃希克·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諸神的戰車》和其他書籍認為這是古代太空人的降落地點。丹尼肯是瑞士的旅館經營者，他幾本聳動的書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長期列名暢銷書排行榜。³丹尼肯繼續在《諸神的黃金》和《歷史的謬誤》等書中捏造種種理由，闡述當地古代人不足以聰明到創造自己的文明。論及瑪雅人對金星上一年長度的計算能力時，他寫到：「要說來自叢林的民族有這種能力，真是難以相信。」丹尼肯開始大放厥詞的時候，西弗曼還是個年輕的學生，那時起她以納斯卡為主題大量寫作，她沒有輕易放過那些暢銷書，她盡力為考古學家辯護，駁斥更過火的納斯卡線偽科學理論，駁斥那些任意濫用、誤解過去的人，指責他們嚴重傷害考古學和祕魯人。為了祕魯的真實歷史她公開宣戰，並在她的一本書中批評丹尼肯。面對這些無稽之談，她認為考古學家有責任加以駁斥。不予理會將損失慘重。

當西弗曼終於在研討會上台發表演講，她並沒有提到精彩的納斯卡文化或任何古怪的偽考古學。她談到我們在庫斯科及其閱兵廣場的歷史中心附近，世界遺產應該在遊客和庫斯科人（Cusqueños）的尋常生活之間加以調和。如何在充滿活力、不斷變化的城市之中維持史

蹟的真實性？西弗曼告訴我們過去發生的事，當印加古牆在飯店營建工程中遭到破壞，當真正的庫斯科空間，幾十年來知識份子、當地中產階級和到訪的人類學家經常光顧的最後一家可愛的家園餐廳（Café Ayllu）被屋主改裝成肯德基⁴，考古學家常有的灰心湧上心頭，讓她牢記不能忘懷。西爾弗曼已成為文化遺產真實性和保存的代言人。

她說，現在想回到真實性的觀念並探索當代空間文化。庫斯科旅遊中心接受三家速食專營店：肯德基、麥當勞，以及祕魯連鎖店賓博（Bembos）各自獨立經營。三家都以庫斯科藝術來裝飾，所在的廣場只有在週日早上或假日當地人會去，其他時段已經成為遊客和庫斯科人經常互動的場所。在速食店的亮麗包裝紙中尋找當代真實文化不僅有創意和包容性，也代表考古學家研究範圍和前景的真正轉變。當及時凍結歷史角落的奮鬥失敗時，並不代表考古學家的工作結束。西弗曼的意思應該是，只要有人持續改造那個角落，考古學家就會有寫不完的故事。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遺產運動展開古蹟和歷史建築的保護，並以多種方式擴展，也是這次研討會的內容，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及其諮詢團體主辦，延伸、檢驗並調整遺產的定義，並回答問題：人類歷史哪些部分值得保留？這個問題在過去四十年獲得若干調整。自然遺產、歷史城市中心、歷史公園和花園、水下文化遺產，甚至包括無形文化像舞蹈、音樂、口述傳統和節日都被納入遺產的概念中。吉爾弗勒金在研討會上提出理由，

認為木乃伊應該考慮列入名單。雖然埋葬的地方，如龐貝和古提比斯及其墓地，已經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但人類遺骸並沒有列在指定範圍內。目前放置在丹麥錫爾克堡博物館的圖倫人（Tollund Man），以及阿爾卑斯山上發現的冰封五千年、天然保存的木乃伊奧茨冰人（Ötz the Iceman），都不具申請世界遺產的資格，但吉爾弗勒金持疑，他們不也是考古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只一個考古學家跟我說，考古領域每往前走一步就要埋葬過去一次。經過許多年，考古學家才接受歷史考古學成為考古專業的合法分支。一旦他們接受田野方法新方式理解遺址中十七、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文物，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轉向二十世紀，甚至是二十一世紀的遺址？考古學家能不能把他們科學觀測技術應用到你剛住過的房間？過去考古學把骨骸、石器、陶器列入古典，或史前的研究範圍，而現在從兩百五十萬年前遠祖使用工具到你剛才扔掉的雞塊的來龍去脈都當作發掘（或是觀察、思索）的對象。

演討會講題除了技術性展示目不暇給的考古學工具、若干遺址連結社區各種成敗的現身說法、防範文物洗劫者、人類生存和環境威脅等等，也有像西弗曼謙遜又出人意表的人文關注。這些終必銘記在我腦海裡。

約翰·史考菲（John Schofield）是英國約克大學教授，在會上詳盡介紹考古學平民和現代的觀點。他長相不討喜，有張靈活、普通的臉，史考菲專注於他所謂的「當代過去的考古

學」(the archa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past)，我稱為五分鐘前的考古學。他曾與一個團隊合作發掘已被考古發掘過的一輛破舊的福特車。他們把車當作一件物質文化來進行記錄。仔細檢查、測量、清理車內角落發現的十七世紀的陶器灰塵碎屑，在車體骨架上取鐵鏽樣本，記錄曾用來當作跳板的車頂凹痕，然後拆解車體和引擎。兩個月來，他們把這部車視為被人類製造、改裝並丟棄的物件加以研究。一方面是練習，甚至是一種噱頭，也是控制的科學調查的有趣應用：觀察、測量、記錄、拆解。團隊達成的結論讓我印象深刻：車內狀況完好，考古學家為車定期保養和維修。但車體和外裝卻因為田野調查的需要弄得凹凸不平，看起來像是肇事撞毀。車內車外處處是考古學家留下的痕跡，以及他們進行各種發掘的證據。即使我們每天使用的東西，經過深入的調查，也會透露新訊息。

史考菲對著坐滿考古學家的觀眾席聊到這個轉變，從形象和建築的角度思考文化遺產，轉變到以另一種記錄常民生活方式的角度來思考文化遺產。他特別提到馬爾他首都瓦勒塔(Valetta)，位於地中海南部一個美麗的城市，這個城市因為高密度的歷史古蹟而列為世界遺產，自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建物都維持不變。馬爾他多年來是各國海軍停靠的港口，到訪的水手會去光顧瓦勒塔海峽街的酒吧和夜總會。一九七〇年後酒吧已經關門，海峽街幾乎是棄置狀態，包括天主教會在內的馬爾他權勢階層，連認定城市的文化價值都沒有興趣，更遑論去保存。但是，曾經在海峽街工作的某些人被發現生活在這廢墟中，其中包括前舞者喬。史

考菲感嘆：難道屬於喬的那個瓦勒塔不是這座城市歷史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思索著，當史考菲環顧研討會場，從黑暗中升降舞台上各色人種臉孔的監視中，從光鮮的市政建築中，從傳送粗陋的西班牙語或英語同步翻譯的耳機中，從丟棄的傳單、筆記和名片，從苦於高山症的人吃的古柯糖包裝裡，他究竟看到什麼。當史考菲站在馬丘比丘的梯田上，他看到什麼？他看到十五世紀的印加遺址和百年或更久前的牧羊人小屋，他看到來自各個發掘的靴印和鏟挖痕跡，他看到園丁清理、修復和種植的標記，他看到此時在遺址遊走的旅客丟棄的廢物。他看到幾個世紀前、上一季或當天稍早人們的遺留物：硬幣、鈕扣、門票、太陽眼鏡和糖果紙、頭巾、空的防曬乳罐、走私水瓶、蛋白能量棒包裝紙、人們的手杖在小徑上戳出的小洞，以及格狀鞋底運動鞋、果凍涼鞋或釘靴留下的鞋印。他看到入口附近路面格外磨損，因為旺季人群在這裡堵塞住；他看到大石上的青苔磨損，因為攀登瓦納比丘的背包客在這裡休息。從他們留下的東西可以解讀他們的故事片段。收集古老歷史紀錄找不到的跡證是有用的，比如訪客紀錄或旋轉門計數，或是園丁、巴士司機和導遊的出勤卡，都可以用來考量人們可能採取各種使用遺址的破壞性或替代性方式。

「我們尋找並認知這些常常是細微的痕跡。」史考菲說：「考古學家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看世界。當代與過去的考古學家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探尋人類過去活動的痕跡，但是剛剛過去的時刻，也許只是前一天。」他微笑著說：「我們所看到的可能是有用的。」

不用坐在庫斯科的講堂時，我穿過市區遊蕩到卡薩孔查博物館（Casa Concha Museum）。曾被賓漢帶回耶魯大學的馬丘比丘文物展（耶魯大學剛剛還給祕魯）旁邊，我看見更多有關考古學積極運作的介紹。透過幻燈片我看到令人驚嘆的帛琉洛克群島（Rock Islands）和新喀裡多尼亞（New Caledonia）的珊瑚礁的興盛，也看到在祕魯荒野和智利一望無邊的沙漠發掘。窮困至極的考古學家令我感動，他們的工作受到的支持少得可憐，「哪裡有洞我們就去挖。」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考古學家如是說。但我也受到那些資助文化遺產的人們所吸引，例如送考古學家飛越黑森林的德國人，他們帶著激光雷達設備去拍攝透視照片：你看哪，我們發現了古老城堡！

一天晚上，整天漫長專題介紹之後，我坐在庫斯科一間餐廳裡，餐桌是白色老式浴缸構成的水族箱。你在玻璃蓋上面吃飯，魚從你的盤子下面，游過海藻和貝殼裝置周圍。坐滿浴缸四邊的各國考古學家點了皮斯科酸酒，當然也點了啤酒。有趣的填充料天使吊在天花板上，椅子和長凳上墊著假虎皮枕頭，陰暗的紅色光線，彷彿我們是在水下，淹沒在折衷主義的氛圍裡。我們在水族箱上吃羊駝排。不過，素食者不吃羊駝，道格拉斯·科默（Douglas Comer）也沒吃。這位是考古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的美國籍共同主席，他曾攀登庫斯科上方的沙賽瓦曼（Sacsayhuaman）廢墟，展開他的旅程，一頭漫步遺址附近的迷路羊駝愛上他，他不能吃羊駝，因為他被羊駝用鼻子示過愛。

我坐在科默和根岸洋之間，科默是空間考古學專家，根岸洋則鑽研一萬四千年前生活在日本、古繩紋時代的狩獵採集者。科默在巴爾的摩經營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專門收集和分析衛星和航空資料。他曾與美國國家航太總署合作，並鼓勵考古學家利用其圖書館最近解密的衛星照片，進行遺址的歷時性研究。根岸洋處理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他告訴我，為了清理土地進行開發，九九%在日本的發掘是緊急事件。考古學家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區也許瀟灑浪漫，但在日本，根岸洋和他同事專業遭受蔑視。他回想一次緊急發掘，工程進行中在機具邊緣起出骸骨，他們被召來在及膝深泥洞中工作，因此暫停施工的男子在一旁嘲笑他：「你這個叫做工作？」根岸洋模仿他的語氣，他笑了起來。

離開祕魯之前，為了向索利斯的精神致敬，我前往美洲最古老的城市朝聖。我和導遊布列索一起開車出發，他殷勤健談，一半祕魯人、一半巴爾幹人，載著我快速離開利馬趕往海岸。我們經過利馬貧民窟之中的一部分，他告訴我，人們住在墓地上。我們經過許多房屋，像豪豬聳起鬃毛那樣，從屋頂立起一條一條的鋼筋。「我們的房屋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他告訴我：「我自己蓋的房屋，屋頂也留了鋼筋，因為有一天我兒子可能要在上面再蓋一層來住。看吧！這裡已經幫他把銜接點都準備好了！」他打開汽車的CD音響播放奇查（chicha）音樂，亞馬遜的樂器和節奏加上迷幻影響又滲雜少許卡洛斯·桑塔納（Carlos Santana），泛美公路上短程遊覽的完美配樂，響徹陡峭多霧的山丘和沿海沙漠。

幾個小時後，我們在棕櫚樹下燒焦的甘蔗田旁邊轉向東走。我們看到灌溉渠有裸體男子在洗澡，其中有個躺平小睡，工人在休息，馬車堆滿農產品。我們開車經過肥沃蘇培河谷，沿路兩側盡是萬壽菊田、玉米田和蘆筍田。我們追過車後攀載幾個人的敞篷卡車、經過土坯屋，最後看見的藍色告示牌上面寫著：「注意：聖城卡拉爾，二十三公里」。我們等在路上，讓穿裙戴花帽子的女人趕著黑色和棕白雜色的羊群通過，羊群伴著狗、毛驢和斑點小馬。農地中間另一個巨大的告示牌宣示考古區到了，基地撐起固定單斜棚架，由兩隻狗看守。

一下子整片沙漠的景致出現，放眼全是米色系的枯旱和乾河床，綠色的群山和田野已成為遙遠的背景。往卡拉爾的路就像月球上的單色系，內陸一路照耀我們的太陽已經隱藏。陰曇天並未覆蓋大氣，這不完全是霧，更像是一切被籠罩，變得潮濕、淒冷。六座淺黃色的金字塔兀自杵立在蕭瑟的高原上，廣場褪色的大片區域橫躺在金字塔之間，石頭堆疊的矮牆在其間劃出界線。為了便於遊客和學生參觀，遺址裝設了告示標誌、簡易的開放式茅屋與低技術的展示架、供巴士停放的大車位和乾淨的廁所。我們等候迪諾前來，為我們導覽卡拉爾聖城，我們讀到蒂克拉（Tikal），蘆草寬鬆織成的籃狀容器，用來裝運金字塔的基石。遺址延展一百六十五英畝。我們從金字塔頂往遠處看，看到只有山羊一般大小的人們。迪諾加入我們，並指出那些人是考古學家，他們在這裡工作二十天，然後休息八天。他笑著說：「這

像是考古學家的監獄。」在載滿學童的晚班巴士抵達之前，布列索、迪諾、我和在遠方忙碌的考古學家，是卡拉爾僅有的生命跡象。

索利斯搞懂她發現了什麼之前，當時她看到此地的樣貌是我無法想像的，石牆還埋在地底，金字塔看起來像沙丘。她發掘出粗陋卻引人入勝的遺跡，席克拉囊袋、骨雕藥物吸食器、離海二十英里的沙丁魚和鯉魚骨堆，鶴骨製成的笛子的儲藏處。花了十五年才明白，這些發現並不只是古代族群的遺跡，更是具有廣闊貿易網的有組織社會的明證。而這樣一個複雜的有形基礎設施，有祭壇、地下通風管道，這種東西你或許會在歐洲廢墟中發現，但不會遲到千年之後才發現。高原的邊緣，灌溉耕地一年四季輪流生產大量的豆類、南瓜和棉花。部分豆類和棉花作物運往濱海地點阿斯佩羅（Aspero），交換棉花製魚網捕獲的沙丁魚和鯉魚。這就是索利斯和莫斯利工作的地點，莫斯利是美國考古學家，他曾經捍衛索利斯，指責哈斯和克里默的「學術帝國主義」；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莫斯利責備他們「顯然都太專斷」。索利斯、哈斯和克里默都參與一場轟動又具革命性的考古學工作。他把他們之間的互相對歸咎於困擾很多考古學家的性格缺陷：「他們的自我意識太過強烈。」。

我站在最大金字塔時，迪諾正談到他的成千上萬的祖先一定曾住過這裡。他提醒，也許我們走在他們的房子殘骸上。布列索問了些明智的問題，他已經迷上了考古，因為他和朋友沿海岸步行的時候，在某個洞穴找到一具木乃伊。

索利斯迷戀前殖民民族人的故事。這迷戀促使她發現目前為止美洲最古老的城市，她因此還原了遠祖族人的過去。認知到卡拉爾的重要性，證明了她作為一個考古學家的技能。但考古學家其實是這樣：無論有沒有卡拉爾，她都會達成她的成就。不論她是否發現最古老的城市，不論她是不是最先發現，雖然沒有人鼓勵她，她會發現什麼也沒有什麼保證，她還是會放棄休假，睡在她的車上，每天早上醒來繼續工作。不管她挖到什麼，我相信她仍會堅定追求她的願景。

我思忖所有我見過的考古學家，驅動他們、使他們頑固地堅持願景的意義是什麼？我想到漢那斯，長頭髮的蘇瀑市（Sioux Falls）考古學家，本書一開始坐在一家小餐館吃烤培根，描述美洲平原的原住民如何從獸骨中提煉骨脂。越戰老兵漢那斯在惡劣狀況下結束他的兵役，阿米巴痢疾讓他瘦了六十五英磅，同時對親眼見到的「醜惡的血腥暴力」感到強烈厭惡。除役後他放棄法律研究轉向人類學，轉向人的研究。

考古學對他來說是什麼？考古學是殺生的相反詞。考古學試圖把那些被遺忘或埋藏千年甚至數百萬年的物件，用意志喚回生靈。考古學不只是骨頭或寶物的斷片，而是在大自然面前跪下，集中注意力，試著把曾經觸動這場所的人類生命的火光找出來。

我和布列索離開卡拉爾的時候，視線內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在這偏遠月球表面的岩石河床緩慢滾動，然後……這是什麼？摩托計程車（三輪的摩托車）迎面而來，上面坐著一個

穿戴黃色夾克和帽子的人，黃色的散熱器綁在他面前。布列索搖下車窗，他們在乾河床上聊了一會兒。他遞上幾個索爾，那男人回遞給我們一些雪糕，我們繼續推進，通過千百年回到現實。

- 1 ICAHM 指導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及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考古學和文化遺產業務。
- 2 為了在 Google 搜索中不與全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NASCAR）與北美國際雜交俱樂部協會（NASCA International）等關鍵字混淆。
- 3 我讀過丹尼肯寫的《諸神的戰車》，也讀過西弗曼和唐納·普洛克斯（Donald A. Proulx）寫的《納斯卡》，納斯卡人的狂野有趣遠遠勝過任何古代太空人。讀過丹尼肯對瑪雅曆法，以及其他來自所謂「原始人」的先進成就的觀點後，我發現他的動機是種族主義。
- 4 家園餐廳的所有權人是當地總主教，改裝的故事令人心碎。詳情可以參閱網址 <http://www.cuzcoats.com/2011/07/cafe-ayllu/> 或 http://www.cateayllu.com/Cafe_Ayllu_1/cafe_ayllu.html。
- 5 另一項發現吸引我：團隊拆下引擎，撒粉採指紋卻無所獲。透過檔案研究發現，這部車是機器人工廠的產品之一。史考菲的談話和當代考古學的研究領域，讓我想到先驅檔案學家霍華·戈特利（Howard Gotlieb），他不願等到主題變舊才來歸檔，寧可趁相對興盛的時候簽約收件，每週辦公桌占滿這些資料，連廢紙料和報紙也都送來給他。
- 6 莫斯利的演講「四千年前的祕魯沿海」可以從以下網址聽到：<https://peabody.harvard.edu/node/581>

謝辭

我要感謝考古學家為我打開大門，讓他們的故事成就這本書。感謝吉爾摩、拉許、桑迪和謝伊，以及他們帶我去見的人，感謝桑迪帶著我去看許多考古發掘。

我還要感謝阿什渥斯 (Robert Ashworth)、伯爾 (Jim Burr Sr.)、卡巴西尼 (Joey Cabaccini)、康特斯 (Zoe Contes)、堅茲 (Terri Jentz)、萊弗茨 (Leedom Leferts)、馬凱斯 (Rican Marquez)、夸茲 (Duane Quates)、史卡萊 (Cristina Scalet)、修茲 (Meg Schulz)、斯金納 (Willa Skinner)、史堡爾斯 (Mike Sprowles)、史德爾騰 (Rund Stelten)、史戴爾 (Penny Steyer) 和華萊士 (Joe Wallace)。感謝文化遺產保護律師委員會 (Lawyers' Committee for Cultural Heritage) 的萊拉·艾曼朵 (Leila Amineddoleh) 和湯瑪斯 R 克萊恩 (Thomas R. Kline)。感謝我的考古發掘夥伴，尤其是班克斯 (Jillian Banks)、鄧寧 (Alex Denning)、瑞莫斯馬 (Kelly Riemersma) 和帕夫洛波洛斯 (Talia Varonos - Pavlopoulos) 和

整個紐約大學團隊。

感謝那些跟我談論工作的朋友，他們對本書提供不可限量的貢獻，其中包括巴巴阿契克 (Andy Bobyarchick)、卡瑞赫 (Bill Caraher)、艾弗哈特 (Jennifer Everhart)、格羅斯曼 (Joel Grossman)、哈勒堤 (Rachel Hallotte)、赫斯特 (Kris Hirst)、侯里蒙 (Sandra Hollimon)、史密斯 (Fumiko Ikawa-Smith)、強森 (Dave Johnson)、強森 (Jessica Johnson)、莫伯格 (Judy Kelley-Moberg)、卡拉佩 (Rungsima Kullapat)、連尼克 (Edward J. Lenik)、里昂 (Brian Lione)、米德頓 (Taylor Middleton)、萊因哈德 (Andrew Reinhard)、舒沛 (Friedrich T. Schipper)、史塔柯維奇 (Christopher J. Stackowicz)、史陶特 (Margaret Stauder)、以及蒙特婁宏偉的卡里埃角考古學博物館 (Pointe-à-Callière) 的波希爾 (Louise Pothier) 和林莫許 (Sophie Limoge)。

我受益於許多課程，這些課程也開放給任何對考古學感興趣的人，尤其是美國考古學學會及其地區分會、紐約州考古協會及其地方分會、布朗大學的盧柯夫斯基考古學和古代世界研究所 (Joukowsky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y and the Ancient World)、以及紐約大學古代研究中心和「Coursera」線上學習等單位提供的課程，我感謝他們。而美國考古學協會、古代人類學會和石溪大學的課程特別值得感謝。

如果沒有波卻斯學院 (Purchase College) 的作家中心和圖書館的協助，我無法完成本書的研究。尤其要感謝耶林 (Louise Yelin) 和凱斯勒 (Suzanne Kessler)，以及杰洛瓦修 (Darcy Gervasio)、和賽因古拉 (Marie Sciangula)、福克斯 (Margaret Fox)、雷茲尼克 (Carolyn Reznick) 和斯普林仁 (Meryl Sprinzen) 指引我資料的來源，德波爾 (Sherry DeBoer) 也領我找到一些資源。當我開始這個研究計劃時，尼可森 (Jim Nicholson) 給我極好的建議。感謝卡羅爾 (E. Jean Carroll)、德斯特 (Pete Dexter) 和特勞文 (Nick Trautwein) 的支持，以及布魯亭 (Bob Brutting)、卡特 (Betsy Carter)、艾森伯格 (Lee Eisenberg)、希梅爾 (Eric Himmel)、萊納 (Christine Lehner)、樂明格 (Jay Lovinger)、麥考 (Bruce McCall)、歐克蘭 (Becky Okrent)、歐克蘭 (Dan Okrent)、米勒 (Caroline Miller)、史密斯 (David Smith)、所羅門 (Roy Solomon) 和范可 (Yvonne van Cort)、而考德威 (Carol Caldwell) 和道奇 (Chris Dodge) 都在重點部分提供極佳的協助。

我的朋友兼讀者是我的超級團隊。安德森 (Catherine Anderson)、克萊門茲 (Marcelle Clements)、漢尼伯 (Mary Ellen Hannibal)、羅斯曼 (Abby Rosmarin)、莫那利 (Kristen Munnelly) 和羅利 (Barbara Rowley) 給我有用和讓我至感謝意的評論。奧爾科特 (Martha Alcott) 閱讀並在截稿前核對內文。布福 (Kate Buford)、奇弗 (Ben Cheever)、達利 (Gay Daly) 和戈樂德茲 (Mark Golodetz) 聽或讀這些章節的幾個版本，而史圭爾 (Susan Squire) 讀了不下三次。聖地牙哥 (Esmeralda Santiago) 和華倫 (Larkin Warren)、持續提供反應

和無盡的耐心和支持。我的朋友黎曼（Ruth Liebmann）跟我到祕魯旅行，我偷了她的觀察意見。墨菲（Mary Murphy）和敏西海默（Bob Minzesheimer）一直陪著我，還有弗烈德（Jackson Fleder）、弗烈德（Carolyn Fleder）和弗烈德（Nick Fleder），我寬容的親家眷屬。

我要感謝出版商伯納姆（Jonathan Burnham）和莫里森（Michael Morrison），感謝他們的信賴和支持。以及感謝貝恩（Jane Beirn）、科恩（Ed Cohen）、哈博（Barry Harbaugh）、梅茲（Annie Mazes）、皮爾斯（Sydney Pierce）和史丹利（Virginia Stanley）對本書的辛勤工作。近來有多少作家可以十年來倚賴同一個出版團隊？我三本書的每一個階段都受惠於赫雪（David Hirshey）的幽默和見識，巴齊克（Milan Bozic）博士設計三個很棒的封面，卡洪（Chris Cathoun）從頭到尾精明地引導我，而弗烈德（Rob Fleder）共享我的人生，他替我想出三個夢幻書名，給我無價的編輯意見和勇氣。

包括其他未能在此提及者，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一群人，但他們未能說服我放棄的一些決定，或挽救我脫離的所有錯誤，所有這些由我應負之文責。

生活在廢墟：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

Lives in Ruins : Archaeologists and the Seductive Lure of Human Rubble

作者——瑪莉蓮·強森 (Marilyn Johnson)

譯者——李世明

主編——鍾岳明

編輯——張啟淵

封面設計——賴佳韋

企劃——劉凱瑛

董事長——趙政峴

總經理——余宜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二〇六八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二七〇五(〇二)二二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二〇四六八五八

郵發——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一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生活在廢墟：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 / 瑪莉蓮·強森 (Marilyn Johnson) 著；李世明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6.04 面；公分。— (知識叢書；1050)

譯白：Lives in ruins : archaeologists and the seductive lure of human rubble

ISBN 978-957-13-6583-1(平裝)

1. 考古學 2. 軼事

790

105003402

LIVES IN RUINS : Archaeologists and the Seductive Lure of Human Rubble
by Marilyn Johnson
Copyright © 2014 by Marilyn Johnso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6583-1
Printed in Taiwan